

炎黄春秋

1993/6(总第15期)



游说于
现代商战
中的

神秘女性

外国监狱里的中国女犯

——一位中国领事的探监手记

王宜味冤案再曝内情

——王宜味之死的教训与启示

“江青服”出笼的台前与幕后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政治風浪中的胡喬木

与幕后

时代风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 特区始末

倪振良 2



春秋篇 叶永烈 20

政治风浪中的胡乔木

再谈王实味冤案

温济泽 52



“江青服”出笼的台前与幕后 晓高 70

毛泽东为刘胡兰两次题词的前后

马明 16

春秋笔

从战犯到和平战士 李文达 64

与历史同行 何志云 76

人得浪

一位中国领事的探监手记:

外国监狱里的中国女犯

徐京利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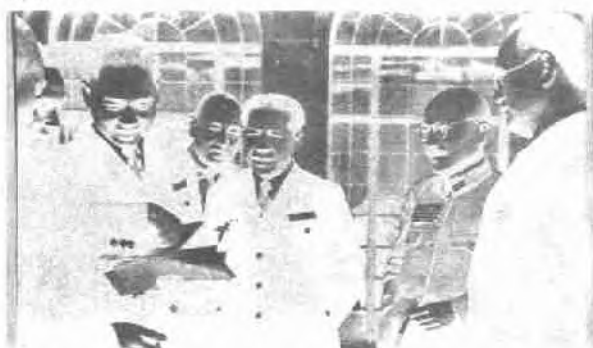
游说于现代商战中的神秘女性

李程骅 44

下期要目

- 再现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 许世友为何在延安被捕受审
- 毛泽东之女李敏的酸甜苦辣
- 唐生智保卫南京蒙冤
- 一个女人的乡村都市梦
- 大陆“人蛇”出洞秘闻

春秋笔



大汉奸汪精卫死因之谜

李影 马江 59

古镜台

千古冤魂说韩信

兰殿君 兰婧 84

赤子心 我所结识的驻外记者

石英 86

人海浪 反思“白腐”可危

张细阳 69

赤子心 台籍画家黄正襄素描

蔡志翔 88

英杰谱



陈毅军长 和一个文艺兵的故事

顾工 40



矗立人生

张建术 78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约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饒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杜卫东

美术编辑: 刘少波 李科平

社址: 北京市文津街7号

邮码: 1000802

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出版日期每月11号

广告许可证号: 京西工商广字

235号

印刷: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 《炎黄春秋》发行处

最高决策：

中国创办特区

始末

1. 风云人物

1992年初春，当代风云人物邓小平来到了阔别八年的深圳。

百花颌首，千树起舞，座座高楼绽开了笑脸。

1月20日早上，国贸大厦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挤满了愉悦的人群。邓小平一行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坐观光电梯，徐徐登向53层旋转厅。

一夜城

满眼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彩色的人潮。

进了国贸大厦至高点，坐在缓缓旋转的环形大厅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看到的是立体的活动着的一尊尊巨雕，一幅幅彩图。多姿多彩的现代化楼宇，一栋栋、一群群、一片片，汇成了楼的山、楼的海、楼的森林，其间绿荫浓覆、人影憧憧。

仿佛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镇上除了破旧的平房外，只有几座旧楼，人口也不过两三万。多处是乱石、水沟，还有出没在水草间的青蛙、水蛇……转眼间，这里崛起了一座现代化锦城，已有两三百万人口，数千栋大楼，十几万辆汽车，还有纵横交错、数

不胜数的林荫大道。

记得八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滚烫的热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到处是来往的推土机，起落的起重机，灰色的脚手架。透过这一切，邓小平看到了深圳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欣然命笔道：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次离开深圳后的第二个月，即1984年3月，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决定。

中华民族奋进的航道已经开通，风帆已经扬起，定然驶向成功的彼岸。1988年6月初，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兴致勃勃地说：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这个再造香港的构想，其实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已在深圳率先实施了。经十二年奋争，十二年拼搏，深圳已建起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已看到了第二个香港的雏型，已显示出了她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面的香港，早已租给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它的兴旺与繁荣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东南亚的一些华裔资



●倪振良

本家将数百亿美元存入香港，香港的经济便急剧发展了起来。从那时至今，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而深圳特区，刚创办十二年，她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高出了26个百分点，难怪香港人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

且看今日的深圳，在80平方公里新城内已建成9个工业区、50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达3000万平方米，还建成了大型机场、大型铁路客站和8个港口码头、4个陆路口岸，300多公里市区道路。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辉煌的事实：十二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深圳的经济效益，深圳的社会风尚，都要比香港高出一筹：

啊，深圳，
不是香港，
胜似香港，
大海可作镜，
高山可作证！

面对这一番情景，作为创办深圳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精神矍铄，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他的目光注视着深圳市领导，语重心长道：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讲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一字一顿重复着这样一番话，是那样郑重，那样坚毅。这位久经磨砺，年近九旬的老人，似乎在给十几亿中国公民指点着赖以生存与争胜的道路，又似乎是在解剖着中国革命苦涩、曲折而又十分恢宏的历史——

三起三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邓小平在其中就经历了三个大起大落。

邓小平第一次受打击是在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突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安乐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谁料到，33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又被发配到了江西，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邓小平日出而去，步行去一里路外的拖拉机厂接受劳动改造；日落而归，“闭门思过”。寒风侵骨，冷雨敲窗，多少战争年代里为国捐躯的战友、英烈的形象在他面前闪过。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在苦苦思索：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究竟该怎么搞？

七十年代初，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中国似



邓小平
巡视南方

乎有了转机，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是在1973年。到了1975年，经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一伙大搞什么评法反儒批周公，把矛头指向病中的周恩来；紧接着又来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硬是又把邓小平打下去。

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1976年10月，它终于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七八月间，邓小平第三次重上政治舞台，恢复了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才略过人、力挽狂澜的邓小平肩上。

历史的转折

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十多亿公民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农民的生活尚在贫困线上徘徊。难道中国向来就那么穷吗？不。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与中国并驾齐驱，到了七十年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也就在六七十年代，正当中国这条巨龙被无休止的运动、斗争折腾得精疲力竭、回天乏术的时候，在中

国的周围出现了群龙腾飞的局面，与中国大陆同祖、同根、同一文化圈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雄辩的事实告诫我们：疯狂的口号喊不出高速度，无休止的斗争斗不出“灿烂的经济之果”，得赶快悬崖勒马，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心工作必须要来个根本的转变，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

经济建设怎么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勒紧裤带，蛮干苦干？殊不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时，世界已在拥抱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了；当我们闭门高喊要解放全人类时，人类已经登临月球，飞向宇宙了。当今的中国，只有革除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扫除一切阻挡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彻底解放生产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腾飞。只有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高科技；同时，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市场，让中国汇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洪流，才有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于是，经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足够的勇气、胆略，还需要必要的试验田、排头兵。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等乡村开始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搞活，该选择哪里作“排头兵”、“试验场”？

邓小平浏览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形的中国地图，渐渐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了南方——

2. 二十年怀胎

中国的南方，连着大海，向着东南亚。

自从140多年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后，有多少洋人洋货从这里拥进华夏，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飘向海外，走向世界。

到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桎梏的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与干劲，投身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事业。

可叹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轮，在剧烈的政治风浪中颠簸震荡，失去了多少赖以腾飞的良机，将多少极其宝贵的岁月付诸滚滚浊浪！

坐失良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震动世界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英勇气概。太平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高涨了起来。

这个时候,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办工厂,开商店,随之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即向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到南方来了。陶铸忙召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了珠江畔的毛主席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抽着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与掌舵者,还没有迈出祖国的南大门,也没有去过港、澳、台,缺乏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

广东的官员则兴致勃勃:“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

毛泽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还是默然抽着烟。

半个小时后,当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扑向大海的游艇时,才若有所思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立即送呈给了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提到最高决策层商讨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广东省委在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杳无音讯。

第二年春天始,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折腾下来,已是二十余年过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打开国门

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制造十年动乱的祸首们已经覆没,邓小平又开始重新工作。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国应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忙着组织出国考察访问代表团。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他先后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管国家进出口方面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我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让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4月初就前往港澳了。

5月初,谷牧副总理则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三十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显示着中国这头雄狮觉醒了,正重振雄风,向世界走来,那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都以相当的规格和极高的礼仪,接待着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经济考察团,我考察团成员则认认真真座谈、询问、参观、考察。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从设计部门到生产车间,大多是那样井井有条,紊丝不乱。一座座厂房是那样整洁、规范,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位先生、小姐操作着电脑,控制着各个生产程序,崭新的成品便源源不断而出。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在这琳琅满目的国际市场上,世界各大国家的商品几乎都有,中国货也有,但大多是摆在最廉价的柜台里,而且居多是中国最好的上海货。这怎么不使目睹这一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西欧诸国给考察团员留下的印象与感触是极深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西德崇尚信誉,注重高效、优质的生产,英国恪守规矩,法国讲究艺术,瑞士恬静、富有,丹麦活跃兴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风俗,沿袭、发展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塑造着不同的素养、性格。所见所闻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感触最深的还是现代化科学技术与严密的经营管理带来的高效率与高速度。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与笔者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开了

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说干就干

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谷牧从西欧返回前几天回到了北京。谷牧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该组写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西欧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宝安等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宝安、珠海在行动,赶上头里的要算是我驻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到了1979年元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样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先念副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与谷牧副总理作了认真研究,马上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局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远在香港的袁庚,接到通知,赶忙登上了直飞北京的班机。

3. 中南海决策

直飞北京的银燕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初春季节,海湾雾多,舷窗外一片茫茫。飞机在雾海中穿行、升腾。

招商局副局长袁庚的心潮,随着那机窗外的云雾滚滚翻卷——

冲破束缚

见了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谷牧副总理,该说些什么呢?袁庚接触招商局的工作还不到半年。开始是根据港澳工委的意见,交通部长叶飞派外事局长袁庚去香港招商局作调查研究。作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后,袁庚代交通部党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三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五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重要批示。10月18日,袁庚奉命从交通部外事局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为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这就急需合适的地方,袁庚四处奔走,八方寻觅,终于看中了香港一个微型的小岛,想把它买下来。一问价钱,不禁望而却步了;把香港招商局百年来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出去,也买不下这一块地方。

是啊,香港万商云集,寸土寸金。连大海中也在填土造房,哪里还能买到廉价的地皮?!

怎么办?驻港的中资机构,难道就这样被困死在香港,无所作为了吗?倏然,他想起了对面的宝安县,能不能在那里辟块地方,搞个招商的工业区呢?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中央要改革开放,不妨先去看看。

游子还乡

袁庚是宝安县人,阔别故土已有几十年了。过了罗湖桥,就是宝安的县城深圳,七十年代末的深圳,依旧只有几栋旧楼,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

深圳,又名鹏城。从飞机上鸟瞰深圳全景,左右两边有两个伸向大海的半岛,酷似展翅南飞的大鹏的两翼,其左翼是蛇口,右翼是大鹏半岛。袁庚的故乡就在大鹏半岛,三四十年代,袁庚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参加了抗日游击东江纵队,担任了联络处处长,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杀到日寇大败,一直杀到香港,与英国少将一起接受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袁庚又随东江纵队,投入解放战争,参加淮海战役,担任炮兵团长,又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家乡宝安县的战斗。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为了山河的光复,民众的解放,多少战友、英烈血染热土,为国捐躯。袁庚算是幸运者,盼到了全国解放,盼到了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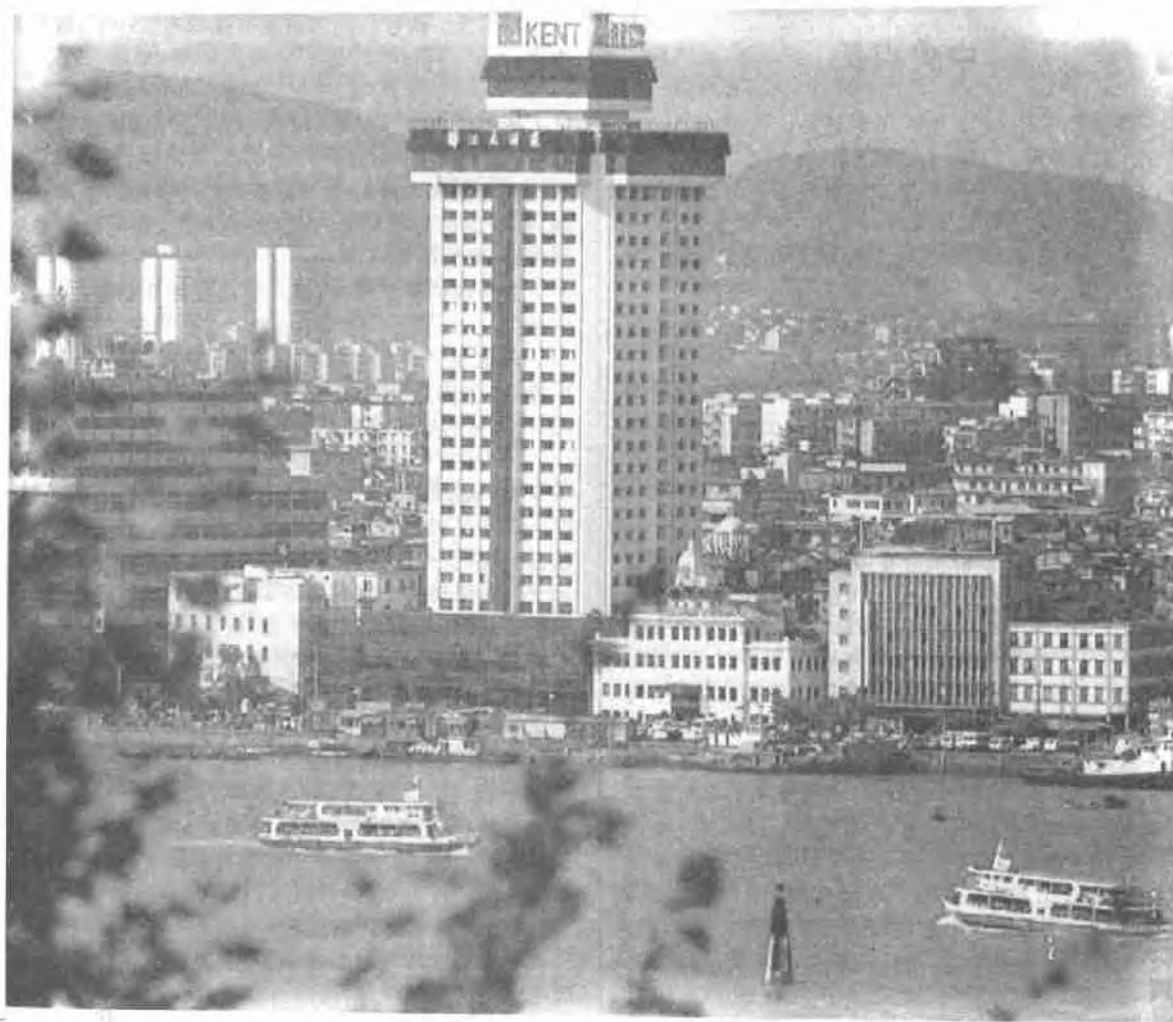
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可当他驱车返回别离二三十年的大鵬半岛时，不禁怔住了：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许多都找不到了，仔细一打听，他们早已远走他乡，移居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了。解放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五千多人了。岁月流逝，人去房空，还是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是那几处住宅群，那几排小平房，而且已破旧不堪了。同样在这二三十年里，对面香港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入夜，香港灯光灿烂，这里却是一片漆黑；对面沸腾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这里冷冷清清，万籁俱寂。

面对这一情景，老革命袁庚的心在颤抖：中华儿女当年用血肉换来的江山，后来为什么一个个离她而去，远走他乡？贫穷与落后，能说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闭关

自守，穷干、蛮干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设我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商局是大陆驻港的唯一有经济实力的中资企业，该率先到深圳来“吃螃蟹”，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深圳南头以南有个半岛，形似蛇头，又名蛇口，那边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又靠近深圳西丽湖的水源，在那里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招收内地的劳动力来做工，为民造福，为国增收，那该多好！返回香港，袁庚恰遇刚从西德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长叶飞，他俩想到了一起，谈到了一起。离港返京时，叶飞取道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专门洽谈驻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问题。

广东省与交通部两方负责人的思路又一拍即合。



深圳蛇口经济开发区

是啊，早在二十余年前，广东省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打过类似的报告，谁料如沉大海；而今，中国与世界都在呼唤改革开放，广东省地处南疆，面向大洋，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机不可失，该尽快把国门打开！

广东省、交通部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就在当月下旬接到了中央主要领导接见面议的通知。在这应召赴京的途中，袁庚怎么能不心潮滚滚、满怀憧憬呢？

中央点头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

北京中南海。

谷牧副总理健步向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处走去。

进了办公室，谷牧一直走到先念办公桌前，轻声说：“他们都到了。”

在埋头批阅文件的李副主席这才抬起头来，拿起案头的一个文件夹，站了起来：“走吧。”

先念、谷牧一进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李先念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分外亲切。

一坐下，先念便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早有准备的袁庚便滔滔不绝说起来。

李先念副主席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点着头。这位解放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解放后已担任26年副总理，并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前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在这日理万机之中，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和内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来资金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忙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李先念笑道：“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瞧瞧案头的宝安县地图，指指南头以南的蛇口道：“就给你这个半

岛吧！”

袁庚一听，眉开眼笑了。他心里在想，那太多了，招商局还没有那么大胃口呐，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就够了。

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先念马上又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稍顿了顿，先念又以征询的目光望着谷牧副总理，问：“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胸有成竹道：“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袁庚又进一言：“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签个字，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先念一听，欣然道：“好，我批。”说着拿过批示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 1979.1.31。

彭德清与袁庚一看，相视一笑，眉宇间溢满无限的喜悦。

先念则瞧着他们说：“交通部就是要利用香港招商局，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

袁庚说：“有了地方，我们可以发展修船业，也可以拆船。”

先念说：“拆船可以搞大一点，轻工业部不是也搞拆船吗？要搞活一点，给他个任务。拆船有很多副产品，船长、大副的房间就有不少可用的家具。”

一个党中央副主席，对拆船业谈得如此具体深入，实令袁庚感佩。

先念又说：“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钱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长江二、三千吨的船要买一百几十条开到国内来嘛！我们被耽误了十多年，‘四人帮’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刘少奇讲的，其实刘并没有说过，是坏家伙编造的，要不是少搞了十几年，我们的造船业，现在已达到一千四百万吨了。”

先念联系到那年月配合小平苦撑危局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说：“那几年，什么都不好做，‘四人帮’总是横加干涉，凡是有赤字出现，都与他们有关，损失可不少！王洪文连拟了两个关于买船造船的文件，接着是凤庆轮事件。”

彭德清插话道：“还有更生轮”。

先念嘘了口气对彭德清、袁庚说：“现在好了，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些，国内外结合起来，很好。国内投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现在有了个路子，一千万吨船（包括沿海），十多年经验，没花国家一点钱，说明路子开了，对了，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干起来！”

年届七旬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先念同志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偕谷牧与彭德清、袁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11点45分，整整105分钟。

临别，先念又嘱谷牧尽快召集有关部负责人开会，将招商局这件事落实下来。

4. “特区”的由来

从中南海先念处出来，袁庚感到格外踏实、舒畅。为国为民奔波40余年，从来没有感到现在这样顺当、来劲。袁庚已年逾花甲，拼搏的机会不多了。眼下，中央的意向已定，就看我们怎么干了。对于涉外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袁庚也并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就被派去越南，参加了胡志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随后又由外交部派往印度尼西亚，当了七年领事；回国后在中央一个部，负责东南亚，包括香港在内的外事工作。“文革”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秦城监狱五年半。出狱后，袁庚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长，参与了不少涉外经济洽谈活动。三年后调到了香港招商局，算是驾轻就熟，虽刚上任两三个月，但对那边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很快就掌握了，他决意运用香港经济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到宝安开发一个蛇口工业区，先念已有明确批示，就等谷牧副总理召集有关方面来具体落实了。

得天独厚

谷牧办事从来就是及时、高效的。中南海谈妥后，只隔了一天，即2月2日上午9时许，一辆辆红旗、吉姆等高级轿车，南从灵镜胡同，北从西安门大街，缓缓拐进西黄城根街，进入了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院落。

那个特殊会议，就在这里的南会议室进行。

到会的有：国家计委段云、顾明，国家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彭德清、袁庚、江波等。

9点30分，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会议的谷牧开诚布公道：“现在主要议一议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香港招商局原来设想在香港设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批示。”谷牧一字不漏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把主要问题向大家说一下。

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谈到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

资银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从东南亚拥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的一些小银行，如恒生银行，抓住机遇，大胆贷款，猛然发展了起来。袁庚又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他颇有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要一万五千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英尺也要五百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又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在座的颌首称是。

特殊政策

“交通部与广东省已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袁庚着重说。

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

袁庚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委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两百元人民币。”说到这里，袁庚提高了嗓门：“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袁庚讲到这儿，打住了。谷牧对他说：“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笑了笑，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与会者听着，有的沉思，有的点头，有的若有所思。

财政部王丙乾道：“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不按国内的办法，而按香港的办法收税，在香港你们怎么纳税的，你们也怎么向国家纳税。”

袁庚一听，绽开了笑脸：“我双手赞成这个意见。香港为什么近十年之内工业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它是自由港，进出口都免税，吸收了大量外资、技术、人才。我们在香港纳的只有所得税。我赞成按我们招商局向港英当局的纳税办法向财政部纳税。”

外贸部刘希文说：“第一，对这样办无意见。第二，目前看来，你们的产品是为了满足交通远洋船的需要，

还涉及不到外贸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但具体怎么办,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

计委段云欠了欠身子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

谷牧插上说:“广东不仅两个县可以搞,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都可以搞。”

“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是否妥当?我的意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

谷牧点头:“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

计委顾明说:“一、这个地方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二、在国内销要按国家进口办法,要纳税;三、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这样就可以统一了;四、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

独立核算,要少干预为好。工资福利不能过高,也要有一套办法。一般在自由贸易区有所得税,所以要纳所得税。”

在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已到中午了,谷牧摆了摆手,说:“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按先念批的‘照此办理’起来。”谷牧把目光移向袁庚道:“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尊敬的读者,读毕这篇会议纪实,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主持会议的副总理谷牧,在会议开始、结束及中间插话,先后三次反复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行一步,作个过河卒,探探路子,牵动全国,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呐!

智慧的火花

1979年4月,中南海春意盎然。

· 檐头的迎春花,似金色的瀑布,凌空倾泻下来。

带着缕缕幽香的暖风,悄悄地溜进了窗户,轻拂着案前的红花、绿叶、金果。

邓小平坐在藤椅上,正静静地听着广东省负责人的汇报。

正在发言的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二十年前,他就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去年,中央派他去广东,主持全面工作。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频繁,是我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数是广东籍。每年从广东口岸出入境的外宾、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达数百万人次。开放、搞活,在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习仲勋通过广东经济的现状,阐明了中央对广东在经济上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非常英明、



▲ 特区三资企业中,工人们在劳动

正确与及时的。接着便谈了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规划设想。其中着重谈到：“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听到这儿，邓小平插话道：“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他一面听，一面沉思。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找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蹚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关系不大。

那么，这一块地方，该选在哪里呢？邓小平的手指随着目光在移动，移向南方，移向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汇处——深圳！

在座的都看明白：是把这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好呢？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都不准确。邓小平没有表态，他在细细寻思。

傍晚，参加了一天会议的邓小平在中南海院里散步，别说他年届75高龄，步履依旧是那样稳健，比他年轻9岁的习仲勋信步与他走到了一起。

邓小平与习仲勋，还是那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相识的，那次同桌吃的是朱老总做的四川菜。那时，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参与中央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谈起这段往事，似乎就在昨天，历历在目，两位老人还饶有兴趣。

他们边聊边走，缓缓从中海走到了南海边，平静的海面上腾着淡淡的雾霭，海边倒映着彩色的亭阁，浓覆的绿荫中传来百鸟的鸣叫声。倏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若有所思道：“深圳，就叫特区吧！”

“特区？”习仲勋一怔。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熟悉的四川口音，落地有声，扑向南海。

仿佛当年发布战斗命令一样，一场硬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邓小平的精心谋划下，将在山与海的交汇处打响！

5. 深圳河边

邓小平关于创办“特区”的指示一下达，谷牧副总理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飞往了南方。

50号文件

他们先在广东省连着开了十多天会议，接着又去

福建省，广泛征询，仔细分析，深入研究，返京后，形成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开门见山道：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势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批转的广东省的报告中，对计划体制、对外贸易、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劳动工资、物价政策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灵活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

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这份报告，还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为创办深圳特区拉开了序幕，插响了战鼓。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亲自挂帅，任仲夷、吴南生坐镇部署。

自从邓小平指定创办深圳特区后，广东省委遂决定在原宝安县城深圳所在地，建立一个深圳市，行政级别比宝安县还高半格——副地级，抽调省外经委主任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另从江门等地抽调曹喜芝、贾华担任副书记。又从省有关部门及地区，选调了40多名干部，一起开赴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他们算是创办深圳特区的第一批前线指挥官，集中住在新园招待所里——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楼上。

不料，张勋甫等一线指挥官首先遇到的并不是接洽外资、外商问题；而是要围追堵截外逃的民众。

人心外向与内向

中央对深圳“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风声早已传到了南国边陲，有些人误以为，这一下开放了，灵活了，可以撒开腿往香港跑。这些年来，从这里跑往香港的，几乎没有不富、不阔的。是啊，同样是打工干活，那边的收入比内陆高出几十倍！眼下，一听说“开放”了，“人心外向”的民众闻风便是雨，竟有共产党员抢先跑过去，在香港的山脚下研究如何在那里落脚谋生的……

这还得了，人去山空，还怎么引进外资？有情报说，今晚有许多人要集体偷渡。市委全体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动员全市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前往堵截。

这里与香港只隔一条蜿蜒而去的河，窄处不过几

米宽。河对面的土地本都是新安县(现深圳市)的,是三次不等条约,逐步割让给了英国。第一次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三次是1898年,英国人借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机,逼清政府签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陆地及邻近23个岛屿,共962平方公里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租”金分文没有。从此,河对面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没娘的孩子”,1842年离开祖国母亲时,只是个5000多人口的小渔村。没有料到,130多年后,这里成了拥有500万人口的国际大市场,一条崛起于亚洲的小龙!而一水相隔的深圳“同胞”依然冷冷清清,经济上落后了一大截。

这难道能怪深圳民众“人心外向”吗?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有位高级干部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趣事:1977年,邓小平与叶剑英来广东视察,省领导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这时,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顿了顿,又说,“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座的听了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政策很明确,不准偷渡外逃;这本来是边防部队管的,怎么说他们管不了呢?

时隔十几年,当深圳崛起后,深圳人谁也不想离开故土了,当年偷渡去香港的,也有些返回深圳来了。这时,重温邓小平当年这两句话,才恍然大悟:要不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边防部队又怎么能刹住偷渡风呢?

再说当初,算是难为了张勋甫,他一面疲于奔命拦阻偷渡者;一面又要千方百计建特区。

这特区究竟该怎么建?圈出一块地方,加工生产出口商品;划出一条老街,作自由市场,搞贸易活动,反正要开放、搞活,能引进外商、外资来就行。

不少外商也搞不清共产党为什么要办深圳特区,有的说,无非是要张开口袋赚我们的钱呗,可要当心,别忘记了当年的“公私合营”啊!有的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捞一把,可别错过了时机。一些小商小贩则不言不语,提包背囊走过罗湖桥来,兜售香港的喇叭裤、牛仔服,清仓的打工装;还有电子表,打火机等洋百货。

清静了多少年的老街,似乎热闹了许多。但尽是些小商小贩;大款巨富谁都不来,是啊,创业伊始,既无高楼,又少平地,怎么来呢?

叱咤风云

转眼就是第二年春天,深圳湾混沌沌,一片迷茫,春雨淅淅沥沥,连绵不断。茫茫雨丝中,出现了一群陌生的干部,走在头里的中等个子,壮壮实实,四方脸庞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他抬眼望望一滩泥泥浆,一汪汪

积水,操着上海口音问旁边的一位:“老秦,这儿的地势看样子比海平面还低。”

“是的,低两米呐。”老秦,即后来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

他又抬眼望望不远处的两座山包,说:“把这座山移过来,填平这个低洼区!”

老秦说:“对,我们计算过了,这两座山包有160万立方米土,恰可用来填罗湖小区。”

他点了点头,眉心蹙成了一个“川”字,似乎在深思、酝酿着什么。他就是九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他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撰写了一个颇有份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随后就飞到南方来了。

“老江!”一位身材顾长的干部赶了上来,他长方脸庞,略带一点广东口音,“看来,工程量很大,得有个总体规划。”说话的就是五年后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

江泽民点了点头:“胸中有了一盘棋,才能迈出高明的一步。”

“有些事,这次是否得定下来”李灏说。去年春天,他随谷牧来到南方,参加起草了具有历史性的“50号文件”;这一次,他又与江泽民一同南下,要解决一些创办特区的实际问题。

江泽民、李灏等在深圳实地考察一番后,又到了广州,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细致研究部署。决定将深圳特区,明确定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用;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广东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将深圳市行政级别再提半格,成正地级市,由吴南生兼深圳市委书记坐镇深圳,领导开发经济特区。

1980年6月13日,早晨闷热,吴南生率正地级深圳市的新班子成员秦文俊、黄施民、罗昌仁、丁励松等,一同登上了前往深圳的列车。

一到目的地,吴南生就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他们五位被一一任命为深圳市委正副书记、秘书长等职。

深圳市不到两年连升了两级,且有了五六位资深书记,可谓实力雄厚,风靡云蒸。

新班子上任后,首先按既定部署,大张旗鼓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由吴南生挂帅,省建委副主任廖伟具体负责,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共108位。108将集中在当时深圳唯一的高级招待所——华侨饭店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强手林立,百家争鸣。智慧的火花经碰撞而迸发,

经迸发而燃烧，经燃烧而融化，经融化而升华，终于产生了共识——

充分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土地充足、劳动力充裕等有利条件，努力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和良好的经营场所，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把特区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以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制订特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指导思想，尽管很不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拟订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在科学分析深圳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蓝图。

深圳市的总面积 2020 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 327.5 平方公里，东西长 50 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六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 110 平方公里。

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既不能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也不能成轴对称，而应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如果说特区仿佛是一排葡萄架，那么一幢幢大楼象是一串串葡萄，均匀地分布在绿色的长廊里。组团间隔有一条条绿化带，各组团的功能和人口分布合理；楼宇多姿多彩，楼层错落有致；公用设施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空气清新，公路四通八达。

经济特区由生活区、工业、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组成。计有三片（后定为罗湖、福田、南头三区），十八个区（组团，其中工业区就有十个）。

五彩纷呈的经济特区建设蓝图把深圳人的思想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何时能把这个画在纸上的神话世界变成现实，谁也说不下来。吴南生在抓总体规划的同时，正着手部署开发建设，他提出在罗湖区先开发 0.8 平方公里，后来觉得小了一点，在市委书记会上提出要大干，决定开发 2 平方公里。深圳人听了还为书记捏了一把汗：开发 2 公里，要多少钱啊！中央明确不给钱，借给的 3000 万元贷款，已花去了大半，还拿什么来开发建设经济特区呢？

6. 黄土变成了金子

正当深圳人被资金的匮乏困扰得举步维艰、叫苦求援的时候，深圳河对面的香港人笑道：“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呐！”

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一听，认真了起来：“别开国际玩笑了！”前不久，他与市委书记张勋甫去访贫问苦，“三代同室”的随时可见，有的婚后孩子都快上

学了，还是无房户。作为管住房的领导，心里有多焦虑啊，“要是真有金饭碗就好了！”

香港朋友又认真地说：“你们脚下踩的都是金子呀！”

“分明是黄土、荒地，哪是什么金子？！”

“别忘了，当年香港也都是这个样子。后来把荒地、黄土换成了金子，香港很快就发了，繁荣了。”

何以成金

骆锦星怔了一下，他是广东惠阳人，1957 年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惠阳地区当干部，了解香港的发展轨迹；对面的摩天大厦不正是这样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嘛。“不过——”他摇了摇头，想到宪法第十条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只能叹了口气。

香港朋友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走了。

骆锦星望着他的背影，望着对面影影绰绰的锦城，心里在嘀咕：“资本主义的土地是金子，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就不能变成金子呢？”

天渐渐暗下来了，落叶在寒风里呼呼地打着回旋，像是画着一个个问号。骆锦星去食堂吃完晚饭，没有回宿舍。晚上他总爱去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书报，思考思考。这会儿，他却什么报纸、什么文件都没有心思看，满脑子转的是土地、土地——

上下数千年，多少朝代，多少将士，为着土地，你争我夺，拼死疆场；又有多少劳苦的农夫，为着几分土地而拼死拼活，鞠躬尽瘁。到了后来，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则用“分田分地”动员组织起了千军万马，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将土地夺回到人民的手中。但这里属于人民的土地，为什么成年累月荒芜着，空闲着，不能用来造福于人民呢？骆锦星百思不得其解。他下意识地走到了书柜前，依稀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到过土地问题，但究竟在哪一篇里呢？他随手取下一本《列宁选集》，从目录上看到了“住宅问题”一节，便翻开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发亮了，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论说道：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对呀，在这缺少资金的过渡时期，将地租转让给社会，不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吗？”骆锦星不禁激动起来，拿起这本书就去找市委书记张勋甫。

“房产补偿贸易”

张勋甫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正在批阅文件，一见



▲ 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老板与外方老板

骆锦星推门进来，就笑道：“我正要找你”。

没待书记往下说，骆锦星就先将《列宁选集》上这段话读给他听。

张勋甫一听，又补充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骆锦星说：“那好，我们不妨租点出去，用租金来搞建设。”

张勋甫想了想，说：“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上头毕竟还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否先想个变通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张勋甫负责过省进出口委的工作，他油然想起已经采取的“补偿贸易法”：我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用此生产的产品赚得的钱，双方分成。想着，张勋甫就说：“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港商愿意出钱给我们盖房子，卖房所赚的钱双方分成。你看怎么样？”

骆锦星笑道：“好，这叫房产补偿贸易法，我看行！”

张勋甫点点头：“那就请那位港商来谈谈”。说着，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起来。

时值1980年元旦前夕，张勋甫让港商过了假日来谈。港商却在元旦那天急急赶来了。他叫刘天竹，算是第一个港商与共产党谈生意的人，骆锦星代表中方，在外宾接待室里与他洽谈第一笔房产生意。

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盖一个东湖丽苑，如何？”

刘天竹早看过那块地，就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锦星沉吟了一下，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天竹若有所思道：“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就在这1980年1月1日当天，开年大吉的日子，我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与港商刘天竹，签订了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产的合同书。随后，深圳市即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由骆锦星兼任经理。

刘老板拿到合同书，返回香港，马上请人设计，很快就将东湖丽苑的108套新房图纸设计出来了。到春节前后，刘天竹就将这画在纸上的东湖丽苑登报出售，这立即引起了港人的莫大兴趣。深圳的房地产必然看涨。当时香港的两室一厅已涨到20万港元，而一河之隔的东湖丽苑，一套又大又好的住房，还不到10万港

元,太便宜了,港人自然争先恐后来订购。没有几天,这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一售而空。

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从新加坡、泰国考察回来,路过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就与刘天竹商定,再搞同样的108套。结果,又是一售而空。

这216套图纸上的住宅,光定金,就是500多万港元。这是令深圳人所预料不及的。

东湖丽苑很快破土动工,钢筋、水泥、黄沙等各种建材源源不断运来,工地上一片沸腾。

与此同时,香港高资公司老板,《文汇报》老板等,也纷纷与深圳市房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签订合同,来深圳投资盖房。翠竹苑、湖滨楼相继破土奠基。

但是,有人偏不理解:“深圳的土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让资本家来盖房、卖房,不是搞卖国主义吗?”也有人责问:“你们这样做,报告中央没有?上级批准没有?”

恰在这时,省委副书记吴南生来了,他是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

面对种种风言风语,吴南生召集了市委常委会议。

会上,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列宁在苏联革命刚刚胜利的时期,就主张借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1/4和巴库的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3/4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吴南生说:“是啊,中央不给钱,地方财政也力所不能及,借外资发展自己倒是个好办法。”新书记、市长充分肯定了前任深圳市领导在房地产经营上迈开的第一步,决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继续往前闯。

深圳房地产业的开创时期——补偿贸易,就这样闯了过来。东湖丽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

合作盖房

深圳没有花钱,黄土上开始冒洋楼了。不过,深圳的开拓者又很快意识到:“中方虽然将拿到85%的卖房利润,但房却全被港人买走了,深圳紧缺住房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这该怎么办?”市委新任秘书长丁励松,专门找骆锦星商量这个问题。

骆锦星想了想,说:“那就再搞一种办法:不要钱,要房,即让外商出钱,我们出地,将盖成的房双方分成。”

丁励松笑道:“这叫合作盖房。”

根据香港行情、国际惯例及深圳的优惠政策,他们很快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合作盖成的房,高层我拿80%,外商拿20%;低层我拿70%,外商拿30%。这个

办法,通过新闻媒介,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迅速传开了,这又引来了不少前来投资的港商、外商。

就这样,深圳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时期:合作盖房。于是,国商大厦、金城大厦、高家花园等又破土奠基。

深圳纵横交错的马路在烂泥浆上延伸。

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蓝图渐渐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发;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这些都需要钱。

然而,“补偿贸易”的房地产利润,要待盖成了楼才能拿到,那还过得两三年;合作盖房,即使房盖成了,也只能分到房,拿不到钱。

可眼下,开发经济特区,急需钱花,吴南生把目光注向了房地产业,要求尽快拿出个办法下来。

收取土地使用费

“干脆收地租吧。”秘书长丁励松脱口而出。

秦文俊似有所思:“这样宣传起来不太好听。”

骆锦星说:“列宁在新经济时期谈到,可以收取土地使用费。”

秦文俊笑说:“对,就称收取土地使用费。标准怎么算,可以参照‘补偿贸易’与合作盖房,细细核算一下。”

骆锦星遵命,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低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要收4500港币;高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收5000港币。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中介地租每平方英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十一分之一。正是深圳的这个地价低谷,致使河对面的港人争先恐后来深圳做房地产生意。

很快,罗湖区0.8平方公里拟开发的土地,全部出手,计收到土地使用费上亿元!

至此,深圳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收取土地使用费。

14年来,一直在深圳房地产业上拼搏的骆锦星,回首以往时,对笔者说:开始被迫得无路可走,张勋甫点了房地产之火;吴南生接着把这火拨亮了;后来梁湘又加了一把油,使之熊熊燃烧起来;李灏则设法将之写进了宪法……

从来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看来一文不值的土地,就这样魔术般地一下子值了大钱。深圳人忽然觉得脚下的黄土、荒地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

金子不断闪光,特区日益兴旺……

(责任编辑 洛松)

毛泽东 为



1947年1月12日拂晓，位于晋中平川汾河畔的文水县云周西村，突然被阎锡山军队72师215团1营2连包围，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流血惨案。这伙荷枪实弹的阎军，在连长许德胜、指导员张全宝的指使下，胁迫村民们在村南的观音庙集合，依照叛徒石玺玉的告密，当众抓捕了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时，被捕的还有农民石三槐、石六儿、张树山、张年成、石世辉和71岁的陈树荣六人，他们是本村民兵、干部家属和八路军回乡战士。这时，阴森恐怖的局面，使刘胡兰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她便从容不迫地脱下奶奶临终时留给她的戒指环，掏出入党介绍人石世芳送给的清涼油盒和心爱的小手帕，一一交给身旁的母亲胡文秀。当敌人把她押到观音庙审问，要她供出其他同志时，她说：“不知道”。敌人以死相逼，刘胡兰昂首挺胸：“怕什么，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恼羞成怒的阎军连长许德胜等，将她和被捕的六位农民转押到堆满棍棒和摆着铡草刀的村民们面前，宣布捏造的“罪状”之后，先乱棍打后用铡草刀铡死了石三槐等六人。在这鲜血染红的冻土地、惨不忍睹的现场，敌人用木棒、枪杆逼回散走的村民，继而紧逼刘胡兰悔过、自白，刘胡兰说：“死也不投降”。许德胜为防不测，命令阎军士兵架起机枪对准村民，狂叫：“把这些人全扫光”。刘胡兰当机立断：“不许残害百姓！”她自己走近沾满血迹的铡刀，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刘胡兰14岁时，就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后担任村妇女救国会主任，积极参加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回赎土地工作，在区干部吕雪梅等的帮助下，领导妇女办冬学、做军鞋、征公粮、救护解放军伤病员，给部队战士送慰问品。1946年，阎军大举向文水平川进犯后，在处境十分艰险的情况下，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工作，同年12月21日，她还协助区武工队，处决了死心踏地和人民为敌又为阎军效劳的石佩怀。

刘胡兰等壮烈牺牲不久，新华社记者李宏森随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文县阎占区，当他听到这一流血大惨案后，立即赶到云周西村，以沉痛的心情含着眼泪，向知情的陈德照、石世芳等区干部和村民作了突击

刘胡兰两次题词

的前前后后

●马明

采访，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了两条消息：一是《刽子手阎锡山屠杀文水人民，云周西村和乐村农民多人惨死于阎军铡刀铁蹄之下》；二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后一稿用400多字，既颂扬了刘胡兰面对凶恶的武装阎军顽强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又揭示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这两条消息，经过晋绥总分社编辑甘楷分修改后转发新华社。总社分别于1947年2月3日、4日两天向全国解放区各报发了通稿。延安《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于1947年2月5日、6日先后刊登了这两条消息。《解放日报》刊登后一条消息的标题是引用了刘胡兰临终时的一句话：“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晋绥日报》在发表这一消息时，配发了题为《向刘胡兰同志致敬》的评论。

后来，延安各界慰问团来到吕梁前线慰问作战部队，2月4日至18日在文水活动期间，慰问团副团长、著名马列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张仲实从《晋绥日报》上看到新华社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以后，很为感动。他当即向中共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刘胡兰生前和被捕就义的详细情况，并派人到参加拆除文水县城墙的云周西村农民中间作了调查。延安慰问团返

回时，胡宗南军队正在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暂时撤离延安。有一天，张仲实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东器吴家寨，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情况和解学恭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题词的意见。张仲实提出：“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3月26日，毛泽东在他所住的窑洞里，听取了任弼时的汇报，心情十分沉痛。据目睹耳闻此情此景的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当时，主席轻声念着：“刘胡兰！刘胡兰！”两眼湿漉漉地，长吁一口气，挥笔疾书，第一次写下了“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八个大字。



▲母亲的控诉

1959年5月，在杀害刘胡兰烈士凶犯张全富、侯雨寅公审大会上，刘胡兰烈士母亲胡文秀愤怒控诉

毛泽东为刘胡兰的这次题词，于同年4月下旬的一天，通过内部交通辗转送到文水县神堂村，县长徐光远亲手把这次题词交给区长陈德照，并对他说：“这是毛主席为刘胡兰写的题词：‘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云周西村一带又是阎占区，你能不能把这交给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陈德照说：“能，我就是云周西村人，她家和我家是邻居。”不久陈德照就把毛泽东的

◀阎军杀害刘胡兰烈士使用的铡草刀



题词交给胡文秀。

文水县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如何尽快捉拿、惩办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全国城乡正在普遍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为了适应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发扬刘胡兰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胡文秀于1951年4月23日给全国的母亲们写了一封信。



▲刘胡兰烈士雕像

她在信中，追述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女儿和6位农民被阎军用铡草刀活活铡死的情景，并且响亮地提出：“请你们清楚地记下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欠下我们的血债吧！为了我们被杀害的子女，为了我们的子女不再受到残害，请你们踊跃地在保卫世界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字和投票，积极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吧！”

胡文秀的这封信，和新华社记者吴钢采写的《为刘胡兰报仇》的通讯，分别于4月29日和5月3日，由新华社总社播发，被许多报刊、广播电台采用。全国各地响应“胡兰妈妈”号召的数百封回信，像雪片似地飞向云周西村。他们中有人民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青年学生和妇女儿童，都说他们在看到胡妈妈的信以后，受到很大的感动和激励。信中不仅对刘胡兰的英勇牺牲表示无限尊崇，而且表示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决心，并订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有的还从报纸上把胡妈妈的信，剪下来寄给自己的母亲和姐妹。5月10日，新华社总社又向全国各报播发了《全国各地各界写给刘胡兰母亲的回信》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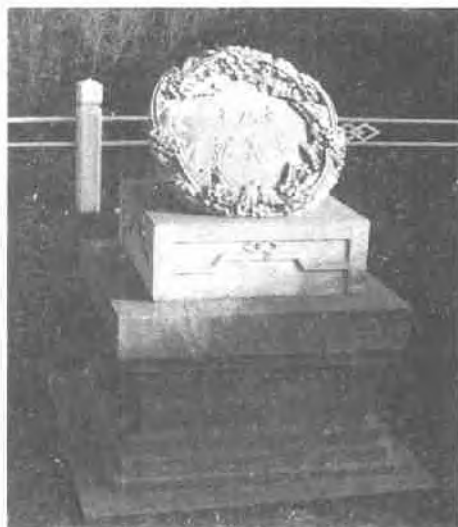
在云周西村农民举行的一次控诉阎军杀害刘胡兰

等烈士罪行的会上，有一位农民揭发了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德胜的情况。许德胜是亲自指挥并用铡草刀杀死刘胡兰等烈士的阎军72师215团1营2连连长。公安部门发现这一线索后，当即派人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从多方面证实许犯在文水解放后逃回原籍，继续作恶；1948年，祁县解放后，许又窜到祁县贾令镇，潜伏进“万和堂”药店当了炊事员，进行反动会道门破坏活动；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过群众检举被逮捕，同年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被枪决。新华社对这一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播发了题为《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德胜伏法》的消息。

另两个凶手是阎军72师215团1营副营长侯雨寅和2连指导员张全宝。解放后，侯雨寅隐瞒了云周西村惨案的真相，畏罪潜逃外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逮捕，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强大攻势下，他才坦白交待了在云周西村犯下的罪行，并且供出了张全宝躲藏在山西万荣县家中的情况，后经公安机关将张全宝捕获归案。1951年6月24日，在云周西村惨案发生的地点，举行了文水县各界24000多人参加的公审侯雨寅、张全宝大会，并对侯、张两犯处以死刑。会后新华社又向全国各报播发了题为《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张全宝、侯雨寅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伏法》的消息。

1957年1月12日，是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日子。共青团山西省委早在1956年12月11日就作出了《关于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在组织开展这项纪念活动中，有一件大事是要派人进京恳请毛泽东为刘胡兰第二次重新书写八个大字的题词。因为第一次的题词在战乱中被丢失了。当时，团省委宣传部

▼刘胡兰等七烈士就义处



宣传科长杨小池接受这个任务，进北京先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说明了来意，呈交了团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写题词的报告。大约一两天后，团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告诉杨小池：“已经把报告转交党中央办公厅，答复是：‘一定把报告转呈毛主席，让山西来的同

志先回去，毛主席写好后，便由中央办公厅直交山西省委。”1957年1月12日，在刘胡兰牺牲10周年前夕，毛主席为刘胡兰重写的“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题词，由青年团山西省委派专人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由我亲自采写的这一消息。

炎黄文化简讯

祭仪庄严肃穆 情节感人至深

强晓初杜导正等一行赴陕西祭黄陵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强晓初、常务副会长杜导正等一行，应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了今年清明节的公祭黄帝陵活动。

这天，春雨初霁，来自海内外的万余炎黄子孙，云集庄严肃穆的黄帝陵前，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主祭人、陕西省省长白清才宣读祭文后，我会顾问强晓初讲话，常务副会长杜导正敬献花篮。强晓初顾问在讲话中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为宗旨，凡是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益于祖国建设和统一，有益于凝聚炎黄子孙情感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尽心竭力予以支持。现在，陕西人民正在修黄帝陵，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积极支持这一盛举，把它做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当然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把全国的十几亿同胞和海外的数千万华侨、华人发动起来，像陕西省15个单位所倡议的那样：‘崇敬始祖’，‘奉献爱心’，我们相信，整修黄帝陵这一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伟大工程一定成功。”

民众代表敬献祭品的场面是感人的：他们虔诚地跑在陵前，献上亲手用面粉做的“百鸟朝凤”、“鸡年大吉”、“二龙戏珠”等形态各异的祭馍，以表达黄陵县十万守灵儿女对先祖的敬意。香港必丽洋行董事长叶嘉星恭敬地向黄帝陵三鞠躬，激动地说：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的精神和凝聚力，现在祖国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我们深感欣慰。各地华人也都在创造灿烂的业绩。我们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在黄帝陵前千叩万叩，相信祖国一定会统一，中华民族一定会繁荣昌盛。接着美国洛克维克国际公司火箭动力部科学家张良洲长跪陵前，将亲手写的祭文举过头顶，深深地三叩首，然后站起身，展开手中长卷，代表海外游子朗诵《炎黄祭》。他先以“大哉炎黄”、“美哉炎黄”、“壮哉炎黄”三章盛赞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尔后读“痛哉炎黄”一章，当他读到“割土赔款、民穷地疮，火德不至、受戮东桑，土德失瑞、蒙辱西洋，子孙不肖、怪怨爹娘，箕豆相煎、祸起萧墙”时，他激动不已，几乎泣不成声，闻者无不动情，当他以“幸哉炎黄”一章作结，歌颂我改革开放和新的建设成就时，大家又不禁报以热烈掌声。

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执笔撰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和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重要文件、文章；又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是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于1992年9月去世，享年80岁。作家叶永烈根据胡乔木同志亲属及有关人士提供的丰富素材，查证了大量文献资料，写出本文后又经其审阅认可。本刊征得有关方面同意，选发部分精采篇章，让读者了解这位人们久知其名却少知其事的——

政治风浪中

胡乔木在延安



的胡乔木

在庐山会议上 大力纠“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过份发热的头脑，稍稍冷却了一些。他几度表扬陈云。除了前文已引述过的毛泽东称赞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之外，还说过“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类的话，这“良将”、“贤妻”指的也是陈云。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泽东甚至要陈云全面负责经济工作，说“陈云当总指挥好”。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些。那是毛泽东从新华社编印的第二八〇一期《内部参考》上，读到了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之后，写了一信——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正是在这种“冷却”的气氛中，从7月2日起，在“清凉世界”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则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陈云和邓小平由于健康原因未出席会议。

会议最初的议题是继续纠“左”。如毛泽东所言：“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据李锐回忆，他和胡乔木、田家英同车从北京前往武汉，再转船到九江。李锐是毛泽东当时的兼职秘

书，他说：

“在火车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对五八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毛泽东一路上兴致颇好，诗兴大发，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抄给胡乔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传开。这么一来，使会议的气氛更为宽松。

胡乔木在跟李锐、田家英、吴冷西的闲谈中，说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陈云意见转告毛泽东的原委：

“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

胡乔木对于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论断，也表示怀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上山之初，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供会议讨论。他还指定七人起草会议纪要，即胡乔木、谭震林、曾

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以胡乔木为组长。

于是，胡乔木分十二个专题，由组员们分头去写。他自己写“形势和任务”这一总纲式的专题。不久，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议定记录（草稿）》，于7月14日印发后，便招来一些意见，以为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颇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作了发言，进行了申辩：

“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来，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工作了十八个年头，上庐山之后也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然而，就连他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上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急转为反右倾！

还算好，胡乔木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消息极为灵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辩之后的第三天，他得知庐山上的风向要转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张闻天要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即给张闻天挂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然而，张闻天不顾胡乔木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

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城、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担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

书生。

“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是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去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四、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

九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就在写这两封信谈论诗词的信中间，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等：“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信——

彭真同志：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选本，《四部备要》本头太大不便传送，未将原书送来。

文意颇好（末了还是要借书的早还，并不肯送人，不过这也证明借书之难），可以考虑请人译为白话，写一短文介绍，在《北京日报》或《人民日报》副刊发表。

敬礼

胡乔木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乔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议刚刚结束，1月20日，毛泽东便给田家英写了一信。信中写道：“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

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包括胡乔木、田家英，也包括陈伯达。

这么一来，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十八年以来，一直紧跟毛泽东，平平稳稳。虽说不久前毛泽东就陈云一事批评了他一回，不算太严重。这一回在庐山上，可谓惊心动魄，胡乔木差一点进入“俱乐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传入毛泽东的耳朵，知道是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

他还算“机警”，知道风向不对，马上作了那长篇发言，度过了政治危机……

不过，从此之后，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潜在的裂痕。这裂痕，他知，毛泽东知，表面上却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便写了一信给胡乔木——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内部矛盾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还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线路、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六、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之后，胡乔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亦即权威，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尽管胡乔木对于反右倾并不赞同，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不能不在政治上维护毛泽东。

这番长篇发言，是胡乔木的公开表态，意味着他要被动转为主动。

胡乔木这一长篇发言，毛泽东听了颇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内中不指名地提及胡乔木：

“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

“俱乐部”，指的是以彭德怀为首

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毛泽东自己带头作调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率一组下去，规定调查两个月，然后“都到广东过春节”。

那时，由于“高举”那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下乱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没有章程，全国农村乱了套。毛泽东派出调查组，为的是调查农村情况。

1961年2月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听了汇报之后，召开会议，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逢先知等。胡乔木参与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翌日，又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随着这《一封信》下发，全国掀起“调查研究热”。《红旗》杂志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61年



胡乔木和夫人谷羽在北京（50年代）

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

会议开幕时，胡乔木来了。没几天，胡乔木请病假，离开了会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

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说明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星期之后，正在庐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复一函，表示同意——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设法。问谷羽好。如你迁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

政治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政治秘书工作，由陈伯达一人承担。陈伯达权重一时，以致“文革”爆发时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胡乔木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发。

胡乔木患神经衰弱症，这是确实的。不过，他一病就病得那么久，内中有没有政治因素，这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了陈云、林彪、康生的病况。内中，康生、林彪的病，明显地带有“政治病”的色彩……

“一介书生”的 种种“故事”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报》，不再每日“评报”。

不再忙着写社论，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两头收到毛泽东的便函，不再接毛泽东的嘱咐办这事办那事。

胡乔木离开了中国的政治核心，离开了北京，“迁地疗养”去了。

于是，在“天堂”杭州，西子湖畔，每日清早总有三辆自行车悠悠地行驶。那便是胡乔木，还有他的秘书、警卫。沿着西湖转上几圈，算是早锻炼。平素不喜欢体育运动的他，此时只能选择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进入北京城之后，轿车进进出出，如今像学生时代那样骑自行车，他显得自在，仿佛年轻了许多。

他也爬山，或者跑步，或者散步。

原本昼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摆的钟，用不着连接发出“滴答滴答”声了。

毛泽东说他“一介书生”，这话倒是颇为传神。虽说他高官多年，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他在各地漫游、养病，留下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在湖南长沙，招待所里每日早餐供应豆浆，餐桌正中放一碟白糖。那年月，正是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白糖供应非常紧张。他一坐下来，便指着那碟白糖对众人道：“谁也别吃！”大家遵命，一直喝淡浆。招待所工作人员感到奇怪，这些北京客人怎么不吃糖？

他规定，每餐两荤一素一汤足

矣。招待所里知道他是中央首长，往往给他多加菜，他马上派秘书到食堂门口去“堵截”，不许再上菜。

夏日，他在大连海滨度假。招待所为他做的菜，依然是一道接一道。他下令退菜。留下三个菜，其余的原封不动退还。

食堂的管理员不解其意，以为退还的菜必定是胡乔木不喜欢吃的。于是，动脑筋变换菜谱。凡是退过的菜不再做给他吃。可是，他依然不断退菜——退菜之中有不少是他前几次曾留下来吃的菜。管理员实在摸不透胡乔木的胃口，他不知道胡乔木是嫌菜太多而退菜。

临走时，管理员对胡乔木秘书道：“你们首长的口味，实在难捉摸！我们开了几次会也没研究出来！”

秘书听罢，这才知道管理员误会了，以为是不合口味才退菜！唯一

一次例外，是食堂的管理员见了胡乔木，当面问道“首长喜欢吃什么菜？”

胡乔木漫而应道：“豆腐！”

胡乔木万万没想到，他的一句答语，使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忙了好一阵子。那招待所在大连棒槌岛上，虽说岛上有卖豆腐的，管理员不敢去买，因为正值炎夏，怕现成的豆腐不卫生。可是，招待所里又没有做豆腐的设备。怎么办呢？只好从大连运来石磨，运来黄豆，请来做豆腐的师傅。如此这般，才专为胡乔木做出了豆腐！

其实，胡乔木并非对豆腐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他以为，豆腐很便宜，所以也就漫而应道爱吃豆腐。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随口而说的一句话，却使那个招待所“兴师动众”了一番。

他来到哈尔滨休养。当地给他派了三辆车：一辆给他坐，一辆备用车供他的随行人员坐。另外还派了一辆警卫车，那是考虑到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需要加强警卫工作。

于是，胡乔木一出去，后边便跟着两辆车。他很不高兴，以为太浪费。他先要求去掉警卫车，接着，他要随从人员上他那辆车，可是，他后来发现，那辆警卫车，依然在后面跟着，只是远远地跟着罢了——因为警卫人员奉命警卫，如果离开了，出什么事，谁负得起责任？令他费解的是，那辆备用车是空车，也居然同样远远地跟着——因为随从人员上了胡乔木的车，超过了那辆车的额定载客人数，备用车不能不在后边跟着。万一警察发现超载，虽然因车内坐着胡乔木也许可以使司机免受处罚，不过车上超载的客人必须下来而上备用车……

胡乔木被弄得哭笑不得，当地的接待部门也被胡乔木弄得哭笑不得。

这种种“故事”，倒是活脱脱勾画出胡乔木的“书生”形象。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补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动了那次胃切除手



术后，留下的后遗症。

自然，也闹小小的笑话。外地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为北京人偏爱酸奶，给胡乔木的随行人员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疗养中他仍手不释卷，读书看报，随手写写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叶籁士，提出建议：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这样一栏，总题例如‘常用汉字的由来’（‘或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诸如此类），每期介绍一些字的古今繁简正俗演变，使一般人了解现在的几乎任何一个字都是经历过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革命历史画选》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语法上的错误：

“第一句：没有谓语，只有一个复杂的主语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谓语，但是全句太冗长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谓语，没有主语。第六第七句：都没有主语……”

那篇序言，是这样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悲壮曲折道路，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惊天动地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怕困难，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以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有着重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美术家的十分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的意见，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他用“评报”式的目光扫视那本画册，立即发现了问题。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理所当然引起了震动。他们当即回信，感谢胡乔木在“百忙”之中，给予指正。

胡乔木见信之后，又于1962年11月30日复函，淡然写道：

“我现在是在养病，没有百忙，因此才会作这些好事之谈。”

这句话，倒是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

确实，他正因为“没有百忙”，所以写了许多信，作“好事之谈”。

1963年2月14日，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写了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作“好事之谈”——就该社所出的《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提出了详尽的意见。此外，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见，诸如：

“已逝世的本国作者，和重要的外国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签名式和生卒表？”

“有些书中的专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译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后面也可加原文。如果学术论著，能编索引最好。”

如此“好事”意见，开列了一条又一条。信末，他谈及了自己的近况：

“拉杂罗来，不觉已有许多。由于生病，很久没写过什么东西了，现在是利用写信来练习恢复作文的能力，同时也是利用病假来说这些琐碎的闲话。”

在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我的秘书商恺同志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一册《自从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此事可谓“好事”之举。

他关注着《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给包之静去函，提出意见。

他关心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传》一书，把清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很好。顺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标点上的校改”。

他发觉“现各种书籍广告太少见，对读者很不方便”，于1964年3月14日致函楼适夷，要求加强新书广告工作。

他见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剪下，于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讨论“芙蓉国”，为的是解释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好

在胡乔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养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与他无关了；

那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以及《二十三条》；

那与苏共论战的《一评》、《二评》直至《九评》，直至《二十五条》……

林彪崛起，鼓吹“四个第一”，“活学活用”；

江青开始“露峥嵘”，抓“京剧革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病中的胡乔木，很少跟毛泽东联系。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但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

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三五—三七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问江青同志好。

胡乔木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封信表露了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尊重，对于毛泽东著作的一贯关心。

这位《人民日报》的“婆婆”，已经许久未对《人民日报》发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连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绩伟学习3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认为按语“要言不烦，却很能引人入胜——入马列主义之胜，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在这些方面学学《解放日报》和其他办得好的地方报，使版面上的革命空气和理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绩伟。胡乔木写道：

“在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方面似乎还没有站到靠前列。”

他以为《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办得不错。他要求把副刊“由只是文人的地盘变为工农兵和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地盘”，要“见缝插针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胡愈之，对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文改会工作人员一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还批评道：

“继续让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空谈、空想、主观、片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占据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言而喻，这是胡乔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来了那样一通批评。

这时他写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谈”，不是“琐碎的闲话”，而是又在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虽说他仍在请长期病假之中，虽说此时的毛泽东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误之中。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病中读诗吟词，胡乔木又发诗兴，不过，与以往不同，过去他只写新诗，这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4年10月，胡乔木写了第一首词《九州歌头·国庆》——

茫茫大陆，回首几千冬。人民群众，称勤勇，挺神功。竟尘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种，自由梦，义竿竿，怒血进。诃途穷。忽震春雷，马列天涯送。党结工农。任风惊浪恶，鞭影指长虹。穴虎潭龙，一朝空。

喜江山统，豪情纵；锤镰动，画图宏。多昆仲，九州共；架长风，一帆同。何物干戈弄，兴逆讼，卖亲朋，投凶横，求恩宠，媚音容。不道人间，火炬燃偏猛。处处春浓。试登临极目，天半战旗红，旭日方东。

胡乔木在1965年1月21日复大学生耿庆国的信中，谈及自己写词的一些情况及见解：

“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写出来的。

“词这种文学体裁很特殊，严格地说来是已经过时了，要学习写作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以便掌握有关知识和技巧，因此我并不鼓励你认真去写它……”

“我近年由于得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也因此才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虽然它们的内容完全是革命的，没有旧诗词中常见的那些坏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如列宁所说，写革命都不如实干革命更有趣”。

一发不可收。胡乔木对于填词一下子入了迷，先是1964年10月便写了七首。不过，如他自云，他的诗词“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诸如他看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便写了一首

《贺新郎·看〈千万不要忘记〉》：

一幕惊心戏。记寻常亲家笑面，肺肝如是。镜里芳春男共女，瞎马悬崖人醉。回首处鸿飞万里。何事画梁燕雀计，宿芦塘那得垂天翅？天下乐，乐无比。

感君彩笔殷勤意，正人间风云变幻，纷纷未已。兰蕙当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摇尾；君不见烽烟再起？石壁由来穿滴水，忍江山变色从螻蚁？阶级在，莫高睡。

胡乔木学写旧体诗词，不言而喻，受毛泽东的感染。写旧体诗词，使他与毛泽东有了同一爱好，借以沟通，如他所言，“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这“风尚”来自毛泽东。

胡乔木把自己最初所写的十六首词，抄呈毛泽东。果真，毛泽东非常喜欢——虽说当时毛泽东正开始就四清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仍忙里偷闲，为胡乔木改词。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主席：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因现停刊改送《人民文学》）。（注，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两个字。幸同时寄呈郭老，他详细地推敲了，给了我一封长信，除指出以上错漏外，还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便于您最后改定，我向人民文学社要了清样（结果不知怎的寄来了原稿），想根据郭老的指点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觉得两可的，就只注在上面，请您选定。有几处修改要加说明，用纸条贴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续写了三首《水龙吟》，重加排次，使这一组词相具首尾，补足稿中应说而未说的方面，请您审阅。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志和康生同志了，请他们把修改的意见直接告诉您。

《沁园春》一首，在此曾给林乎加

同志和陈冰同志看过，后来又把他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曹祥仁两同志说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批语：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响应。

敬礼

胡乔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

写诗词，使久违了的胡乔木，重新与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诗词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之修改，退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又退；胡乔木又改，又送……就这样，胡乔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这是自从他请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频繁联系。

写诗词还表明，胡乔木头脑清楚，具备写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工作岗位。

江青警告： “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对于胡乔木是异乎寻常的。

这天，胡乔木并未为《人民日报》写元旦社论，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词十六首》。

更异乎寻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居然也同时发表了《词十六首》。

沉默多时的胡乔木，忽然以诗人的身份，站出来亮相了！

显然，这是胡乔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讯号。

胡乔木这样谈及他的《词十六首》：

“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

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象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胡乔木《词十六首》以“高规格”发表，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周振甫两番诠释《词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则对《词十六首》作了讲话。

陈毅于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草率，但稍晦涩。主席又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云云。把这消息告诉您，供您参考。您填的词我是能懂的。我认为旧诗词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证明。因此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大创作是等着您的，更以此为祝！中国新体诗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张从旧体诗略加改变去作试验。我写新诗亦习作旧体，就是想找一个办法有助于新诗的形成。这想法不坏，但实践还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词，便大喜，以为我们是同路人中也。自然您比较严守词格，这是对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但也有到了大破规矩的时候，便更好些，这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陈毅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的首肯，“元帅诗人”的称赞，广大读者的鼓励，使胡乔木诗兴更浓。

他不断地写诗词，每月数首，在1965年又写出《诗词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夺印》，写了《梅花引·夺印》一词：

领袖语，牢记取，百年大计争基础。背行囊，带干粮，眉飞色舞队下乡忙。当年入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

社藏鼠，欺犟犟，不爱贫农爱地主。话连篇，表三千，偷梁换柱黑网

结奸缘。人间自有青霜剑，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他的诗词，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特色，“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

内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脱一些，也就更为隽永些。现录二首：

“谁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澜，载得风帆，踊跃奔腾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须怨？不上高山，”突兀颠连，怎见人间足壮观？”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缠绵效傅蚕？孤芳绝代伤幽谷。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胡乔木不断地写诗词，不断地朝毛泽东那里送。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时，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诗词“终日把玩推敲”，帮他逐句修改。江青极为不悦。正因为这样，江青后来曾当面斥责胡乔木道：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胡乔木的“诗词热”，至1965年6月嘎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写诗词的“雅兴”——那时江青已成了阶下囚了。

江青早已 对他不悦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自然并不始于，也并不由于胡乔木的诗词“干扰”了毛泽东的工作。

平素，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总少不了要与江青接触。他们之间除了“你好”、“最近身体好吗”之类“礼貌用语”之外，别无什么来往。

江青对于胡乔木的不悦，由来已久。

笔者手头有一份“文革”中红卫兵为了“歌颂”江青而编写的“大事记”，内中倒是多处点了胡乔木的名，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悦于胡乔木。这份“大事记”的全称

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与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斗争大事记》。反面材料正面用，如今也还是有点用处的——

△1949年4月

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胡乔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领导，后又归属文化部。以江青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不移地认为电影事业同样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50年3月——5月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经周扬、胡乔木一伙批准，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并在报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1950年9月8日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胡乔木作长篇报告，公然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极力反对电影表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会上，江青同志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0年9月14日

在胡乔木提议下召开讨论1951年一般故事片题材计划的座谈会，江青同志不怕暂时的、表面的“孤立”，继续坚持斗争，又一次明确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个来。”但胡乔木和江青同志大唱反调，胡说什么“描写人民生活的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根本题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江青同志对胡乔木、周扬等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抗拒对《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尖锐的批评。周扬一伙极为不满，伺机攻击江青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妄图反攻倒算。



胡乔木一家(50年代)

从这些“文革”资料中可以看出，江青和胡乔木的矛盾，早已产生。江青和胡乔木的关系颇为微妙：论职务，胡乔木是江青的“顶头上司”，因为江青那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而胡乔木则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然而，江青并不把胡乔木放在眼中，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而胡乔木是毛泽东秘书。

江青总是把胡乔木视为“周扬一伙”，当然也有历史上的原因：三十年代，当江青（蓝苹）大闹上海电影界时，胡乔木担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周扬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他们深知当年蓝苹的底细。

不过，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养，直至1962年，一直“锁在云雾中”（内中只在1954年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而露过面），也就与胡乔木没有“磨擦”。胡乔木对她敬而远之，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一笔“问江青同志好”而已。

然而，随着江青权势的不断膨胀，随着“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讨伐”胡乔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来，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革”原来不会“革”到他头上的。他被划入“另册”，大体上有几桩原因：

第一，毛泽东抨击中宣部是“阎王殿”，而他一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第二，那桩影片《清宫秘史》公案；

第三，那桩《海瑞罢官》公案。

《海瑞罢官》 的“黑后台”

众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揭开的。

细细追究起来，最初鼓励吴晗写海瑞、歌颂“海瑞精神”的，竟是胡乔木！

对于这一点，吴晗本人说得非常清楚。郭星华曾回忆在1966年3月和吴晗的谈话：

“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

《海瑞罢官》成了“文革”的导火线；约吴晗写海瑞，也就成了胡乔木倒台的导火线。

其实，号召向海瑞学习，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

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着“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躺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4月3日晚，毛泽东细读《海瑞传》，极有兴味。

翌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了海瑞的故事。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向来很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觉得应该写一篇《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便全党、全民都从中领会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和推崇。找谁写呢？他想及了明史专家吴晗。于是，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

吴晗对明史烂熟，又是快笔头，迅即挥就《海瑞骂皇帝》一文。《人民日报》于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刘勉之”——吴晗的笔名。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劝周恩来也看看《明史·海瑞传》，并对周恩来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于是，吴晗又写出《论海瑞》一文。只是稿子送到时，胡乔木上庐山了。

在庐山上，面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尖锐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发动了反击，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这时，毛泽东虽说近乎“叶公好龙”，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只是忽地又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两类。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

本文作者（左）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



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牵强的。不过，他所说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倒是实话，他确实处于这样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乔木下山后，读了吴晗的《论海瑞》，向他转告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最新论述。于是，吴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话：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人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边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

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论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吴晗“再接再厉”，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江青视《海瑞罢官》为眼中钉。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泡制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那年月，什么事情都讲究“揪黑后台”。胡乔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罢官》这“大毒草”的“黑后台”，于是乎在劫难逃了！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印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革”紧锣密鼓声，震撼着华夏大地。

这时，胡乔木在杭州疗养。毛泽东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文革”作准备。

也就在这时，一班“笔杆子”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忙于起草《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名义上由

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起草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为起草小组成员——再也没有胡乔木的份。

最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张春桥了。《通知》每改一稿，张春桥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泽东。毛泽东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张春桥。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国大地卷起了大字报狂潮。

毛泽东仍在杭州，遥控着北京的“运动”。就在毛泽东如此忙碌的时刻，胡乔木求见毛泽东。因为胡乔木已经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他预感着不祥。知道毛泽东也在杭州，希望见一次，谈谈心里话。

往昔，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只消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就能见到。如今不比往昔。胡乔木求见，不知什么原因，迟迟未见答复。

不予答复，也许意味着毛泽东不愿见他。于是，胡乔木打点行装，与夫人谷羽以及秘书、警卫坐一辆小轿车，怅然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计划由上海回北京。

轿车刚刚抵达上海，忽地从杭州打来电话，说是毛泽东要接见胡乔木。

急匆匆，轿车掉头，又从上海重返杭州。

急匆匆地回去，急匆匆地见面，见面时胡乔木思路全乱了，原来要向毛泽东诉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

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就这样，简短地见了一面，毛泽东就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胡乔木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跟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此后，当毛泽东回到北京，虽然胡乔木曾希望求见毛泽东，却被江青挡驾了。

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毕竟对毛泽东充满感情。虽

说他这一生不知跟毛泽东见过多少次，但这最后一次谈话实在令人太遗憾了。此后，他多次跟家里人说起：“我最后那次见主席，怎么会把要讲的话都忘了讲呢！”

这遗憾，永远不可弥补。

自从这一次与毛泽东诀别之后，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也就画上了句号——虽说自从他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期病假以来，政治秘书一职已名存实亡。通常，总是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实际上是20年，即从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当胡乔木刚刚回到中南海颐园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约他一谈。

康生有什么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

康生，正是权重一时之际。他跟胡乔木寒暄了一阵，无非是“最近身体好一些了吗？”之类。接着，他便进入正题，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

从1949年起，胡乔木便住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一住十七年。如今，为什么要迁出中南海？

康生所说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颐园里你那房子要拆……

当然，即使是那里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乔木住在中南海别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乔木在中南海外找住处。显然，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乔木从康生那里回来，心境是沉重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就在中南海里，发生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事，虽说他当时在杭州，后来才听说：

那是田家英，在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于中南海喜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泽东的一份谈话记录时，删去了几句关于《海瑞罢官》的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这样，在“文革”大幕刚刚拉开之际，毛泽东的三位秘书的命运便泾渭分明了：

正直刚烈的田家英死了；

书生意气的胡乔木靠边了；

善于投机的陈伯达高升了。

当然，康生找胡乔木谈话时，还算是“客客气气”的，胡乔木毕竟还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田家英呢，他是被“停职反省”，限时限刻搬出中南海。

据云，当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着手“清理中南海”。要胡乔木迁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乔木谈，由康生出面。

于是，胡乔木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乔木看了十余处房子，选中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幢房子——那里原是某国驻华大使馆。他喜欢那房子有很大的书库，可以安顿他数万册藏书。

就这样，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胡乔木离开了中南海……本来就沉默寡言的他，这时话更少了。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胡乔木牢记住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嘱：“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1966年6月6日，胡乔木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当然，光是听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也不行。他也必须亲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儿去呢？去儿子那学校吧——北京邮电学院。虽说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不料却从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被这个学院的红卫兵们“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上面印着胡乔木的名字，使胡乔木稍稍松了一口气——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肖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虽说按照他的资历，理应是副主任。不过，他能列名委员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

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于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没有碰胡乔木：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而胡乔木呢？仍是候补书记——既没有升为书记处书记，也未撤职，保持原职。

会议结束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那天，胡乔木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新华社的电讯之中。不过，他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地方，未敢走过去跟毛泽东说上几句。他跟别人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按规定的位置木然站着，如此而已。

胡乔木神情沮丧，是因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找他谈话，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清宫秘史》、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庐山会议直至《海瑞罢官》……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检查，表了个态。这天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宣布：“我犯了错误！”

8月17日，胡乔木提出：收缩工作，精减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

劳动。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他的父亲胡启东在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被砸，父亲胡启东晚年住在胡乔木家，于1957年2月病逝，葬于八宝山。他的墓碑，是由于右任的弟子、书法家胡公实写的。母亲夏氏也住在胡乔木家，后来死于肺结核。在“文革”中，时兴讲成分，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虽说是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在“文革”中被骂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乔木呢，也被斥为“大地主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从天安门上下来，便忙着写检查。8月28日，胡乔木改毕检查，派人送呈毛泽东。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胡乔木虽然已经处境维艰，还是收到了入场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表情，更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对胡乔木停发文件。这是极为严重的讯号，意味着他从此正式“靠边”了！

胡乔木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降低工资，或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取消哨兵、厨师、专车。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并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批评。

这样，9月15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胡乔木便再也没有收到入场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门城楼的资格。须知，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都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呢。

胡宅离天安门广场甚近，广场上那“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不断传入胡乔木耳中。他木然地听着，此后，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胡乔木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只能在家中写检查。

胡乔木提出了写检查的计划：

一、关于《清宫秘史》的检查；

二、关于《海瑞罢官》的检查；

三、关于庐山会议的检查；

四、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检查。

这位当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笔”，如今成了“检查一枝笔”！

不过，他就连写检查，也非常认真：他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有关《清宫秘史》的资料；他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信，请教有关问题；他还要查阅《人民日报》的合订本……

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为“周扬一伙”，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阎王殿”指中宣部），甚至还提到他的名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篡改党史”、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是“大毒草”！

最初，还讲究“内外有别”，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不外传。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何况，那“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往外抛材料，巴不得趁此混乱之际整掉一批宿敌冤家……

北京邮电学院 红卫兵“盯”住了他

终于，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长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标语：“陶鲁笏、胡乔木回院作检查！”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北京城：胡乔木挨批判啦！

大字标语上所谓“回院”，指什么“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

本来，胡乔木跟北京邮电学院没有工作关系。仅仅因为儿子在这个学院上学，学院党委书记杨思九的爱人王榕跟谷羽很熟，而毛泽东又嘱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他便上那里看大字报。他毕竟是“中央首长”，来到那里，工作组组长朱春和要他讲话。6月18日，他在那里讲了话，无非是要师生们听从工作组的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

主张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不料，毛泽东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后，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认定派工作组是路线性的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

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便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称之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早在8月23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便已经给胡乔木写信，对他6月18日在该院的讲话，提出批评。胡乔木当即回信，承认错误。

在《红旗》国庆社论的“鼓舞”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于是，10月12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也就刷出了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

在开会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通过邮电部，给胡乔木打电话，要求他翌日来校出席批判大会。胡乔木没有去，写了一张大字报，承认错误，派秘书送到了北京邮电学院。

那时，利用年轻、狂热的红卫兵们“冲击”老干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大“发明”。清华大学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刘少奇，便是一例——他们跟清华大学“结缘”，也是因为孩子在那里上学。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便紧紧“盯”住了胡乔木。

10月17日，胡乔木感冒，病倒了。10月20日，他接汪东兴电话，说是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来到中南海接待站，强烈要求胡乔木到该院作检查。

看样子，光是写信、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还不行。10月26日，胡乔木派出秘书前往中南海西门，接待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向他们承认错误。

红卫兵们死死“盯”住胡乔木，非要他去学院作检查不可。无奈，10月28日，胡乔木在中南海警卫团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答应去该院作检查。

胡乔木被红卫兵们“缠”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来到北京邮电学院，参加红卫兵们的“控诉工作组”大会。中午回家。当晚七时半，他又到该院，向全院红卫兵作了公开检查。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人们不由得缩起了头颈。

在胡乔木住处附近，忽地来了几位陌生的年轻人，打量着大门，打量着四周的围墙。用军事语言来说，那便是“侦察地形”。虽然胡乔木在家中，对于围墙外的异常动向毫无所知。

25日晚七时，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红卫兵红袖章的北京邮电学院学生，闯进了胡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红卫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家！自然，他们也不是吃了豹子胆的——事先已经跟那权大无比的“中央文革小组”打过招呼。

胡乔木家，存有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乱糟糟的时候也不能流入外界。虽然在一片“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中，胡乔木和夫人谷羽被红卫兵看管起来，胡乔木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是拨通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中央文革小组”马上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物，到了胡宅，声称：“我们赞成红卫兵们的行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也来人，提出：“胡乔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办、红卫兵三方共同派代表进行封存，然后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红卫兵不得把文件带走。至于胡家的书、画册，红卫兵要对其中的‘封、资、修’采取革命行动，可以，但是带走时必须留下收条。”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意见。

胡乔木家的文件多，书更多，抄家颇为费时，进行了一夜。

胡乔木很焦急，给汪东兴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运往中共中央办公厅。

红卫兵们来不及运走那么多书，就在乱翻一通之后，在书库门上贴了封条。在书库中发现了一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样书，被红卫兵拿去当“大批判”用的“反面资料”。

在抄家即将结束之际，红卫兵节外生枝，要把胡乔木押往北京邮电学院去批斗。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

周恩来很干脆地答复：“不能带走！”

工作人员把电话耳机给红卫兵听。周恩来对红卫兵明确地说道：“为什么要把胡乔木带走？不能带走！你们要他写检查，他可以在家里写嘛！”

周恩来的话，红卫兵不能不听，一番风波平息了。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

中南海的“红旗革命造反派”来了，兴师问罪；

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风雷激战斗组”也前来造胡乔木的反；

《人民日报》社的“井冈山战斗团”、“遵义红旗战斗团”、“红卫军”强烈要求胡乔木去作检查；

……

就连聋哑学校的学生，也来要求见胡乔木，要批判他。

胡乔木处于“围剿”之中。在各路兵马里，最为胡搅蛮缠的，要算是离胡乔木家不过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班娃娃们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况就在胡宅跟前。

胡乔木怎么会把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盯上的呢？

此事说来，真是那般不可思议：1966年9月30日，为了表示对

于国庆节的庆贺，虽说胡乔木已不能为《人民日报》写上一篇国庆社论了，倒是仍不失“书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笔，在自家外边的围墙上，写起标语来。

正巧，那所中学的两名中学生走过来，认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就跟他聊了起来。两名中学生难得有机会跟胡乔木谈话。回去后，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而且称之为“胡乔木九·三〇谈话记录”。

10月12日，西长安街上出现要求胡乔木“回院作检查”的大字标语，马上就传入这所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当然也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一箭之遥的“大首长”。胡乔木那份“九·三〇谈话记录”，自然也就成了该校难得的“大批判资料”。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抄了胡乔木家，这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马上“配合作战”，于12月26日给胡乔木贴了大字报，并要求胡乔木去该校作检查。此后，几次三番派人找胡乔木，“盯”得比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更紧。

胡乔木这枝笔，抨击过蒋介石，抨击过艾奇逊，抨击过赫鲁晓夫，抨击过尼赫鲁，此时此刻，他的笔却不能不忙于向红卫兵们写检查。就连那所中学的“主义红卫兵”们要他写检查，他也不能不写。

紧接着，一连串的批斗开始了：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冲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

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游街批斗。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骨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搀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车……

胡乔木哭了！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8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揪去，押往那里。下午1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

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正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代，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二十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发。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诤诤的。

大抵是胡乔木再度挨斗的情况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8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跟胡乔木及秘书商恺谈话，宣布三条规定：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据云，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了。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代”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

戚本禹的文章 掀起大风波

胡乔木才“太平”了一个月，陡地又起大风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打针、取药。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谈至6时。一切都还“太平”。

凌晨两点多，正是夜深人静之际，胡宅门前忽地响起了“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七八十名红卫兵来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围墙上刷了大标语，并且又把胡乔木斗了一通。

红卫兵们怎么会在凌晨二时多前来贴大标语呢？

那年月，讲究“闻风而动”。红卫兵们“闻”到什么“风”呢？

那是因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发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那篇长文曰《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载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红旗》是半月刊，那时乱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当夜，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红卫兵们刚刚听了广播，立即“闻风而动”了。

虽说胡乔木已经被斗了多次，上了大字报，上了小报，而这一回却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对他来了个“半点名”，意味着对他的斗争猛然升级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提及胡乔木的——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者注：指刘少奇），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

谁都明白，这“胡××”即胡乔木。在当时，这叫“半点名”。

从戚本禹的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对于胡乔木的宿怨，确实由来已久。虽说一个月前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还在关于“免斗”胡乔木的报告上画了圈，此刻从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刀光剑影，才是他们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发表，使一个月前汪东兴所传达的三项规定濒临作废。胡乔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热点人物”。

4月4日晚，胡乔木接到电话，说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学操场开大型批判大会，斗争他。参加的单位有人民大学“三红”（即“红卫兵”、“工人红卫队”、“东方红”）、中共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连队”、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只是来了辆卡车，在胡宅门口大呼了一阵“打倒胡乔木”之后，扬长而去。

紧接着，12日又接北京邮电学院“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的通知，说15日下午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陪斗者为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胡乔木搬出那三项规定来对付。谁知对方竟说：“请示过‘中央文革’，已经同意！”

于是，“免斗”牌失效了。15日上午9时半，胡乔木便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下午1时45分，当胡乔木被押进会场时，陪斗者不仅有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居然还有彭真！这表明，批斗大会的幕后操纵者，确实是“中央文革”！

24日，胡乔木又被拉到中国科学院批斗，又是“喷气式”，恢复“老规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学研究所来电话，告知5月4日举行“北京市心理学界斗争批判大会”，主斗为胡乔木。对方声称，已经得到“上头”同意。参加批斗的单位除了心理学研究所之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乔木面临着又一次批斗之际，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意外 地来看望他

不仅胡乔木没有想到，可以说，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来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①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云，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

“停车！”毛泽东突然发出了这一

① 据胡乔木之子胡世英回忆，是4月26日，但据胡乔木夫人及身边几位工作人员回忆均是5月1日。

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评，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

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12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足不出户 闭门闲居

自从1967年5月1日开始，胡乔木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他的日常事务大体有三：一是接待外调；二是继续写检查；三是看病。

他家变得“门庭若市”，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排满他的日程表。

从前来外调的单位来看，大体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范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计委，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故宫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调高潮过去之后，他渐渐有功夫看书、看报。他曾主动要求去清扫大街，说是为人民服务。扫了几次，被工作人员劝住了，毕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三百元的工资中，抽一百元作为党费上交。工作人员还是劝住了他，按一般规定交党费。

渐渐地，他越发变得清闲。“文革”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就在胡宅那围墙之内生活着。

他在院子里种菜，种瓜。

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把《资本论》重读了一遍，还细读了许多马、恩、列、斯著作。

他渐渐被世人遗忘。

他在自己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他家离天安门广场太近了。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总可以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声、高音喇叭声中反映出来。这时，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宁静。

照理，如此空闲，该是写诗填词的大好时机。他却诗兴全无，一首新作也未曾写出来。

他每日仍细细看报，只是毋需“评报”了。他总是很注意报上的黑体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泽东，依然是他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未被撤销过。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连代表都不是，党内种种职务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收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不错嘛！”江青不敢吱声了。

不过，这个专案组，后来倒给胡乔木“帮了忙”：在出版文集时，提供了不少资料！

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

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

平心而论，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个春秋，一向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又不出头露面，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至于“文革”中所罗列的胡乔木的“错误”，毛泽东其实也很明白：

关于《清宫秘史》，胡乔木无非是转达了刘少奇的话罢了；

关于《海瑞罢官》，胡乔木的初衷是要宣传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见解；

至于庐山会议，胡乔木倒是讲过一些反“左”的话，那也是毛泽东上山之初反复强调纠“左”……

随着邓小平 的复出而复出

面壁九年，到了1975年6月，63岁的胡乔木忽地频频走出家门，活跃起来了。

他获得了一项任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乔木怎么会突然复出？

那是因为邓小平复出！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3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又写明，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也就开始了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任命胡乔木为主任。因为邓小平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首当其冲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整顿，他点将就点到了胡乔木头上。

胡乔木一下子就变得忙碌起来。据他的日记记载，光是去邓小平那里，就去了25次之多！

邓小平很聪明，他深知要想理

顺国民经济那混乱的局面，必须借助于毛泽东著作的威力。他很欣赏毛泽东1965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讲话，胡乔木加以整理。1975年7月上旬，胡乔木整理好《论十大关系》，邓小平即致函毛泽东：“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要求毛泽东审定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却表示暂时不要公开发表。

邓小平面对被“人四帮”搞得乱糟糟的局面，着手艰难的整顿。1975年7月18日，邓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国科学院负责党组工作并兼任副院长（院长郭沫若因病休养）。胡耀邦一上任，便着手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胡耀邦花了二十多天，写出了初稿。用他的话说来，“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8月11日，胡耀邦带着《汇报提纲》到邓小平那里去，念了一遍。邓小平听罢，说：“很好！”

邓小平要胡乔木帮助修改《汇报提纲》。于是，胡乔木这枝笔，又“重操旧业”了。

闭门九年，胡乔木读了不少书，此刻派上用场了。胡乔木为《汇报提纲》指出了点睛之笔：“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样，《汇报提纲》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就有了理论依据。

胡乔木还为《汇报提纲》加上不少重要的话：

“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

“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

“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

胡乔木提出，必须“突出一个‘扭’字”！“扭”，就是扭转，把“四人帮”的那一套空头政治“扭”过来，“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

《汇报提纲》经胡耀邦、胡乔木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伟反复修改，于9月下旬基本定稿。邓小平送呈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同意后作进一步修改下发全国。然而，毛泽东却未表示同意。

在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邓

小平又指令国家计委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一重要文件，邓小平仍要胡乔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业二十条》是整顿工业的纲领性文件。内中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闹人民内部的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了，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

《工业二十条》还指出：“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工业二十条》强调，要整顿那些“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工业二十条》于1975年9月20日完成“讨论稿”。

除了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之外，胡乔木深感手中没有宣传阵地不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都控制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闻首脑”。于是，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提出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名义筹办新刊物《思想战线》。

《思想战线》创刊号上，拟推出重头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的主持下，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于10月中旬完成初稿。《论总纲》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总纲，而把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又一次“半 点名”批判



《思想战线》未及问世便流产了。忙碌了一阵子的胡乔木，又返回家中。

1975年11月，形势骤变，毛泽东不满于邓小平的整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指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在“批邓”高潮之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集中火力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称之为“三棵大毒草”。

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乔木有关，其中的两棵还是由胡乔木主持修改的。于是，批判的排炮，朝邓小平轰击，也朝胡乔木轰击。

胡乔木又一次遭到了“半点名”。1976年4月，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署名康立、延风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半点名”式地称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对于“三棵大毒草”的批判火力，不断加强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社论作了如下“分析”：

《论总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汇报提纲》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工业二十条》则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大量印行这些小册子，据云是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于是，各报各刊，大报小报，笔伐“三棵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发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讯，便达一百一十余篇之多！

胡乔木又被迫写检查，以至写揭发材料之类了。他的屋外，从天安门广场上不时传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声。

不过，也传来令胡乔木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册子里，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于小册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见到“三棵大毒草”。

他们说：原来，“大毒草”是这么回事！“大毒草”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批它们干什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使胡乔木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毛泽东毕竟是他最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书生涯使他对毛泽东充满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长长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里，依照姓氏策划，姓胡的只有“胡焯、胡良才、胡金焯”，却没有胡乔木！

终于，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正了中国的历史车轮，胡乔木破涕为笑了……



陳毅軍長

和一个文艺兵的故事

在战争与和平交叉的岁月里

顾工



▲1943年10月，朱德、刘伯承、陈毅在延安

三位将军一起缓缓走来

从山东临沂城的西关外，走来三匹高头大马。马上骑着三位将军：一位着美国军服；一位着国民党军服；一位穿共产党土八路的军服。这样的三位将军走在一起，是罕见的，是历史上珍奇的一页。这一页正在缓缓掀开……

那年我17岁。正在新四军军部文工团门外的一堵墙壁上，张贴英文标语。标语的大意是：“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内战实现和平”。现在一步步向我走来，向我靠近的便是从济南来和平谈判的军事调处执行小组。

我很慌乱。这小组到来的通知，是上午从飞机上投下一个装在小皮口袋里的信。军部接到信，就叫我们文工团赶快写标语张贴，要表示那么点儿意思。

1946年的早春，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一样，忽冷忽暖，让人难以捉摸，难以预测：是停？是打？是打打停停？还是真备战，假和平？所有的和平使者似乎都戴着张笑容可掬的面具。

天很冷；风很大。我手中的标语被冷风吹飞了。

我慌乱地去追标语……把那一张方块纸上写一个英文字母的标语，全部捕捉到手中，但排列的次序已经大乱。我看和平小组的马队已走到身边，就不管不顾地把凌乱的标语都贴向墙上……

国民党的马上将军——呃，原来他骑的并不是马，

只是一头推磨的骡子；骡子的眼上戴着黑罩，因此走路时仍是时时转圈……这是我们迎接大员的故意安排，故意捉弄？还是忙中有错？总之，弄得那位故作气宇轩昂状的国民党将军非常狼狈、非常气恼，他在我身旁勒住骡子的嘴口，停了下来。他扫视了我贴的英文字母全部错乱的标语，泄忿泄恨地说：“别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完，他又拍打着骡子扬鞭而去……我拿着刷浆糊的刷子和没贴完的标语发呆；但看到那位嘲笑我的将军，在骡背上一扭一扭的后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

美方代表有他惯有的幽默

当天晚上，要举行文艺晚会。

在晚会开始以前，陈毅军长接见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我们参加演出的文工团员和记者们都聚集在两侧，作为旁听。我凝神观察着刚才嘲笑过我的国民党代表——他佩带中将肩章，面有倦容和烟容。

先说话的是美方的将军雷克。他好像很想使这剑拔弩张的会谈气氛变得轻松、活泼，便以美国人惯有的幽默、调侃的语调作开场白：“……呵，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我很喜欢中国。不过，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悲哀。我在中国住得太久，我那位在美国的老婆，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改嫁给了别人。哦，这件事使我伤心，不过我决不会伤心过度。我相信在中国停止内乱，实现和平以后，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共产党方面，都会乐于给我作媒，都会帮助我找到一个更美更好的老婆……”他的自我风趣并没有给会场增添欢乐，相反大家的脸似乎板得更紧。于是，他的话锋一转：“至于国共双方过去发生的不幸，我认为都是由于误会。现在双方代表坐到一起，相互开诚布公地表白，我想历史的隔阂是可以很快消除。”他说得确很轻松，并且怡然自得，时而耸肩，时而摊开双手：“内乱对双方都是不愉快的。我们耸立着自由女神的美国，热爱和平、民主的美国，是不会发生、而且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不幸的内乱……”

雷克将军滔滔不绝的演说，被陈毅军长伸出的凌厉的手掌切断，军长听得有些恼火。他说：“请允许我插一句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在发生的和可能继续发生的战争，是内战，而不是内乱。我们是为维护正义、维护真理，维护人类的尊严，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像这样的内战，在你们爱好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在1861年到1864年，美国总统林肯为解放黑奴，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南北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伟大的战争。我想值得尊敬的雷克将军，你在中国居住多年，总不会把美国的历史都忘得一干二净吧？”

这位美国将军苦笑了一下，又是耸肩，又是摊手。他不想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更精采的话好说。

轮到国民党的代表涂叙五中将发言。他面无表情——比刚才嘲哂我时更无表情。他说得极简短：“我这次从济南来到临沂，只想多使用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少使用我的嘴；我只希望能把临沂的和平空气带回济南去。”

我这时正在练习画漫画。我坐在墙角，为这位国民党将军和美国将军，一人画了一幅。我很自得，我的画在战友和记者手中传阅……

文艺晚会拉开了帷幕

文艺晚会开始了。我站在歌队里唱《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自由的鲜花》《东方红》……接下去的小节目是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打花棍》……再接下去是我们临时编的一个活报剧《荣归》。是写共产党是真心谋求和平，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战士复员回乡。乡里的乡亲们：农教会、妇教会、识字班、儿童团……都出来欢迎，表演着各种游艺：高跷、旱船、龙灯……唱词和台词都是由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的。到饰演妇教会会长的老演员布加里（外号叫“不讲理”，是她名字的谐音。后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场时，她



望着坐在第一排紧靠台口的国民党代表，突然怒火烧心。她握着一把缝补衣服的剪刀，一直走到舞台的前沿。她用剪刀的刀尖指着国民党代表的鼻子尖说：“谁要胆敢撕毁和平协议，胆敢进攻解放区，我这老婆子也饶不了他，也要用这剪子戳死他龟儿子、王八蛋几个！”……”那位涂叙五中将立时转过身，背过脸去。

演出幕间休息时，我从台上走到台下。见这和谈小组的周围，还留有些空位子，便和记者们一起凑上前去。陈毅军长兴致很高，似乎对布加里灵机一动的台词颇为赞赏。他雍容大度，却又不无讥诮地问坐在身边的国民党将军：“怎么样？我们解放区的文艺，你还能够欣赏吗？”这位中将显然是位老练的胸有城府的政治家。他沉静沉思般地回答：“很好，你们的演出很好。这个‘荣归’的小戏，如果内容都是真实的话，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组织群众的能力；如果剧情纯属虚构的话，我很佩服你们共产党的宣传能力！”

陈毅军长缓缓地说

在临沂城的西关有座古老的教堂。新四军在这里驻扎时，神甫和修女早已消失踪影。我们文工团许多的演出，都在这教堂的神坛上展现。除了山东民间小戏，陕北秧歌剧，我们还演出了历史戏和外国名剧：《闯王进京》《巡按使》《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是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名作，是写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军民的英雄业绩。我饰演剧中的前线记者巴宁和方面军的锄奸部部长。丁峤（他在八十年代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的影视）饰演一名俄奸，被我这锄奸部长洞察，拍案审讯……当时新四军的士兵从没见过洋人，见我们这些化妆为金发、高鼻的外国男女，着实惊异。在这沂蒙山小城里引起极大轰动。

《巡按使》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著名讽刺喜剧。我们改名为《视察专员》。上海来的著名电影明星郑重饰演主角：在上海苦干剧团和石挥演过AB角的白文，饰演愚昧的县长。我演一个只知唯命是从的警察局局长。这剧，演得很夸张，很逗乐，台下总是响起一阵阵哄堂的大笑……

笑声，却也激起某些人的愤怒。

在临沂出版的《大众日报》上，竟以头版大字标题刊出评论：《上海的噱头到解放区来了?!》。这篇抨击得异常猛烈的文章的署名是：贾霁、那沙。当时他俩是山东省文联的领导。我们文工团的人员，一看这篇文章，也被大大激怒：这种批评太粗暴、太武断、太专横！我们不吃这个，咽不下这口气。我们派代表去见陈毅军长，要军长亲自出来说说话，评理。

陈毅军长虽然日理万机，却是我们每次演出最真诚最热忱的观众。他已经看到报上的批评。一口答应来我们军部文工团参加演出座谈会；同时要我们邀请报

社、文协和宣传、文艺界有关人士一起座谈。在我们排戏用的大厅里，陈毅来了，坐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中。他缓缓地点烟缓缓地说：“……在我们解放区演外国戏，可以不可以？我看可以。这些外国的新戏和历史名剧，我都爱看，都不止看一遍。我的看法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不是排外主义的；也不是割断历史的。过去的，全世界的所有的文艺精华，我们都要拿过来，都要吸收。我赞成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只要我们的屁股坐在无产阶级方面，牢牢地坐稳，那么我们的一只手就可以伸向历史；另一只手就可以伸向世界！”他继续缓缓地吐着烟缕：“我们的演出有一半是普及的为工农兵的，比如：打花棍、秧歌剧、数来宝……；还有一半是提高的为干部为知识分子的，比如：《俄罗斯人》《视察专员》。这样，文艺的大方向就完全正确。我陈毅敢打包票：百分之百的正确！”

掌声，狂热的掌声——当然，主要是我们，我们文工团的；山东方面的也有，但被我们的掌声掩盖和淹没……陈毅军长又点燃一支新烟：“不要听到赞美就高兴；听到批评就坐不住，沉不住气。我听说文工团很多同志不想干文艺，想拿枪、想下连队、想干军事！很好嘛，我正想和你调防：你们来干军事，我来干文艺——我从小就爱文艺。可是，不允许嘛！党不允许我改行；也不允许你们改行。怎么办？我看只有我和你们都服从党的分配。你们还是上你们的舞台，我还是当我的观众。当然，战争要是重新爆发；那，我就和你们一起走向新的舞台，战争的舞台……”

我飞快地跃出掩体……

战争还是爆发了！我们文工团团员纷纷请战，要求上前线！我被批准去枣庄。

枣庄在临沂的西南方面，约九十多公里。那里的外围早被我军解放。汉奸王继美的残部及其日本军事顾问，都龟缩进城垒高筑的中兴煤矿里面。为了遵守停战协定，我方暂时按兵不动；但自从执行小组飞离临沂后，国民党方面就用美式军车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必须拔除敌人钉在山东南大门的这根钉子——中兴煤矿。定于某一个晚上发起总攻。

我独自来到枣庄前线的一个连队。

在发起总攻的前一个小时，连长叫通信员把我送到七师师指挥部。因为陈毅军长有命令：军部文工团团员在前线，打仗时只准留在指挥部，要尽力保证安全。确实，当时部队里知识分子太少，艺术家更少，成了党的宝贵财富。

师指挥部的地下掩体，离敌人盘踞的中兴煤矿高墙，只有一百多米。在暮色苍茫中我站在掩体的洞口眺望。有个长满络腮胡子的指挥员（后来我知道他就是七师的师长曾希圣）。他要用望远镜亲眼看背炸药包的爆

破手，冲向城根爆破……果然，爆破成功，遮天蔽日的城墙，被遮天蔽日的烟云吞没。我抬头望见在最后一抹晚霞中，有乌鸦般密集的城砖在飞舞……我被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一把拉进掩体。

掩体是用木排构筑。吊在顶端的一盏小马灯正被爆炸的震撼震得摇晃。我的脚根还没站稳，就听到从天降落的冰雹似的碎城砖，正砸在掩体顶上。已经进来的曾希圣，衣袖和裤腿都高高挽起，胡子上挂着晶晶汗珠。他把驳壳枪从腰带上拔出，放到电话机旁。电话兵正摇电话，问爆破后突击队的情况……从洞口外进来一个几乎是脱得赤条条的壮汉。他只在大腿间兜着块毛巾。他热得汗水流进眼睛，痛苦地报告：“没……没冲进去，爆破的城砖从天上掉下来，又把炸开的缺口堵上了。突击队冲上去，全让敌人的两侧火力撂倒……”曾希圣一听就气得立了起来——我觉得他很像“三国”里的张飞。他从桌上拿起枪就朝那进来报告的营长开了一枪：“妈卖屁，你再给我去炸，去冲，十分钟冲不进去，我要你脑袋！”营长的左肩被射中，他用右手捂住喷出的血，一声惨叫，扭头就跑……

曾希圣喘着粗气，靠在桌上。

这时他才发现了我：哪儿来的这么个戴白边眼镜的文弱书生。他似乎有气没处出，向我厉声问：

“你是哪儿来的？”

“军……军部，军部文工团”我有些怕他在火头上，也给我一枪。

“来作啥子？”

“来……来深入生活、体验、体验……”

“呃——”这位纠纠武夫，忽然命令他的警卫员：“倒水！”警卫员从腰间的军用水壶中倒出一杯水。曾希圣师长接过，放到我面前：“喝水！”我这回受宠若惊，非同小可。庆幸他枪下留情，手下留情！

片刻，电话铃响，冲锋号响，部队又一次炸开城墙，突击队和后续部队都冲进了城围……曾希圣扔下电话，大喜，一挥手中的枪，说声“走！”掩体里的所有人员，都跟着师长冲了出去。

我也飞快跃出掩体……

枪声在继续，交易在进行

眼前一片漆黑。只有炸开的围墙里面是明亮的，火光像霞光般烧红半边天空。枪声炮声密集得像炸油的油锅——无数的生命正在那里拼搏、煎熬。我也跃进火光，跃向炮声枪声最密集的地方。我有些恐惧，但更多的是兴奋，觉得生命和灵魂都要飞腾……

炸开的城墙豁口处，堆满碎石和死尸。我扒住尸体的肩，踩着尸体的腿，艰难地登上城墙的高处。我满脸都是滑腻腻的血，但我仍满怀欣喜，我觉得我是伟大的胜利者。极目远眺，火光比节日的烟火还要璀璨！

“叭叭叭”一串带红红绿绿弹道的曳光子弹向我扫来。我命大，没被击中。原来敌人并不远，就在我脚下。“叭叭叭”又是一梭子子弹，还是打偏了。接着又是“叭叭叭”……我情不自禁地躲闪，往后退了两步。我忘了我是站在高高的城墙边上，立时双脚踏空，从可以摸到夜空的城墙垛口处，仰天栽了下去……仿佛是一落千丈，倒向死亡的深渊。我落在软软的富有弹性的死尸堆上。我是不是也成为死尸？！……过了好久好久，我听到了声音：

“有活的没有？还有活的没有？”

“有活的把手举起来！”

我能听到声音，那么我还活着。刚才只是暂时的昏迷。我立即举起右手，朝上挥动、挥动……抢救伤员的卫生兵赶过来，把我扶上担架。我躺在担架上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忽然觉得负伤或死亡都是件很愉快很轻松的事。到了团包扎所地下掩体里我被放倒在一张铺着麦草和白被单的地铺上。男女医生和护士把我浸血的军衣全都脱下，举着小马灯仔细验伤……他们问我：“哪儿痛？”我茫然，惶惑：“我，我也不知道，好像哪儿都不……”

“你没伤，你走吧！你可以归队了！”

医生、护士把浸血的军衣全部扔还给我。我羞惭得满脸通红狼狈地踉跄地走出掩体……

枪声仍很密集，但战争仿佛已经结束。夏天的早晨亮得特早，才三、四点钟，已浮起到淡淡的曙光。许多缴到枪的战士在朝天射击。他们是在测试新的武器呢？还是在庆贺生命的仍存？在一条街巷的瓦砾堆旁，又出现个“早市”。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满脸烟土的战士竟在和一些惊魂方定的百姓、市民开始交易。战士把才从敌巢中猎取的钟、古玩、自行车、首饰、提箱、衣料……进行快速推销：

“要哇，要哇，两块钢洋！”

“快买、快买、一块、一块钢洋！”

还真有不少劫后余生的人在抢购……

枪声在继续，交易在进行……

讽刺剧，究竟讽刺谁？！

我从枣庄前线归来，又回到驻扎在临沂市中心的新四军军部。同志们向我祝贺、慰问；但我却没有一丝笑容。我太痛苦了。我心中堆满着一堆驱不散的阴云般的疑问，我们人民军队不是最光荣最伟大最无私的吗？它不是最神圣最崇高最通体光明的吗？但，我在前线亲身体验到观察到的却并不是，不是，不是……“怎么能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不是官兵一致吗？不是一切缴获要归公吗？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

我百思而不解，变得沉默寡言，要把我淤积起来的痛苦写成作品。

我用了几个不眠之夜写成了一部讽刺剧：《发洋财》。我觉得我必须揭露。我写：有两名我军战士，在攻城胜利后同时冲进敌人巢穴。见大厅中空无一人，只有一口名贵的大钟在敲响。于是两人惊喜若狂地上前争夺，都说是自己先看到，先发现，应该归于自己。在他俩争夺得难分难解时，藏在桌下的敌人指挥官，竟用枪左右开弓，把争夺大钟的两名战士全部撂倒，敌人狞笑着逃脱……

这是部含血含泪的讽刺剧，这是通过争夺大钟的悲剧，来向全军指战员敲响警钟。

我觉得我这剧本立意太深刻太重要了！

我把剧本交给文工团团长陆万美。

陆万美把剧本交给戏剧股，叫大家传阅、讨论。我想我这第一次上前线，第一次写下的剧本，一定会被大家称颂，赞美：“观察得真敏锐”“揭示得真深刻”……没料到，在讨论会上我听取到的意见竟然是极大地愤慨、极凶地斥责：

“你怎么能这样丑化我们人民军队？！”

“你怎么敢这样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

“你上前线是怎样进行自我改造的？怎么越改造变得越反动？！”

“你仍然顽固地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目光来观察世界、来体验战争、来污蔑军队和人民……”

意见越来越尖锐。我觉得这些意见，比那天夜晚我站在城墙上，敌人射来的一梭子又一梭子的曳光子弹还要可怕，还要致命！

讨论会结束，我卧床不起，大病三天，哭湿了一个枕头又一个枕头……我咬破手指，给团长写了一份血书，大意是：……我是爱党爱军队爱人民的。我写这个剧本，完全是出于爱。我不是反动。我从我参军那天起，就准备为党为人民流尽我最后一滴血。为了证实我的誓言，我请求领导再一次把我派往前线。这回我一定要血染沙场。不负重伤，决不回团……

血书送上去一二十天不见批复。我又去见团长。团长陆万美是个矮个子，腿微跛（他在左联时期就是知名人士，解放后任云南省文联主席）。他看着我满脸沮丧和焦燥的神情，就笑着说：“你不来找我，我就要去找你了。你送给我的请战书，我已上送到陈毅军长那里。陈军长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询问了那次文艺座谈会后的反映和情况。还问到文艺战士上前方的情况。我谈到了几位同志、谈到了你，谈到了你写的讽刺剧《发洋财》……陈军长听完以后，很激动。他又谈了很多。他说：……上海的年青人，偷越敌伪封锁线，来到新四军。对这些热血青年，我们只有鼓掌欢迎。他们初来乍到，演戏，写作品，出些偏差，犯些错误，这是必然的，允许的。我们不要去吓唬他们！什么‘上海的噱头到解放区来了！’什么‘丑化人民’？什么‘污蔑军

队’！什么‘立场反动’！……帽子满天飞，谁还敢写，谁还敢干文艺？！写《发洋财》的这同志，只有十七岁。他敢离开妈妈，离开上海，这就是很大的勇敢；敢上前线，就是更大的勇敢。他到枣庄前线以后，写他看到的。他写的，都是真实的——我陈毅担保是真实的。他去的七师那支队伍，是从江南北撤时才收编的敌伪的‘忠义救国军’。这支队伍大部分都是未经改造的土匪——我们还没来得及改造。现在我已经下命令，把这部队的番号取消，拆散；把他们分到我们的正规部队中去受训。‘发洋财’，这支靠抢劫过日子的土匪部队，怎么能不发洋财？这能怪作者吗？我看，这位小作者写的剧本还能改，还很好改，只要把立场变一变，人称变一变。把那两个抢钟的我们的战士，改成鬼子兵或二鬼子兵；隐蔽起来、随后开枪的那个可以写成是我们的人——是民兵、是新四军或是八路军。这样，这个剧还是个讽刺剧嘛！不过它是讽刺了敌人，而不是我们；但对我们部队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陆万美团长的头脑很清晰，他转达陈毅军长的原话几乎是一字不漏的；我也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回，我又泪水盈眶。当然，已不是痛苦绝望的泪；而是绝处逢生的满含希望满含感激的泪……

《发洋财》的剧本修改了，演出了，在《华东前线》刊物上发表了。

40年后，我回到上海，和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杨铁牛——他当时也在新四军文工团——坐在汽车上谈起当年。他对我说：“我演过你写的《发洋财》。我就是演那个隐藏在桌子底下向抢钟的敌人开枪的战士！”岁月悠悠，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我仍然感到欣慰——为当年，为今天……

记忆，仍在翩翩起舞

1992年的春天，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战友邓友梅——我和他在新四军文工团时在一个班。他是我上述那段历史的最有力的见证人。我俩一起来到我和他同时登台演出过的那座教堂。《俄罗斯人》远去了，《视察专员》不见了，只有拥拥挤挤熙熙攘攘的善男信女在神甫的感召下唱着赞美诗，作着弥撒……

我和邓友梅又同去寻觅当年新四军文工团的驻地——陈毅军长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然余音萦绕……但那大厅已经没有了；我和邓友梅同住的那间小屋也已经没有了。只在进大门的地方，仍留有一间铁锁锁得很严密的仓房。我说：“这是当年放钢琴的地方——这钢琴还是从那教堂搬来的。我练习过，我弹奏过……”邓友梅说：“不不，你乱弹琴了。这琴决不是放在这里，是放在那大厅当中……”是的，记忆或许会在琴键上错位，在灵魂的五线谱上颠倒；但记忆的精灵却总在伴随美丽的音符，翩翩起舞，天天起舞……

都市新

女经

——游说于现



当商品经济再度像长江的浪潮拍打石城时，南京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谨小慎微，从事各种经济中介活动的经纪人，纷纷由“地下”转为公开，政府仿照广东的做法，成立了多家信息市场和经纪人事务所，拿佣金已合法化。最令人称道的是，许多女性也操起了这个行当，经纪活动已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在瞬息万变的期货交易市场，在装修豪华的各大饭店包房中，人们都不难寻觅到金陵新一代女经纪人的芳踪。

期货经纪人

1992年10月，随着华东第一家国际期货公司——“金中富”有限公司的成立，南京的“款爷”们对股票就不再情有独钟，而抽出相当数额的资金去做期货交易了。这些人是怎么赚钱的呢？靠期货经纪人的操作。

在国际上，期货交易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它是一种可以买卖的远期合约，具有“转移风险”的功能，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期货是十分盛行的投资工具，但国内目前还十分陌生。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建立和发育，运用期货交易，直接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江苏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因此，南京市外商投资咨询服务公司与香港安家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华东首家国际期货交易有限公司，在南京招考了一百多名经纪人，其中的女性占四成以上。

宁小姐就是这批期货经纪人中的一员，她刚满22岁，但由于个头不高，身材苗条，一副俊美的面容白里透红，散发着青春朝气，看上去最多18岁。听说我是报社的记者，便快人快语告诉我：“能在期货公司做个经纪人，几十万元的买进卖出，那是非常开心的事。”

“你问我是怎样当上经纪人的，说来很简单。去年8月，‘金中富’在南京招经纪人；一下子报名3000多，最后录用了120人，女性占三分之一强。然后便是两个月的强化培训，做模拟交易。上岗的第一天，资方老板就宣布，所有雇员试用期皆为两个月，每月工资200元保底，然后就靠个人开户买卖的情况拿佣金了，上不封顶。但每人每月至少有10万元的开户，做20口（相当于股票的‘股’，日本期货交易市场的计量单位，一次

一族： 纪人忧欢



代商战中的神秘女性

●李程骅

交易最低为5口，相当于人民币1.8万元)的交易。如果连续两个月完不成任务，就自动走人。此消息一宣布，不少女性傻了眼，想不到‘金中富’是如此残酷，马上就走了一批，回原单位端铁饭碗了。我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自信能在这里大显身手。

“做期货交易，开户的最低要求是交10万元的保证金，所以‘call客’是至关重要的。我和客户联系，一说自己是经纪人，人家马上就想到‘掙客’、‘倒爷’，谁愿意把几十万元轻易交给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你说替他们到国际期货交易去赚钱，他们说生意场上你不赔才怪呢！还是回家照镜子、逛街挑时装吧。”

“你说这话有多损！我则拿出‘杀手锏’——做的模拟帐单，并讲期货交易使人一夜暴富的奇迹，他们才不敢再小瞧我。不知看了多少冷眼，不知听了多少嘲讽，第一个月的月末，我终于开了两户，金额达三十万元，在试营业前，我便为客户在‘日盘’（日本期货市场）上赚了四、五万元。客户大喜，也给了我数量可观的佣金。数目有多少？这要保密，反正靠工资半年也挣不了这么多。”

以前只听说谁谁炒股票，炒古玩发了家，还不知道期货交易赚钱更神，遂问起其操作原理。宁小姐说：“做期货交易的经纪活动，并不太复杂。期货交易和炒股有相同之处，都是投机生意，不同的是股票是证券交易，期货则是买卖的远期合约，买卖双方看不到‘现货’，在合约下同意在未来特定时间交付现在约定价格的商品。如果能及时猎取这种商品的最新行情和市场变化资料，把握商品的最佳成交时机，在价格上升前买入、下跌前卖出，就能赚取巨大的差价，在短时期内获利20%、100%甚至500%都有可能。这种交易极有刺激性，是对你应变能力的检验。我们经纪人则对客户操有生杀大权，是赚还是赔，就靠世界经济资讯作出判断了。所以客户选择经纪人格外审慎。”当然，期货市场有赚就有赔。这个星期，我的一个女同事就被‘套住’了，她做的红豆生意，事先没有看准行情买入了，现在价格还在下跌，据推测已赔了五万元。不过，明天价格也许会突然反弹，只要她不退出，说不定还会赚回来的。”

宁小姐虽然投身期货交易市场不到二个月，却对



期货交易看得很透：“这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和输家，只有暂时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曾有这样一则寓言说，假如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吃喝，都长寿不老，都精力旺盛，都技巧熟练，一盘麻将上的四个人打下去，永远打下去，将永远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用这则寓言来形容期货交易，是相当恰切的。其神秘性比之于股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根据市场行情和各种信息综合分析，认为价格会跌，它却长时间居高不下；而有时认准会赚，恰恰赔了。我的两个同事前几天下错了单子，明明是想买入的，心一急却打成卖出了，哪知歪打正着，价格迅速反弹，她们反而足足赚了一笔。”

宁小姐说，在期货交易

▲金女士

中，经纪人的才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赚的多，拿的佣金也多。假如你拉的客户多，本人忙不过来，经理还会给你配秘书、配专车。本领高的人赚大钱，平庸的人二个月就得离开。

“你问我的打算？我准备一直在这里干下去。要知道，几十万的期货交易操作起来有多过瘾，赚钱就像变魔术，有多开心啊！刚开始进入交易大厅，当电脑显示屏上的数码不断跳跃，某个人赚了一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但现在心理素质已经强化，基本上能做到赚了不喜、赔了不忧，因为交易状况总是不断波动的。我的打算是一级级培训、考照，等拿到国际通用的‘经纪人执照’后，就可以像西方电影里的经纪人一样，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了。”

作为期货交易的经纪人，宁小姐可谓

春风得意，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她的同事金女士则另有一番感慨。

“做个女经纪人真不容易啊！”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尽管女性在具体操作时，比男性的感觉要好得多，赚钱的机率也高，但我们call客的障碍太大，做生意，人家对女性有种天然的不信任感。我到这里快两个月了，一个客户还没call到。假如这个星期再开不了户，我就会被老板‘开了’”。

她接受我的采访，有点坐立不安，原来是在等一个老者的到来。这个老者是几年前离休的干部，有几家亲戚在美国和香港，手头有几十万元的资金，在深圳、上海都办有贸易公司，这几年生意做的很顺利。他现在65岁，身体不是太好，说没有精力去做现货贸易，便想在南京找收入可观且稳定的投资项目，几月前买了几万元的股票，但股市老是“熊市”，令他心灰。新兴的期货交易，虽然一次性投入的保证金较多，也可能赚的数额也大，比较对他的胃口。他已与她谈好，拿出10万元来开户。如她做得好，他表示还可追加保证金，假若做赔了，他也有可能抽走资金。

金女士本来无意成为经纪人。她今年28岁，原是一家大商场的会计。她在产假6个月时，出来逛街，凑巧看到了街上贴的招聘广告。她觉得期货玩艺挺新鲜的，便报了名，经过考试、辞去原单位的工作，一番折腾，便端上这个瓷饭碗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在一棵树上吊死，啥样的工作都想试一试。到这个地方来，我看重的并不是挣多少钱，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经济信息中心，天天和厂长、经理们打交道，扩大了社交圈子，锻炼了经营能力，为我将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到这儿才一个多月，已有四家合资公司的老板来这里做期货交易



▲成绩突出的期货经纪人——吴艳燕

时，看中了我的公关能力，均以优厚的报酬聘我做经理秘书，但都被我谢绝了。”

金女士对公司的女经纪人较多，也别有见解：“对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来说，期货交易是最容易有成就感的。比如搞经营，必须有他人配合，做秘书、宾馆小姐，更是配角。期货交易呢？独立性太强了，全靠经纪人的感觉和判断，自己单人操作，成功还是失败，迅速就有了分晓。虽然赚的钱是客户的，但看到财源随着自己手指的跃动滚滚而来，是多么令人陶醉啊。”

“可是，做出同样的成绩，女经纪人付出的代价要比男经纪人要大的多。且不说call客时，你得忍受那些心术不正男人的猥亵目光和触触摸摸，就是你把客户谈好了，来办手续的路上也可能出问题。比如就有这么几个男人，上午专门在门口抽烟，见有客户前来，便上前套近乎，烟一递就粘上了，一些女经纪人花了大力气弄来的客户，临到门前却被他们拉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中的男同事就有人公开宣称：期货市场——男人的世界！哪把女性放在眼里？我则回敬他们：女经纪人必然在期货市场崛起！”

在金陵期货交易市场，吴艳燕是位成就突出的经纪人，蜚声于石城的商贸界。期货市场开业三个月，她全权代理的客户已有10余家，资金达几百万元。她的心理承受力强，判断准确，操作手感好，在做过的三百多笔交易中，只有三笔是非赢利的，客户经她的手赚取的数额已超过百万，好几家的资金在她手中早已翻了个“跟头”，她在南京期货市场创造了奇迹。鉴于她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在不久前南京市举办的庆“三八”、评选“金陵十花”的活动中，她以期货经纪人的身份荣列榜首，还在电视上亮了相呢！

吴女士说，她之所以奋身投入期货市场，完全是被期货交易高智能、高刺激、知识密集型的行业特点所吸引。半年前，期货市场招百多个经纪人，有四千余人角逐，经过短时间的“急训”，她就觉得自己挺适合干这个行当，便毫不犹豫辞掉原来的工作，端上了“瓷饭碗”。吴艳燕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呢？原来她是数学本科毕业生，尔后在公安局所属的培训中心任教官，多年在公安系统供职，使她意志刚强、工作果断，做任何事情都周到、自信。而作为期货经纪人，常常是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大进大出，不但要能熟练地进行各种技术分析，更需要刚强、有主见的良好个性。在下买单、卖单前，大多数人根据技术分析，都能判断对行情，但交易的结果，赚到钱的往往不多。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进场的时机不对，或没有注意到市场的“死角”，受他人的影响，一窝蜂的跟进和退出。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缺乏独立判断和对行情的自信，不能在良机稍纵即逝的情况下果断地进出，使本来很小的“亏损”却变成“断臂”甚至“断头”出场。她则能做到对不同的客户或采取放开价码的方针，或实行稳扎稳打的战略，达

到了每笔必赚的预期目的。

吴女士投身期货市场，并不是为了自己“暴发”，确实确实是想干一番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价值。她的丈夫，是南京城里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在很多人看来，她是够幸福的了，何必再来做风险极大、令人心力疲惫的期货交易呢？但她心中自有主张：凭自己的能力，在事业上完全可以与丈夫一比高低。这不，才几个月，石城商贸界谁人不晓吴艳燕的大名？

“人们只是在表面上看到了我取得的成绩，却不知道我在背后倾注了多少心力，家庭为此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丈夫是企业总管，每日在外奔波，孩子只有四岁，过去家务基本上由我来承担。而现在呢，天天就是行情分析、市场预测，无论是躺在床上、走在路上乃至吃饭之时，脑中的行情分析图始终像一幕幕电影那样不断闪回，晚上回家，常是自行车撞在隔离栏上，人才清醒过来，我的两副眼镜就是因此而摔坏的。干这个行当，天天像走钢丝一样，每一步都格外谨慎，以防踏空，要知道，走错一步就可能赔进去几万、几十万。神经始终得绷得紧紧的，一点也不敢怠慢。有时我也想，算了算了，我又不缺钱用，何必天天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呢。但转而又想，自己干的好坏，是女性的价值在这个行业的具体体现，便又坚定信念、振作起来。现在，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相当强了，赚了高兴，赔了也不忧”。

谈到经纪人的具体操作，吴女士说，“要想在期货市场上有较好的收益，经纪人必须放开手脚，这就需要客户的配合。假如经纪人处处受客户的制约、错过稍纵即逝的良机，往往就会被‘套住’，越想赚就越赔。

“好多人都认为，我替客户赚了百万以上，个人也一定拿了不少佣金，实际并非如此。按照规定，经纪人是不允许直接从客户手里拿钱的，每一笔交易皆由期货公司收取手续费、管理费，我们的工资再从收取的费用中提成。当然，也有的客户为了表达感谢之心，私下塞给经纪人好处的。对于我来说，获得的荣誉感，成就感比拿好处费更重要。比如，上个月我为一客户大赚一笔，客户是如何感谢我的呢？完全出乎意料。他手中拿着一束鲜花，走进交易大厅，在众目灼灼的情形下送到我的面前，一百多个经纪人一齐鼓掌。那种荣誉岂是金钱能替代的么？”

开放的中国当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赚钱、成功的机会，但成功者相应付出的心力也是极大的。吴女士说，时下人们都说做一年的股票，要衰老三年，而期货呢？资金的投入量及风险系数都比股票大得多，受全球市场行情的左右，经纪人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因而，对女性来说，做一年的期货，恐怕就不止衰老三年了。按照国际惯例，期货经纪人都是要干半年休息一个月的，就是因为身体及心理的重负太大了。对于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衰老更可怕的呢？

“当然，在期货市场，我是个暂时的成功者，为女性争了光。董事会定期请我为全体经纪人作行情分析报告，一些大学聘我去办期货讲座，几家出版社同时向我约稿，撰写期货交易的书稿。我与一位朋友合作的《期货交易实务》，不久即可出版。对于期货，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认识。”为了采访她，我曾在省委党校的期货班上，做了一回她的学生。在课堂上，那些枯燥的期货理论，什么K线图、相对强弱指标、随机指标、逆势操作系统，被她讲得出神入化。讲课结束时，她被学员们团团围住，被缠了一个多小时方才脱身。

吴艳燕并不希望新闻传媒介绍自己，她说主要是期货的风险太大。“在期货交易方面，只有输家和赢家，绝对没有专家。不要看我在几个月就为客户赚了百万以上，说不定几天后就会全部赔光。传媒讲我做了三百多笔交易，只有三笔未赚，很多客户就会冲这一点来找我做经纪人，认为必赚无疑，那赔了怎么办？假如我笔笔皆赚的话，交易大厅的100多个经纪人都不要干了，让我一个人操作好了。显然是不现实的。你们记者在写经纪人时，不要只突出我们的欢欣、荣耀，更重要的是写出我们的艰辛、苦涩。当然，多一些艰辛和磨练，更有利于经纪人能力的培养提高。许多姐妹们说，从期货市场出来的人，没有干不了的事业，确实是经过亲身感受吐出的真切之言。”

信息经纪人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接触到的多是这样的经纪人：他们本身并无资本，往往是一支笔、一个本子、一只皮包，走南闯北，串通着“上家”，“下家”，牵线成功后，再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中介费”、“辛苦费”。在南京，目前手持工商局颁发的“经纪人资格证书”，从事经纪活动的人员已有几千人。他们每做成一笔业务，赚取的佣金只要交20%的管理费，其余便是个人的合法收入了。在这类经纪人中，女性凭着自身的“公关”优势，极容易做成功。云鹤与蓝天两位女性，便是我接触到的吃“信息”饭的经纪人。

两月前，我去经济信息市场采访，听总经理介绍说，信息市场新招了180名信息经纪人，其中女性近20名。翻开她们的登记表，云鹤女士——某工艺美术公司总经理助理，她在“备注”栏里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经纪活动让女性的生命潜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拨通了她的电话后，她说第二天上午同我好好聊聊。

这是一个成熟、干练、对人格外热诚的女性。她上套羊毛衫，下着牛仔褲，一见到她，一股现代气息就扑面而来。在宽大的会客室里，她给我泡上一杯茶，我们便侃了起来。

“你来得还算巧，下个星期我就调到省里的装饰工

程总公司去做公关经理了。”她爽快地说。

她今年35岁，工作16年，已经换了10个单位，做过纺织厂的工人、秘书和钟表元件厂的厂长。时下她任总经理助理的工艺美术公司，则是“二进宫”。去年上半年，她还是这个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下半年就去了“金芭蕾”化妆品厂，当上了贺珍珠总经理的助理，在“金芭蕾”期间，她带领一班人搞美容节，策划流动广告宣传，让模特小组穿着旗袍，披上“金芭蕾”绶带走遍了石城的主要街头，把南京市场搞得沸沸扬扬。“那段时间真把我忙坏了，每天7点离家，晚上9点以后回来，家务、孩子全交给了当大学副教授的丈夫。现在想想心中内疚啊。”今年5月，贺珍珠他任后，工艺美术公司又把她要了回来，委任为总经理助理，当上了公司的“外交部长”，“这不，昨天我还去了法院，代表公司打一经济官司呢。”

说起当信息经纪人，云鹤一点也不遮掩：“你也看得出来，我这个性格挺适合搞活放开，闲着就发慌。今年5月，回到公司后，事情比在‘金芭蕾’时少多了，我便觉得不太充实。看到省经济信息市场招经纪人的消息后，我便应招了。我认为咱们这个都市是很小的，有了足够的朋友，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的。”

她说现在全南京的生意人都在忙“三大材”（钢材、水泥、木材），她也不例外，“不过，忙乎了几个月，到现在还没有收益。”她是不是保密？“我和你本不认识，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就是表明我愿意对你敞开心扉。”她向我透露，手头正在做两笔生意：一笔是时下最俏的钢材，上家的价格已谈好了。直径6.5毫米的螺纹钢每吨3050元，在栖霞提货，下家也找好了，就是接受的价格还没有定，如果每吨3080元能接受的话，这笔生意就做成了，中介费有几千元，交给信息市场20%的管理费后，其余都归她了；第二笔是柴油生意，这笔生意已谈了4个回合，我来前她还在打电话谈判呢。上家的价格极便宜，数量也很大，下家也愿意接受，“我们中间有5个经纪人，做成这笔生意，每人可分2万元的中介费。”

说着，她竟与我谈起了生意，“你是当记者的，信息多，路子活。假如哪个地方开新闻发布会，需纪念品，可来找我。现在报上说，戴手表对人体有害，看来怀表又要走俏，我这儿可帮助联系到钟山怀表，市场价每只60元，我批发给你每只52元，中间的差价就归你了。”尽管我不通商理，还是被她的热忱感动，表示努力为她联系。

她虽然50多岁了，右腿有点跛，却有一个令人遐思的名字——蓝天。尽管她刚刚领取“经纪人资格证书”，但经纪人的生涯早在五年前就开始了。

蓝天原是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语文教师，业务一直很棒。她本来认为这辈子“粉笔灰”是吃定了，没想到时代的变革给了她重新的选择。1988年，她打报告提

前退休，“下海”当了个半明半暗的经纪人。谈起当初的抉择，她感慨地说：“现实社会的分配不公，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干了20多年的教师，家中还是那样的清贫，我的智商又不低，为什么比普通工人的收入还少呢？便咬咬牙，办了病退，在一无资金二无执照的情况下，借了500块钱，在家里装了部电话，找上家、寻下家、干起了经纪人的行当。当然，这事对学校是保密的。特别是装电话，原来的同事都很不理解，何必花这无用的钱。校长就说，蓝天病退在家，装电话做什么？还不是摆味！”

万事开头难啊。开始的一年，屡屡交学费，连存款，家当都搭上了。“本来我觉得自己口才好、交际能力强，干这行又不要本钱，很容易成功的，哪知市场不是原来的学校，有些人见我热情大方，就不断骗我的定金。有一次，我把2800元定金给了某公司的小B，当时我不好意思让他写收据，谁知B一托再托，就是弄不来货。而下家盯着我要货，我没办法，便找到了小B单位的领导，但因为没有证据，小B怎么也不肯承认，尽管周围的人都认为我不会诬陷他，但因口说无凭，此事不了了之，我白白损失了这笔定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被骗掉好几万块钱，只能变卖家中的煤气包、彩电还债。”

就在她屡屡被骗之时，学校领导也以她办病退手续不全为由，说她“擅自离职”，停发退休工资，直到两年后才补给她。“那段日子真难过啊，上门要债的接连不断，家中三口人全靠丈夫的百把块工资生活，我深深体味到‘窘迫’二字的内涵了。”在别人的冷眼和嘲讽中，她并没有怯阵，一方面节衣缩食还债，另一方面广泛捅路子。在弄清市场行情后，她专攻石化生意。不久，她从江北一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计划内聚丙烯中，弄到了200吨的指标，转手批给了苏南的一家县办塑料公司，一次净赚两万元。这家塑料公司靠她弄到的200吨原料起死回生，对她非常感激，干脆聘她当了公司在宁的总代理，把印章、支票、帐号都交给了她，让她以该公司的名义做生意，利润各分五成。“现在，我在生意场上已趟出了路子，南京做石化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我蓝天的。这两年，我做的基本上都是几十万元一笔的大生意，每笔做完后，总归能有万元以上的收入吧”。说着，她从柜子里拿出印章、银行支票及一叠厚厚的百元大钞，面呈得意之情。“有钱没钱就是不一样，过去买两斤肉都要在排档前算计半天，现在呢？动不动就花几百元请客，给客户在大饭店订包房。自己出门也打的、住高级宾馆。心态跟过去大不一样，越干越有劲，越活越年轻。真庆幸我几年前的选择啊。”说着，她把摆在茶几上的梅子、可乐一个劲地朝我手里塞：“吃啊，吃啊，几年前如来我家，只能用白开水招待，连茶叶都买不起。现在不一样了，请尽管享用。找个时间，我请你去金陵饭店吃早茶。”

蓝天现在不仅挣了大钱，还得到了原来同事的羡慕和夸赞。“三八”节那天，她回学校联欢，人们见了，老远就打招呼，亲热地喊她“陆老板”、“陆经理”。当初卡她的校长亲自上门，叫她回去帮学校办公司呢。

在省信息市场颁发“经纪人资格证书”的现场，我结识了一位刚从海外进修回来的某研究所工程师琳。她在自己的经纪人证书的“经营范围”一栏中，填的是“引进外资、机电产品”。说起时下的“经纪人热”，她滔滔不绝，堪称这方面的专家。

“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绝对离开不了经纪人的。在发达的国家，经纪人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经营者和推销商。在我国，经纪人也是早已有之，古时称之为‘牙商’，意思是没有资金、靠嘴巴说说获利的人，汉唐时代极多。明代则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官牙’是政府指定的，‘私牙’是政府批准并取得资格认定才能营业的。到了近代，‘牙商’始称为经纪人，专指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而获利的居间商。但由于旧中国的黄牛、掮客，多从事坑、哄、蒙、骗的低级活动，使人们对经纪人形成不好的看法，经纪人成为‘掮客’、‘黄牛’、‘倒爷’的代名词。其实真正的经纪人，还是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台湾有个民间经纪结构，叫‘狮子会’，成员遍布世界，客户需要台湾的任何产品，他们都能弄到手。在美国，该会已形成了庞大的推销网络，深入到寻常百姓家。美国、日本的很多大公司、商社，实际上都是充当经纪人的角色。”

说到她个人的经纪活动，她说自己刚从国外进修回来，学的是材料专业，在国外，与几家大型建材集团的技术负责人甚熟，现在要找合作对象，以在南京建合资的水泥厂。有几家工厂已与她谈到合资问题，但由于条件太苛，尚未拍板。此外，她还搞汽车贸易，刚与一个合作伙伴，从俄罗斯弄来了50辆“莫斯科人”轿车，



▲女经纪人在交“担保费”



在国内已找好了下家，正办各种手续，估计每辆可净赚万元。“我想先凭着得力的关系，做点贸易，因为贸易来钱快。有了一定的资本后，就去办实业。凭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完全可以经营好一个大型水泥厂。”

一些女性充当经纪人，并非都是想去赚钱，而是想充实个人的市场经济的知识、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某高校教政治经济学的女教授对我说，她教了三十年的经济学，全是计划经济的内容，现在搞市场经济了，课堂上的内容已被淘汰，学生们一致要求更新教材，而新教材在短期内是编不好的。无奈，她便来领了证，当个“信息经纪人”，希望通过做几笔生意，以现身说法传给同学。另一位年轻小姐，尚未满20岁，是学贸易的三年级大学生，她说来信息市场当经纪人，根本没想到发财，只想借此投身市场经济大潮，试试海水咸淡，反正不需要个人出资金，不存在赔本的风险。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有这样的基础，干事业就能得心应手了。

艺术经纪人

随着艺术走向市场，特别是中国画在港台地区的行情日益看好，很多懂行的南京人在一无资本、二无画技的情况下，为江苏的普通画家牵线搭桥，向港台的画廊出售作品，当起了艺术经纪人，而且有不少靠此获得厚利的。娟与慧便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娟今年32岁，五年前与喜好“猎色”的丈夫离了婚。她虽是学机械工程的，对艺术品却有极高的悟性和鉴赏力。她原本在一家研究所搞技术工作，四年前去台

湾探亲，看到大陆中青年画家的作品极受欢迎，标价都在200美元以上，心中一合计，回来便留职停薪，干起了艺术经纪人，不到一年，她就赚了20多万元。尔后越做越大，并附带炒紫砂壶。到去年年底，资产已超过二百万元。其实，这种经纪人过程很简单，先是港台的画商向她订货，她再向大陆的画家收购，然后带出去，每做成一笔，利润五五分成。开始，她觉得自己太穷酸了，一门心思赚钱，但有了一定的资产后，想法又有所改变，眼光放得远了，渐渐把艺术经纪当成了一种“事业”。她发现，江苏及上海有不少很有潜力、现在却没有出名的画家，他们日子过得很穷，极需经济扶持，但将来一旦出名，作品的价格肯定会升得很高。于是，她便仿效港台经纪人的做法，预先出资培养自己的画家。两年前，艺术学院的青年讲师Z是她瞄准的第一个目标，Z的素描功底极厚，曾两次在国内获得大奖，但中国画尚未画出名。娟知道，素描是国画的基本功，素描功力深的人，将来画国画必成大器，经人介绍，她找到了Z，说愿意每月出3000元供他，让他一心一意作画，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但唯一的条件是，Z的作品在五年内全部由她营销。每月只有一百来块薪水、连买纸墨都犯愁的Z，听后欣喜若狂，一口应诺。从此以后，Z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画技日臻成熟。去年8月，娟看时机到了，便先帮Z在台湾出了本素描集，在海外抬起他的名声，接着又在上海美术馆为Z搞了次画展，结果震动申城。连程十发、谢稚柳等画坛老前辈都连连赞誉，说在当代的青年国画家，Z是打遍江南无敌手的，一位日本画商当场拿出五万美金，愿意全部收购Z的

在展作品，但被婉婉言谢绝。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Z的画价值将越来越大，她当初每月3000元的投入，将会有几十倍，几百倍的回报。目前，她又与上海郊县的一位青年画家签订了协约，每月出资4000元，她断定这位青年画家将来的成就，决不会在Z之下，她本人的收益会更大。

慧还没有烟那样的决心，作长期的投资，一直半明半暗地从事字画买卖，她戏称自己是“半个艺术经纪人”。

慧是我以前任教的某大学的同事，因为同在一幢“筒子楼”里住了一年多，彼此很熟悉。她年届而立，风姿绰约，特别是她那大大的眼睛、娇美的面庞，总让人想到电影与舞蹈双栖明星周洁。

她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自幼好强，高中毕业时，以几分之差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便去当工人，接着上电大，拿到文凭后回厂当秘书。其后，又经过两年的发奋，于六年前考取了南京某大学的文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前，正值1988年掀起全民经商大潮，她的舅舅是山西某煤矿的矿长，利用这个关系，“倒”了一车皮优质煤到江南，转手赚了近万元。她准备再让家中凑些，就够到澳大利亚自费留学费用了。哪知，她的男朋友——一个从进校就死追她的白面书生，对她苦苦哀求，说他先出去挣钱，然后再让她去陪读。于是，在领了结婚证后，慧便用这笔钱让他先赴澳洲了。哪知，白面书生到了澳洲后，竟很快与一北京去的女子同居，再也不与她联系了。得悉这个令人昏厥的消息后，她在家躺了七天，心里发狠：拼命地挣钱，等服务期满后到美国去留学，给那个负心汉看看自己的本领。

一个女教师，靠什么去赚取留学的巨额费用？去兼课？嗓子讲破了，一年也挣不了两千元。再去“倒煤”？舅舅已经退休，根本弄不到计划内的煤了。就在她愁愁

的时候，机会降临了。那天，她去看望导师——一位著名的教授，恰巧两位来自海峡那边的学者也在座。交谈中，她从两位学者口中得知，港台中产阶级的家庭，家中喜欢挂传统的手绘国画，一幅裱好的非名家国画大都不低于二百美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回到校园后，忙去找几个关系不错、和她一样住在“半边楼”里的美术系青年教师，让他们帮帮忙，连夜画了几幅山水画。第二天上午，她带着这几幅画追到候机楼，两位即将登机的学者审视后，连声说好，当场以每幅100美元的价格全部收下。当然，她也够义气的，回去给了每位作者50美元。此后，她又靠着这两位学者牵线，当上港台几家艺术机构在南京的代理。这两年，她做成了几十笔的交易，很多二三流画家靠她的艺术经纪脱了贫，至于她本人所得呢，据说存折上已有六位数了。她现已搬出了“半边楼”，在小区买了套单室公寓。单位那头呢？她早已不去上课，每年交三千块钱，保留教师身份。她说自己已经改变初衷，不想再去美国留学了。再谈到那个负心汉时，她已经格外平静了：“人的感情总是随着环境和地位发生变化的，我倒要感谢他对我的刺激。”

两月前，她打了报告，准备开办南京首家国际性的私营艺术代理公司，说要做个名正言顺的艺术经纪人，目的是让艺术走向市场，让中国的传统艺术走向世界，使贫寒的青年艺术家们生活殷实。

尽管现在石城的女经纪人还为数不多，但毋庸讳言，她们已在经济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大大小小的生意场上，她们与男经纪人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少了照顾，多了能耐；少了恩赐，多了本领。经纪活动，使她们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人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责编 穆园）

炎黄文化简讯 江泽民主席等领导同志为黄帝陵题词



本刊记者在陕西获悉：国家主席江泽民日前为陕西桥山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此之前，为黄帝陵题词的还有李鹏、萧克、李铁映等同志。李鹏题词是：“发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萧克题词是：“黄陵雄立示大统，神州胄衍皆同根”。李铁映的题词是书写的毛主席1937年祭黄帝陵之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再谈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在本刊总第四期发表，经多种报刊转载以后，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注视。

我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电话和来访。他们认为，50年前的一桩冤案，50年后能够得到平反，这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实绩。有来信说，文章写得“实事求是，有胆有识。”也有更多的读者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略加归纳，在这里作个总的答复。我从一些读者的意见中，以及从国内外有些报刊对这件事的报道和议论中，颇感他们对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和研究，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相，并消除某些误会和曲解。

还历史本来面目

有人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书上讲到王实味事件，在中国新闻史的一些书上也讲到这个事件。王实味是否也做过新闻工作？现在王实味冤案已经平反，这些书上应该怎样改正过来呢？

王实味做过翻译工作和文艺工作，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在新闻史的书上讲到王实味，是因为延安《解放日报》在1942年3月刊登过他的杂文《野百合花》，以后从4月到7月，又陆续发表过一些批判王实味和《野百合花》的文章。稍后，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文章批判王实

王实味冤案

味。这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因此有些新闻史的书上留下了记载。文学史书上讲到这件事的就更多。

现在王实味的冤案既然已经平反，这些书如果再版，就应当把它改正过来。应当根据平反的结论，推翻过去的所有不实之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本来面目，就是要否定和推翻过去强加给王实味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三顶错戴的帽子以及其他不实之词，同时要对王实味作具体的分析，对他的功过、是非要作全面的评说，对他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也应当恰当地如实地指出。不能因为王实味有错误而对制造冤案加以原谅，也不能因为平反而认为王实味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了。重要的是，要使人们能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吸取真正应得的教训。

《野百合花》

有人问：《野百合花》受过批判，现在王实味平反了，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过去把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说成是一个“反革命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阴谋破坏边区的活动。这种说法，现在应当推翻。但是，应当指出，《野百合花》还是

有缺点和错误的。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在1942年写的一篇杂文。分两天刊登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3月13日和23日的副刊上。

王实味在这篇杂文的开头,批评延安的“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时抗战的现实“不太和谐”。

当时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在全国抗战的时候,延安真是这种“升平气象”吗?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到10月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写了一本新闻报道性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时,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的环境,改名《西行漫记》)。他把陕北革命根据地看成是“照耀中国”的“红星”,“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①

英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芒罗·贝特兰在1937年写的一篇《“边区”杂写》中说:“我在延安总共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这忙碌的小小山城对于外国过访者实在有许多有兴味的地方。虽则军队都开拔到前线去了,但延安还是充满了战时的景象。”“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边区都显得是中华民国的一个‘进步的实验区’……战时中国的‘模范区’”。②

我们再看看当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是怎样看延安的。他于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率领美国军事考察组在延安考察时,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多次报告。后来把这些报告汇编成《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的编者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按语中写道:“谢伟思……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比自然环境的变化……给人更深刻印象的是,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气氛的变化。震慑于日本攻势下的重庆的灰暗气氛,与延安的这种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形成全面的对比。”③

这些外国友人都能够如此客观公正地看延安,为什么王实味倒反而以“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来指责延安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延安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注意文化娱乐活动,有时组织话剧、歌剧或评剧等的演出,星期六晚上有些单位组织舞会,这些本来都是正常的活动,但王实味是不喜欢看戏和跳舞的。有一次,中央研究院的礼堂里正举行舞会,传来伴奏的乐声,俱乐部主任从他窑洞口走过,他一把拉住这位同志,狠狠地说:“你们再跳,我如果有手榴弹,就把你们全炸死。”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王实味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他这样凭一己之好恶来说延安,也在太主观、太偏颇了。

《野百合花》批评延安有“特殊主义”,“特殊化”。这是王实味晚上散步时听到两个青年女同志的谈话后引发的。“特殊主义”、“特殊化”的现象,在延安不能说没

有,但有也是极个别的。

近十几年,许多人研究“延安精神”,包括很多当年到过延安的人,都认为“延安精神”的特点之一,就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王实味自己也在文章里说明他听到的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是从他的文字描述来看,实际上是说延安生活里普遍缺少“阶级友爱”和“人对人的同情心”,而且“到处乌鸦一般黑”。我想,这也许反映了他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忧郁的心情吧?而这绝不是延安生活中普遍的现实。

《野百合花》从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延安有“等级制度”,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和合理”。

延安“衣分三色”吗?当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穿衣有很大的困难。从边区外面买进来少量的灰蓝色斜纹布,只够少数领导同志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穿的,其余人穿的都是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一般干部和战士以及勤杂人员穿的都是同样的土布。干部穿的衣服上有4个口袋,战士衣服上只有两个口袋。如此而已,这能说“衣分三色”吗?

延安“食分五等”吗?当时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加上病号饭,也算不出“五等”啊!我在1938年2月到陕北公学学习,吃的自然是中灶。5月开办陕北公学分校,我调到分校当教员。那时校长和教研室主任吃小灶或中灶,其他人员都吃大灶。我们教员又稍有优待,一般大灶平时吃小米,每星期吃一次馒头,教员每天可以吃一顿馒头或面条。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受之有愧,组织上一再解释说,这是党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我才坦然。1941年我调到中央研究院。院一级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以及特别研究员(在社会上已有一定贡献和地位的研究员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也是一个)吃小灶或中灶,其他人员都吃大灶。总务处同志主要为了改善大灶伙食,千方百计地开荒种地,种菜,养猪,开作坊。使大灶差不多每天能吃一顿馒头或大米饭、二米饭(小米加大米),蔬菜除萝卜、土豆等大路菜,还常有自己种的菠菜、西红柿、茄子、豆角等。在那艰苦的日子,大家对这样的伙食是比较满意的。1942年5月,党中央书记处发出《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规定对有大学程度的专门人才,对有高度专门技术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给予每月15元至30元的津贴(一般工作人员5元),吃小灶,独住一个窑洞。当时大家也都认为这些规定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野百合花》还鼓励那些爱发“牢骚”的青年说:“青

①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页。

②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外国人士作品编》第一卷,第115—116页。重庆出版社。

③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外国人士作品编》第二卷,第1245页。重庆出版社。

年是可贵”，“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他不去分辨这些“牢骚”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也不谈提意见的方式，而一味地鼓动让大家“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甚至认为不提就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这要引导青年干什么呢？

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之后，曾委托他当时的秘书胡乔木把他对这篇杂文的意见告诉王实味。大意说，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我们工作制度中，的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要求绝对平均，那是空想社会主义，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说到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冷嘲暗箭是一种销蚀剂，对团结是不利的。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对党员来说，是不能容许的。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这一年3月底说的，当时还没有把王实味看成“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对《野百合花》的这些批评应该说是很中肯的。

我也同王实味谈过心，批评他不应该对延安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他曾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还是狂热地关心着党啊！总希望党纯洁光明，没有一点瑕疵。”同时他也承认，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症”，他的“狂言乱语是不对的”。

动员会·座谈会·斗争会

有人问，延安整风运动是怎么回事？延安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也是以后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

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整顿三风中，中心内容是整顿学风，就是要废止那种只会记诵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把它当成宗教教条的学习方法；要求认真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各种实际问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怎样整风呢？毛泽东提出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

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今后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就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时候，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要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中央研究院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3月18日，院领导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当时院长张闻天（中宣部部长兼）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了，大会由副院长范文澜主持，由临时代替张闻天领导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作报告。李维汉讲了整顿三风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领导人和每个同志都要学习和检查，大家都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还讲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些同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王实味冤案

王实味从一开始就把整风的任务和方法理解错了。他的《野百合花》就是在听了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写的。在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上，他听了李维汉的报告之后，又提出整风运动主要

是整“有邪气的领导人”和“名流大师”。李维汉根据院务会议的决定宣布，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全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王实味带头反对，他主张全体委员都由大会选举产生，并提出要实行“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会上不少同志同意了王实味的意见，两种意见争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由大家选举的84票，同意院务会议决定的只有28票。会后，中央研究院创办了整风墙报《矢与的》。王实味在墙报上连续贴出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零感两则》等文章，他在《零感两则》中写道：“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墙报本是贴在院内的，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处热闹的地区新市场，看的人就更多。这些后来被认为是全院发生的一种极端民主化偏向。

为了纠正这种偏向，院党委在5月27日，召开了全院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主题的座谈会。在前3天的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认为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否决院务会议决定，把整风看成只整领导人和“名流大师”，把墙报挂到闹市区，这些都是极端民主化的偏向。在30日的会上，李维汉对民主集中制，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执行纪律、为什么“彻底

再谈

民主”“绝对民主”是错误的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至此,许多同志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结束了。

但是,从讨论中引导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王实味的问题,认为“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这是康生授意的。康生当时是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党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院党委自然只能按他的意见布置。在会上有人发言提出“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质不同”之后,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反对,说:“王实味的错误和我们的偏向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甚至批评那种认为“性质不同”的看法是“有主观主义的残余”。另一种则赞成。在辩论中,赞成的意见占多数。有些人对《野百合花》作了分析,认为这是诋毁延安,攻击革命,诬蔑中国共产党。有的发言中甚至说:“从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是从思想上说,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后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6月1日以后的座谈会,就按照康生的意图变成了对王实味的斗争会。

会上主要是揭发王实味在日常谈话中流露的同情托派的话:“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托派重要分子)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1924—1927年)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这些话,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起来,有些是对的,有些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共产国际、斯大林被视为“神圣”,托派被说成“国际间谍”。王实味说这样的话,自然被认为是极端严重的大逆不道的事。

王实味到这时还不承认错误,而且向院党委提出了退党的要求。我仍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找王实味谈话,劝导他认识错误,不要与党对立,主动撤回退党的要求,党委也派了另几位同志去帮助他。

6月4日继续开大会。在这以前,王实味一直称病没有出席过大会,今天他第一次到会场上来了。他表示撤回“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并说“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这话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更多的同志则要他回答: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你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说一些托派分子的‘人性’是好的?”他支支吾吾地说:“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还说:“我认为苏联清党时,有有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会上由此进一步追问他同托派的关系。他交代,他从1929年到1936年,同托派有过来往,是同陈清晨、王文元这两个人。他和他们原是北大同学,是同一个支部的中共党员。后来他失去组织关系,到上海时见到了他们两人,此时他们两人都已经退出党,加入了托派。他为生活所逼,想得到一些稿费,曾帮助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和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但他声明“从来

没有加入过托派”。他说:“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他后来在1937年终于找到了党,还是回到党内来了。会上有些同志发言却因此把他叫做“托洛茨基分子。”

6月8日以后,斗争进入高潮。

9日,也就是第14天的大会上,还有一位同志发言说:“王实味有托派思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立即有六七个同志起来反驳。

10日的会上,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和院部工作人员支部,还有院外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支部,要求开除王实味党籍。

11日,最后一天的会上,李维汉作了总结性的发言。讲到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时,他还是比较慎重的。他同意把党籍问题提交院党委处理,他还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论和行动,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我们也可以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李维汉到最后还是想挽救王实味的。

康生已经一口咬定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他那时掌握着审查干部的无上大权。所谓“挽救”,也只能是让王实味承认自己加入了托派,并且要彻底交代、清算和忏悔作为一个托派分子的罪行。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查明,王实味的确没有加入过托派。他当时不胡乱承认加入过托派是对的。这就使他与当时的组织之间的要求无法调和。

到了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把他发表《艺术家、政治家》、《野百合花》以及在整风运动开始时的言行,都说成是为了“反党”,“以达到其托派活动之目的”。决定最后说:“王实味是一个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始终表示对党仇恨,与其他党员犯了错误经过教育因而改悔完全不同。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9月间,李维汉已经调离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下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当秘书长去了。据我知道,康生对他不满是调动的一个原因。我想他是不会知道这个决定的。在座谈会结束之后,我也由党委回到文化思想研究室,对怎样作出这个决定也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王实味得到开除党籍的通知以后,他不服,当即跑到中央组织部去哭诉。

“五人反党集团”

有人问:批斗“五人反党集团”,把王实味定为“五人反党集团成员”,是怎么回事?

这是康生企图扩大反王实味斗争的“战果”,一手阴谋制造的。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除王实味外,牵连到另外4个同志:一个是成全,原名阵传纲,复旦大学毕业,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曾在行政学院任教务主任,1941年调马列学院学习,同年秋冬回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做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一个是王里,同成全

是夫妻。她原名王汝琪，复旦大学毕业，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在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做妇女运动的研究工作。1941年冬，因肺结核病复发，住在成全的工作机关养病。一个是潘芳，原名潘蕙田，在德国留过学，早年入党，1941年冬到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恩原著的翻译工作。还有一个是宗铮，她同潘芳是夫妻。原名郭箴一，复旦大学毕业，1941年冬到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工作。

他们之间的关系：1941年冬，成全陪着王里到中央医院门诊部看病。他们听说宗铮夫妇到了延安，就顺路去看望他们。王里和宗铮在复旦大学同过学。宗铮对王里夫妇很热情，要他们每次看病之后都到她那里休息，吃了午饭再回去。一次在宗铮和潘芳住的窑洞里谈话时，王实味来了。王实味住在隔壁的窑洞里。王里1936年在南京时就认识了王实味，多年未见，见面后也就攀谈起来。以后他们互相有过几次往来。1942年初春节时，王里和成全请宗铮、潘芳和王实味到他们那里吃过一顿饭。这些活动本是同志之间很正常的关系，康生却不是这样看的。

在反王实味斗争之后，康生就把斗争目标转移到这4个同志身上。他先让中央政治研究室斗争成全和王里，然后又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联合起来斗争他们5个人。在斗争中，暴露出来的主要事实有：在《野百合花》发表以前，王实味和他们谈过“要写一篇‘党内批评’的文章，名字叫《野百合花》”。王里听了以后，表示支持说：“我可以供给你花子。”在谈论“整顿三风”的时候，成全说过他已上书毛主席，提出加上“整顿人风”一项，在上书中还批评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三等”，内容和《野百合花》有点相似。在1942年初春节聚会时，王实味提出过：“我们组织一个研究问题的小组好不好？成全反对说：“在党内是不许有小组的”。后来就没有组织。此外，还有一些琐事。就是凭这些，加上胡乱猜测和怀疑，经过七斗八斗，最后康生把他们五人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五人反党集团”。

这里还应提到一件事。就是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康生主观认为王昆仑是国民党特务，一口咬定王里是王昆仑派到延安来进行特务活动的。以后周恩来、董必武从重庆回到延安，说明王昆仑思想进步，帮助我们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可能是特务，这才打消了对王的怀疑。建国后已证明，王昆仑虽是国民党官员，但1933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长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工作。康生竟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污蔑这样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这是何等荒谬！

为什么这样“左”？

有人问：反王实味斗争，为什么会搞得这样“左”？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胡耀邦说过：“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的批王实味，后批胡风，直到‘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这些话说得很好。现在只就我亲身经历过的王实味事件，分析一下为什么搞得这么“左”的原因，并说一说应当从中吸取的教训。

这里有客观的历史背景和主观的原因。

客观的历史背景是：

一、当时正流行着对托派的错误看法。

托洛斯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列宁逝世后，由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并进行派别和分裂活动，于1927年11月被开除出党，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也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斯大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把托派说成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中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与陈独秀等相结合。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宣传上还是主张抗日。但是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说法，说他们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有利于日本侵害者的活动。

后来证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些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在1942年的时候，这种错误说法却在流行。这对于反王实味斗争不能没有一定的影响。

二、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激烈的阶段。

在世界上，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侵略和反侵略、占领和反占领的战火正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地方燃烧。在我国，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国民党不断地掀起反共高潮和制造磨擦，并且组织庞大的特务系统，企图破坏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这种形势和环境对反王实味斗争也不能没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历史背景对反王实味斗争是有影响的，但是不能把它作为造成王实味冤案的客观原因。把一个不是“托派”的同志错定为“托派分子”，把一个不是“特务”的同志错定为“国民党特务”，这应完全归咎于主观的原因。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分析,我认为主观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对敌情的过火估计

面对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对特务的渗透和破坏活动的估计是过火的。在《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这个决定虽然是1943年正式作出的,但是1942年已经有了这样过火的估计。

整风运动后期,康生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说出特务打进边区甚至党内的人数是很多的。究竟有多少,他没有说。但是从抢救运动错打成特务的人数可以看出来。我在1943年初从中央研究院调到解放日报社。在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两社联合进行的抢救运动中,两社共一百几十人,被错打成特务和被错认为有特嫌的占70%左右。真的有这么特务吗?不久,经过甄别平反,除极少数同志有个别历史问题保留待查以外,其余全都平反了。37年过后,我看到一个当年曾在西安负责派遣特务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官员的回忆说:“我到西安后,也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但3年中他只派了两个特务混在团里到延安做过一些情报工作;也曾派了一个特务到延安企图建立潜伏组织,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越想越不对,……只好借口回来了。”以后又想“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不肯上特务的圈套,累试都失败了。”^①这个回忆应是可靠的。以这样的事实与当时的估计相对照,可以看出估计是太过火了。这样过火的估计不能不说是造成王实味案的一个原因。

二、一个人说了算的恶劣作风

这里说的“一个人”,是指康生。王实味冤案主要是他一手制造的。现已查明,康生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只是凭王实味自己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的他与托派关系的材料;说王实味是“国民党特务”,完全是他自己的猜疑和臆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占据了领导整风运动的高位和权力,插手、控制引导了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把反王实味斗争扩大为反“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又是康生赤膊上阵、一手炮制的。他起初怀疑并说过潘芳是这个反党集团“摇毛扇的人物”,结果

无法定下来,最后只是拼凑成一个没有以谁为首的“反党集团。”康生在1943年下令逮捕了王实味之后,到1946年再次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这又是他强行作出的决定。延安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而身负重任的康生竟如此主观武断,由其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

康生的这种作风,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主义,还有其个人的动机。有人认为,这和他一贯的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以罗织罪名,诬陷同志,抬高自己,而达到篡取高位为目的”是相关联的。这同他最后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值得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康生一个人说了算的恶劣作风当时能够存在?为什么康生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当时许多同志包括领导同志,甚至连毛泽东也相信了他的话?这就不单是一个思想作风问题,这可看出当时在制度中也是存在问题的。

现在我们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从历史教训中,就应当更加看到健全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了。

三、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

积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都已经懂得:解决思想问题,审查干部,是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的。但是1942年搞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恰恰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

座谈会一开始,康生就要把他的意图往下贯彻。16天的会,升了4级:由纠正一般偏向引导到对王实味的斗争;由一般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由对托派思想斗争升级为对托派分子的斗争;由对托派分子的斗争实行组织处理。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联合斗争会上,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扩大为反“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每升级一次,都把康生的“左”的错误思想贯彻得更深一层。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都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反对甚至围攻。“左”的邪气压倒了一切,正气得不到伸张,这怎能不造成冤案呢?以后的多次冤案,如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胡风,批“三家村”,大致也是这样搞出来的。

四、宁“左”毋右的不正常心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右的干扰,更多的是“左”的干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心态,就是认为“左”比右好,宁“左”毋右,把“左”看成是思想方法问

^① 《抗战前后军统特务在西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01—104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7月。

题,把“左”看成是革命的,甚至认为越“左”越革命;把右看成是革命立场问题,把右看成是不革命的,甚至会变成反革命。这种错误思想使“左”在党内能够根深蒂固地长期存在。

在反王实味的斗争中,有些同志是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且比较正确地提出意见的,但往往受到更多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正确的意见受到孤立,“左”的意见反而得到赞扬并起哄呢?是不是每个人嘴上说的都真正是他心里想的呢?我看不见得,其实这是“宁‘左’毋右”的思想在作怪,而这种“宁‘左’毋右”的思想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其根源是我们党对“左”的危害缺乏应有的深刻的认识。

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能够葬送革命,“左”也能够葬送革命,右能够葬送社会主义,“左”也能够葬送社会主义。“左”绝不比右好,宁“左”毋右的思想是绝对要不得的。今天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应防止“左”。“左”是根深蒂固的,它的危害实在太大了。

五、不愿听不同或相反的意见的错误态度

我们在批评一个同志的时候,也应当耐心听取他本人的陈述或申诉。对他的陈述或申诉,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态度,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驳回,一时弄不清的也可以继续调查研究。王实味在给中组部的交代材料中说明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为什么康生等人就是视而不见呢?王实味在斗争会上声明没有参加过托派,在中央研究会党委作出结论后王实味又在书面材料中再次说明没有参加过托派,怎么都无人置理呢?康生在下令逮捕了王实味之后,在加入托派的问题上,王实味有时被迫承认,有时又坚决否认,康生为什么不听他申辩,而强行作出他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呢?这样主观武断,对不同意和相反意见一点也不愿意听,怎能不造成冤案呢?

这种不愿听不同和相反意见的态度,在今天也并不少见。

这种错误态度不应再存在下去了。古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信条。

整风运动的成就还是主要的

有人问:在延安整风中出现了王实味冤案,以后又发生了抢救运动,延安整风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还肯定整风运动有巨大成就呢?

王实味冤案,抢救运动,都是整风中的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

整风运动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2年的20多年中,中国革命取得过巨大的胜利,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最大损害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遵义会

议首先纠正了它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瓦窑堡会议又纠正了它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以后又逐步纠正它在思想路线上的错误。整风运动就是为了彻底消除这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残余而进行的。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学习,许多同志才懂得了怎样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而应当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才学会了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只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个别原理,才理解了怎样做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飞跃,使许多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一次普遍的很大的提高。

建党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晚年在回忆延安整风的时候说:“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当时,我是中年人,同志们中间大多数是青年人。在当时的延安,老年人不多,有所谓几‘老’,就是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等,其实他们当时才六十岁左右。”他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很深刻的教育”,“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①我当时是青年人,早年参加革命,到延安以前在白区已做过8年多地下工作,也是在整风学习中才真正懂得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我们都深切体会到整风运动在党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央许多机关的整风学习在1942年冬或1943年春已告结束。接着是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在审干中,康生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当时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多天内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按当时规定,除少数送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审理,大多数都是留在本单位负责审查处理的。不久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到延安打出这么多特务,认为特务不可能有这么多,一定是搞错了。他严肃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意见,使抢救运动立即停止,随即着手甄别平反。各单位负责人向被错打的同志一一当面赔礼道歉。毛泽东也代表党亲自分别在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单位的大会上,脱帽敬礼,赔礼道歉。抢救运动的确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不能以此抹煞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就。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是有联系的,但毕竟是两回事。

^①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3、4、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汪精卫死因之谜

卖国求荣

不如一条狗

曲终人亡

历史有公论

炸墓

1946年1月15日夜，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里集聚了几位国民党大员，他们中间有何应钦、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宪兵司令张震……这里正在开着一个奇怪的会议。只见何应钦脸色铁青，他环顾左右，看看所有的人都到场了，便表情严肃地站起来，他说：请诸位来有一事要商量，并望诸位绝对保守秘密。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而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在一起，有碍各方面的视听，如果不把它迁走，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善处理。

会上，一个个争先发言。最后议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宪兵司令部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派定，又研究了方法，认为汪精卫的坟墓相当坚固，只有用炸药爆破。为了防止泄漏，爆破时，要利用其他音响作掩盖。会后，即分头进行准备。

在炸墓的前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就断绝了行人交通，禁止任何人游览。

1946年1月21日深夜，工兵营开进墓地。爆破作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钢筋混凝土的墓壳被炸裂成数块。第二步，炸开内窖。内窖炸开后即出现了棺材。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令揭开棺盖，然后让不必要的人员暂时离开墓穴，由他进行全部棺内检查。

汪精卫的尸体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尚保持完整。尸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礼帽、长袍、马褂。马褂口袋内装有一张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为陈璧君。据说，她从日本接运她丈夫尸体时亲笔书写此条，以示招魂。棺内还有一本手抄的汪精卫诗稿，虽已发霉，字迹仍可辨认。诗稿开首是那篇名闻天下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

●李影

子江

春秋笔



▲汪精卫(右一)、陈公博(中)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1943年3月15日)

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那是1910年，汪精卫曾因企图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洋，事泄被捕，在狱中他写下的。而诗稿的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过去没有发表过，料是汪精卫最后之作。诗曰：“心字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从此诗的语意看，汪精卫死前神志尚清楚。他自知积怨太深重，将永世被人唾骂，故作“天涯无处不怨尤”之叹，但还强作镇定，自我解嘲，有人读此诗后，依其原韵改了数字，成为一首绝妙的讽刺诗，将汪精卫的可悲下场刻划得入木三分，诗道：“梦落东溟丑事休，卖国终将积怨尤，莫道世间历炎凉，恶名遗处正春秋。”

投 敌

抗战爆发时，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真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他一贯推行亲日政策。

早在1932年，他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期间，就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1935年1月2日，日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随着日本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阴阳并举，对国民党展开一系列诱降活动的越来越深入，蒋介石与汪精卫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也日益加深。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齐聚南京开会。汪精卫致完开幕词，全体委员到礼堂门口合影。大家都已坐定，而蒋介石却仍在礼堂内与叶楚傖说个没完，几经催促，仍迟迟未到。林森和汪精卫只好叫人拍照。摄影刚完，突然有个青年记者抢前一步，取出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朝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即倒地。有两枪伤了汪精卫的面部和臂部，一枪穿入胸膛。中委们一片惊恐混乱，四处奔逃。蒋介石听到枪声，从礼堂出来察看动静。此时，警卫人员已抓住了刺客。汪精卫被送进了医院抢救。透胸一枪未打在要害处，没有丧生。但子弹钻进脊椎骨间，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佳，没有取出来。

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中日“和谈”调停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了多次商谈，并转达了日方苛刻的停战条件，对这些条件，蒋介石做了一些让步，但有一定限度。汪精卫则认为日方的条件尽管苛刻，还是可以接受的，唯恐错失良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接受日方条件，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3日，核心内阁又举行会议，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国民党政府在72小时之内如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日本先后在北平、南京扶植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周佛海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等声明的诱惑，急于同日本恢复“和平谈判”，从此，他们暗中努力，积极筹建伪政权。至1938年11月

14日晚，梅思平、高宗武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香港东京等地秘密会谈多次。

汪精卫读到由梅思平、高宗武送来的卖国“密约”后，立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议，对“密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最后决定逃离重庆，飞往河内。

12月18日，几经周折，汪精卫、曾仲鸣、陈璧君、何文杰由重庆飞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等一行10余人，乘飞机由昆明飞抵河内。第2天，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这样，汪精卫集团叛离了抗日阵营，汪日勾结由秘密商谈进入公开筹划建立伪政权的新阶段。

汪精卫到了河内，就指定由他本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曾仲鸣、林柏生等8个所谓“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随后决定成立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做为投日之初的最高委员会。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他的办公室里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声明说，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与对满洲国的成见，与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近卫声明一发表，汪即起草声明，以为响应。12月24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说：“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其祸”。28日又致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建议对近卫“三原则”予以接受，对重庆国民党劝降。12月30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稿在《南华日报》上刊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艳电》一发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

行刺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汪精卫的问题，国民党中央宣布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虽然如此，蒋介石并未放弃对汪精卫的争取工作。2月上旬，蒋介石派和汪精卫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传达了中常委的决议。时隔不久，谷再次赴河内，带给汪一份护照、一笔旅费，是蒋介石希望他飘洋过海，去周游列国。但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有国家元首的宝座，不听劝告。3月，军统局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给龙云的密函，表露他要回国直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蒋介石本来对汪精卫公开投敌已十分愤恨，现在得知他还要回国兴风作浪，更是怒不可遏。他召见戴笠，令他立即除去汪精卫。

戴笠经过一番策划，一个精干的6人行动小组去了

河内。1939年3月21日凌晨两点多钟，高朗街27号院内一片寂静。特务们在黑暗中摸到竹篱前，挥斧砍断篱笆，直奔洋房，爬上三楼，劈开房门，一个人打开手电一照，见房中人早被惊醒，正钻在床下瑟瑟发抖。他们举手枪连打几枪，床下那人痛叫一声，便再也不动了；鲜红的血淌满了地板。但是第二天才得知，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曾仲鸣。原来，那天白天，曾仲鸣的太太方君璧带着儿子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的大房间让给了他们，自己则到曾仲鸣的房间住宿。结果曾仲鸣成了他的替死鬼。

日本内阁闻讯于3月21日即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到安全地带。4月间，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护卫下，秘密离开河内；乘船到达上海。1939年底，汪精卫正式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30日，征及日本人同意，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及其各院、部、会主要头目陈公博、周佛海、褚民宜、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温宗克等宣誓就职。当天，伪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

汪伪国民政府自1940年3月粉墨登场，至1945年8月16日宣布解散，其间经历了5年零4个月又17天的寿命。

宜人不宜狗

汪精卫“还都”执政，达到坐坐“国家元首”宝座的目的，自是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认定抗战必败，自己抢先得到日本主子的信任，蒋介石当已落在他的后面。然而好景不长。国内外形势变化，愈来愈不利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一手拉过来的那些国民党军队，都同日本主子直接打上交道。他自己还得受制于日本“太上皇”——伪府顾问影佐。他越来越感到坐在这个“宝座”上如坐针毡。

1943年秋，日军节节失利，兵力不支。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一个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三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海运至大连港口，作为第一号战略储备物资。当时沿海各省，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景象。到哪里去征集这笔粮食？汪精卫只得采取拖延的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看看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临汪精卫官邸。汪精卫闻报，料是为壮丁、大米而来，心慌意乱，匆忙下楼迎接，不意两腿一软，摔倒在半楼梯上，恰巧1935年11月1日枪伤的脊椎骨磕在楼梯棱角上，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他疼痛异常，无法站立，被人搀扶挺卧在沙发上。松井和犬养

以为他是故意装样子搪塞，犬养蛮横地“唵”地拔出指挥刀，只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刀，“呀”的一声，小指被剁了下来。随即用生硬的“协和语”示意，如违军令，当如此指。汪精卫开头以为他要拔刀行凶，后见挥刀断指，鲜血淋淋，不禁一身冷汗，昏了过去。醒来的，已躺在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

经过诊断，确诊是当年埋下枪弹的伤口撕裂，弹伤复发，并决定由驻院部队长、中将医官铃木小叶亲自替汪精卫做手术。留存七年之久的弹头被取了出来。汪精卫和老婆陈璧君都以为是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祝贺。汪也打起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几天后背脊肋部的疼痛加剧，波及腰部颈间，大小便开始失禁，病情日见恶化。

陈璧君见日本主子从东京特地运来的去毒消炎药“盘尼西灵”也不灵，便乞求于中医秘方，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专治骨伤疮毒的刘一帖。

刘一帖被请来替汪精卫作了仔细的检查。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陈璧君见膏药背面红布上，烫有“祖传秘膏”四个金字，她闻了闻，膏液香气回溢。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第二天，汪精卫的痛楚大大减轻。汪精卫夫妇暗自庆幸。即派侄儿陈春圃携带厚礼请刘一帖复诊。

刘一帖复诊时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帖便将随身携带的小医箱内取出的一帖膏药交给陈璧君。

谁知贴上这帖膏药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派车去让城客栈接刘一帖来会诊。铃木一看汪精卫病情，大骂：“完了，完了！”忙命护士将贴在汪背心的膏药撕去。陈璧君一看吓了一跳。那贴膏药的地方一片紫黑色，骨髓里的铝毒，已经迅速扩散了。

与此同时，派去找刘一帖的陈春圃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报告说，刘一帖已不知去向，陈璧君这才醒悟过来，刘一帖在这帖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三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元首”不如大佐

但是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用。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

“海鹳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

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铝毒入骨之故。决定立即第二次手术，进行削骨去毒，龟田良宏执刀。他迅速拟定手术方案。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他的未婚妻，一位在帝国大学医院当护士的小笠顺子，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拆开信一看，信中说：

“龟田兄：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阅罢，喟然长叹道：“不，他要我为友谊尽力，可我得为天皇尽力呀！咳，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夏小柏的规劝失败。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一部分专家主张“自然愈合”疗法，另一部分主张“仿椎骨植入”疗法。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龟田没有料到，在他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他，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按第二方案进行。即“自然愈合疗法”。军令如山倒，龟田只得执行。手术在当天午夜就进行了。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铝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手术后的第二天午夜，汪精卫才完全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的躯体和头部已被固定在石膏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经过两次手术，汪精卫骨瘦如柴，元气已经丧尽。一个礼拜后，经X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有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

龟田弄不懂，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作“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

龟田设法看到了一份“军部指令”，这个指令上写道：“上野博士：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中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作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作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1944年3月4日”

龟田这才明白，这位伪国民政府的“元首”的生命在主子的眼里，其重要性，还不如日本的一个中级官员！汪精卫这个汉奸已成了日本政府的医药上的试验品！

汪精卫既已成为其主子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到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激素和钙片，收效甚微。半个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作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背肩部的疼痛，重又加剧起来。汪精卫如同千尸，彻夜呻吟不止。

陈璧君本来是跟汪精卫一起来到名古屋的。日方以“加强护理”为由，把她及子女安排在离医院比较远的西山宾馆。汪精卫的病情恶化后，院方干脆不让探视了。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陈公博、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后，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望。但院方因汪精卫没有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又怕将“试验”情况暴露出去，为应付这一尴尬局面，作了精心安排。他们拆去石膏，把汪精卫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预先给他注射了全身麻醉剂，使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手上放上一本小说，形同看书消遣一般。陈璧君到医院后，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陈璧君无奈，只得回到南京。

日本军部导演的这一幕，虽然应付了陈璧君的探视，但汪精卫的病情，却越来越重。经过一番折腾，汪精卫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于是院方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他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办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象投环自尽一般。这样，汪精卫在病榻上呆了三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特殊的“绞刑架”上。

曲终人亡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发了讣告，天皇也表示痛惜。军部仍用“海鹤”号飞机把汪的尸体送南京。

当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时，日寇宪特强迫一部分中小学生前去迎接“遗体”，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块黑纱和鱼罐头。但是回城途中，他们纷纷把黑纱、罐头都扔掉了。

11月23日，在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精卫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亮时，将五吨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亮。

但是事隔一年多，这位汉奸的坚硬墓穴还是被炸开了。当国民党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进穴检查过后，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李东阳把汪精卫的棺材装上车，直送清凉山火葬场焚化。这边也连夜将墓地平掉，不留痕迹。紧接着又用十来天时间，在原墓址上建成一座小亭子，墓

地彻底变了样。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谁也想不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葬身之地。

汪精卫一死，南京城里的汉奸群丑顿失重心，惶惶不可终日。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伪政权“公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负责，这两个人原先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汪精卫的所有伪职由陈公博代理，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但陈、周两人兔死狐悲，对前途悲观失望。周佛海在汪精卫入殓的当天，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在汪死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所记的日记中不时有“悲也”、“苦也”等惆怅之言，并一再承认局势：“危险万状”，“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陈公博也以临终的心情，准备伪政权的后事。在他就职代国民政府主席时，就向心腹透露说：“汪先生上演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承演出的。”

在一片愁云苦雨的笼罩之下，汪伪政府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有的急于钻营重庆路线，谋求“反正”；有的更加横征暴敛，囤积居奇，准备后路；有的则整日醉生梦死，尽情享受。“大家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一个政权，一个人，只要他违背民心，行将就木时，都是这种症状。而上层汉奸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更是闹得不可开交。

1945年9月9日，日本政府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一垮台，14日那天，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立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开始逮捕汉奸。同年冬，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件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具结。汪伪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因与重庆有勾结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外，被判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汪亢虎等，中国现代史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小汉奸，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任编辑 晓度〕



從戰爭罪犯 到和平戰士

●李文达

“英雄”的忏悔

1956年夏季的一天，在日本的一个农村小站的站台上，站满了附近的乡亲们，手举着太阳旗和“武运长久”旗，在等待从中国归还的一名亲人。他们要以欢迎英雄的仪式来接待他。不料这位“英雄”一下火车，就向欢迎者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说。他说自己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名罪人。他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烧杀奸掠，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真相，又讲了中国人民给他的人道待遇和宽大处理。最后他说：没有什么圣战，那都是肮脏的侵略战争；没有什么男子汉英雄，那都是屠杀

像你们一样的善良劳动者的刽子手；这场以天皇为最高统帅的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我对不起中国人民，也对不起乡亲们……

结果，“武运长久”旗落在地上，乡亲们的眼泪也落在地上。

这位“英雄”就是经过中国的教育、改造而转变了的日本战犯。

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大都是被苏联俘虏后于1950年移交过来的。他们初到战管所时，很多人还穿着军装，带着肩章，有的连马靴也不换，气焰嚣张地站在战管所长面前抗议，说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说中国违

反了国际法，他们要向联合国控告。有的一进监房看见战犯管理所贴在墙上的监规，一把扯下来撕了。军人中属59师团的最多，59师团长藤田茂公然叫嚣：“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我们的天职！战场上杀人是战争中必要手段！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在伪满当警正的廉毛繁大叫嚷：“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中国维持治安的，你们新成立的国家，有什么权力关押我？”

但是经过五、六年的学习、教育，个个都变了。他们承认对中国是侵略，承认他们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造原则；坦白交代指挥所部或亲自动手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承认他们丧失了人性，甘心作军国主义的鹰犬，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他们终于清醒过来。看清了历史和现实，把军国主义批成狗屎，把天皇神的偶像打个粉碎。

为了和平

那些免于起诉的和陆续服刑后释放的日本战犯们，回国后组织起一个叫做“中国归还者连合会”简称“中归连”的团体，成为日本的一个宣传和平、反对战争、鼓吹日中友好的强大力量。每个中归连会员都是积极的和平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说来几乎难以相信，现在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各县支会的骨干，很多都是中归连会员。

三十多年来，“中归连”一直在行动中，他们经常作巡回演讲和演出文艺节目，介绍新中国，揭露军国主义战争本质。

八十年代初，日本冒出一股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黑潮。原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所在地丰岛地区出现一座颂扬甲级战犯的纪念碑，福冈中央市区出现一座“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连东京也有了这种活动。日本文部省还把教科书中的历史加以篡改，对东南亚各国的“侵入”变成了“进入”。这些激怒亚洲人民的举动也激怒了中归连的会员们。他们组织了国会前的示威，收集资料图片在各大城市举办展览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有位会员拿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到文部省，喊道：“你们看看，照片上的这人就是我，我就是证人！这叫侵略还是进入？”针对文部省的倒行逆施，广岛市教育行政机关批准了中归连编的一

套教材，分发12000名教师，作为对50万中学生进行和平教育之用。其中有一章是《中国战犯管理所》。

针对那座为大东亚战争树立的纪念碑，中归连会员们树起一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牺牲者慰灵塔”，塔侧刻着一段文字：

“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对此，我经常表示忏悔，并建此碑，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合掌。”

战犯与“恩师”

日本战犯提到战管所人员，都把他们称作“恩师”，或“教会我认识人生意义的教师”。他们回国后写来的信中，总表示盼望能再见到“老师”、“恩师”们。回国后被选为中归连会长的前中将藤田茂曾四次访问中国，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每次他都提出，并邀请中国战管所人员访日。第五次1975年访华，他说“我已八十多了，这恐怕是一次告别访问，也是最后一次邀请。我希望管理所的先生们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否则我再没有时间来中国邀请了。”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未能

▽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抚顺对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免于起诉，并且立即释放。被免于起诉的战犯流出热泪，场内一片哭泣声。



完全实现，只是前战管所第二任所长金源于1967年11月以中日友好访问团成员身分个人访问过日本一次。他和中归连会员们所期待的管理所人员访日代表团，直到1984年才出现在日本，此时藤田茂已经不在人世了。老人88岁于1982年溘然长逝，临终前嘱咐家人给他穿上周恩来赠给他的那套中山服。以表示在九泉之下的学生对中国老师的怀念和系念日中友好之情。

金源访日，虽是个人身分，但在归还者们眼里他还是恩师的代表，他的访问在日本还是引起了轰动，给日本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和我谈起那次访问，我感到他的激情仍在，特别是谈到一位归还者妻子的故事时，我甚至看见他眼角上的泪花。

中归连在各县的会员，一听说当年的的金少校来了，纷纷从各地赶来东京，都要向他叙一叙这几年的学习、工作，有的就直接来为接待工作服务。金源住的公馆内外，昼夜有中归连会员为他守卫，防止右翼势力的捣乱。旅馆外终日有各地来的会员排队等候接见，有的带儿女，有的带家乡土特产，有的带来孩子们作业成绩，有的带来自己劳动的果实。

在一次欢迎集会上，一位归还者为了筹措支援接待费用，上午作了一次收费的演讲，下午他还想再作一次，然后到欢迎会场去。不幸，他在路上遇到车祸，竟未抢救过来。金源在欢迎会场，忽见在排成长队的致敬者中，有一位妇女捧着一个木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她走近了才看出那是一个灵牌。那妇女说：

“我丈夫预定下午来看望先生，这是他多少年来的愿望。现在，他死于偶然的车祸，不能亲自来了，让他的灵牌来实现他的愿望吧……”

这样的事，八年后中国抚顺、太原两个战管所代表团正式访日又发生过。已故的归还者的妻子捧着丈夫的照片来见“恩师”们，以此实现丈夫的生前愿望。

战管所的同志们在谈论战犯工作时，时常提起周恩来当年说过的话：二十年后算账，就可知这件工作的伟大、光荣。今天是战犯，二十年后是朋友。

这样的朋友，不是以人头计算，而是按户算的。

也不只是一代人，而是要代代承继下去的。中归连的会员们纷纷告诉来访的“恩师”们，他们虽已老了，但是家人子女将继续他们的事业。有的让孩子学中文，有的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他们让孩子们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再生之地”战管所，看平顶山等地烈士馆，了解他们过去作为侵略者所犯的罪行，他们还让孩子们与战犯所人员的子女结交，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福岛县警城市与抚顺结为友好城市，并为帮助再生之地抚顺市的四化派出贸易视察团来，作出规划并且正逐步实施。他们筹资在抚顺建“日中不再战之碑”，在附近建纪念馆陈列日本侵华罪行资料。

1984年10月3日，藤田茂的孙子藤田宽，作为三千名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日方代表团成员，是邓

颖超特邀的已故日本友人子女之一，来北京见到原战管所所长，激动地说：“爷爷生前经常教导我，他的生命是中国给的。我们决不能让前辈的命运重演，一生要为日中友好而奋斗！”

“魔鬼”流泪

这些日本战犯们是怎样转变的呢？

日本战犯们在被释放时和回国后，没有一个不再三表示感谢中国给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的。他们大部分人通过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教育，逐渐接受真理而成为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和平战士。

可是，当初他们却把中国的人道主义待遇看作软弱的表现。

这些人在苏联俘虏营时，每天受着苦刑般的重体力劳动的折磨，连黑面包和稀汤也吃不饱。他们一登上绥芬河的中国火车，首先出现的是医务人员给病号看病，第一顿饭就是白面馒头。在战管所，没有劳动，每天细粮和肉菜。有的战犯还说，“给我吃好点，天皇是会付这个账的”。依旧满口悖理，不承认是战犯。抗美援朝，他们认为中国是引火烧身，美国人必定会打过鸭绿江，把他们救出去。他们被转移到哈尔滨和呼兰，在监房里竟唱起日本军歌来，对中朝军队几次大捷的消息，他们不相信。

直到停战谈判开始了，他们才沉默下来，思考起来。这里怎么回事？中国人真有力量？中国不是弱者，为什么宽待他们？按照他们的逻辑。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诡计，用软化的办法骗口供？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他们为了寻求答案，除了报纸，对书籍发生了兴趣。中国的书籍，给他们打开了世界的窗户。使他们“大吃一惊”的一本书叫做《论持久战》。这是他们集体写的一本叫《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的书中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根本未曾想过侵略他国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受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和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必将失败的！现在不能不回顾自己跟着社会环境随波逐流，不动脑筋辨别是非盲目地去执行上官命令的经历。同时，对开战初期就从理论上分析、预见到结局的中国领导者，从心里钦佩和服输了。”

他们作为战犯在中国接受改造时的见闻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

炊事班给他们找来做年糕的糯米和工具，让他们打年糕，过个日本式的年；

他们无意中打破了一块玻璃，正担心要受惩罚，看守人员跑来却只问“伤着人没有？”

有个一时想不开的，跳进粪水池企图自杀，一位看守员看见了马上跟着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医务人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眼睛不好的配眼镜，缺牙的补牙镶牙。对重病号进行抢救，有几次是看守员

献血。国内没有的特效药就从国外进口。瘫痪的武部六藏，受到24小时护理，包括喂饭喂水端屎尿盆。有位重病号被送到矿务局医院就诊，上楼困难，医生温久达亲自背他上下三层楼。

有个战犯参加服务性劳动，一次被叫到保管室帮助调整存物架子（犯人调整房间，存物室里也将犯人存物相应调整存位）。他发现，他们入监时交所保存的物品小自纽扣大到金条珠宝一样不少。他写道：“我瞪大眼睛愣住了。而在苏联，那些所谓保存起来的東西都没有归还，连钱也给骗了去……”

新井正代写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件经历。有一天他正在战管所院中放风，忽然从伙房跑出两个年青炊事员，其中一人指着他向他跑来，一路大声喊叫，说的话他一点不懂，只见这青年满脸怒气，几乎扑到他身上，幸亏有一位护士从医务室跑来给拉住了。一位会日语的管教员过来问清了那炊事员后，把新井正代带到走廊里告诉他：那个炊事员十岁时，村里遭到日军袭击，有个日本兵到他家，杀了他父亲，把他姐强奸后也杀了。他当时躲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他认出了，“那个日本凶犯就是你！”

新井正代完全吓懵了，浑身发抖，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只顾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作了坦白交代，他认为现在无论如何是逃不脱报复了。没想到，他受到待遇仍是那样，所方态度仍是那样，还是叫他好好学习，认识自己。那位炊事员也没找他麻烦，显然，所里对炊事员做了工作，直到这时，他才相信中国人不是要报复，是真的等他们接受教育改造，重新作人。

他们由此也明白了，战管所的人员有许多是他们从事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从那位炊事员的眼睛，他们知道这些人心里不会没有仇恨，但是没有人对他们流露出来，那炊事员刚一发作就被护士拉住了，可见所里对这个问题是预见到并且做过工作的。他们不但不发泄怒火，不作报复，而且毫不动摇地贯彻人道主义政策。

他们明白了中国并不软弱，正是由于强大所以才充满信心地看待未来。他们明白了中国给他们的人道待遇是真的，没有任何诡计。这样，从所长到炊事员，个个都在他们眼中高大起来。

为了将“鬼”变成人

战管所的被战犯称为“老师”的人，当初可是不敢当这“老师”的。

孙明斋从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调来当所长，一到任就有位刚从公安三师调来当班长的排长找他，一肚子委屈地说：“我可是一心干革命，党叫怎干就怎干，从来没犯过错误，为什么非要我来看守日本战犯呢？”

孙明斋的山东老乡，一位八路军的老战士对他气呼呼地大叫：“妈的！见了这群魔鬼，恨得我牙都疼，等他们来了，非用机枪突突他几个不可！”

医务人员也个个一肚子气。一位护士声言：“我只护理自己的同志，不护理日本鬼子！”

战犯们还未到，就得先作好自己人的工作。孙明斋事先已了解了，调到战管所的同志几乎都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家仇国恨。有的被日伪的集家并屯政策弄得家破人亡，有的家里弟兄被抓劳工死在外头，有的自己就当过劳工，遭到过非人的虐待，有的家人因抗日而遭杀害。这些同志闹的情绪与闹名誉地位的不同，孙明斋理解，甚至还同情，因为他自己一听说调来做战犯工作，立即想起他那海阳家乡燃烧的村庄，被杀害的乡亲，他那被日本狼狗撕烂的舅舅……

“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思想虽然会有反复，但还是想得通。”孙明斋在我第一次访问，对我这样说。这时他已调离，当区委书记去了，不过还经常到所里看看。“只要明白了党的事业，党的政策，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再加上我们的经常思想工作，问题解决了。”

日本战犯候轮回国途中，患病的获释人员受到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照顾。

▽重病不能自己走步的森三山正由护士精心照顾。

▽为增强体质，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图为排球比赛。



他究竟还用了什么办法来打通工作人员的思想，没有细说。但我相信。他本人的榜样就是有力量的。战管所的同志都向我提起所长和他们一样，也是受过鬼子罪的。所长能控制自己，不以感情代政策，我们也没说的，好好干吧！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一位曾被鬼子抓过劳工，受过折磨的炊事员，在送饭时有些不耐烦地敲着饭桶催战犯们打饭，战犯们就用敲门板声起哄，气得这位炊事员踢了饭桶一脚粗声大喊：“这不是你们骑大马挎洋刀的时候了！”一位警卫班长执行巡逻任务时，听到有人对他喊“八格牙路！”他不懂日语却知道这是骂人。他到监房里追查这个骂人的，没有认出人，反而被一屋子的战犯奚落了一顿。气得回到宿舍，一头钻进被子里痛哭。每逢这种时候，所长就亲自来做工作。

“耐心，这也真不容易。”孙明斋说。

连所长也有耐不住的时候。有三十多名战犯联名给中国政府写一份“请愿书”，内容完全是抗议对他们的关押。这三十多人被召到会议室，所长要听听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有什么理由长期关押我们，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岛村三郎起立说，他承认请愿书是他执笔的。他越说越来劲：“如果要使我们成为中国的阶下囚，我作为日本大男子，死也不受此耻辱，我要坚决反抗到底！”

其他的人也跟着叫嚷起来：“同感！同感！”“我也是这个态度！”“你们要立即释放我们！”“你们违反国际法……”

所长突然起立，大步走到台前。

“混蛋！”他的嗓门大得惊人。“你们残害了多少中国人，这都是根据哪个国际法干的？你们今天还想用什么法来吓唬中国人吗？我明确告诉你们，你们在中国人面前是罪人！中国人有权制裁你们！”

担任翻译的管教员崔仁杰，没把混蛋二字译出来，可是日本人都听得懂。这些日本“大男子”居然立时安静下来，吓呆了眼。

所长也平静下来，他恢复了平时的声调，重新讲解了对战犯的教育改造的政策，最后说：“你们面前摆着光明与黑暗两条路，由你们选择。我只希望你们好好认识自己，弃旧图新，重新做人。”

所长毕竟是所长。以后再没有骂过混蛋。岛村三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国归来的战犯》中对所长表示极为佩服和敬仰的心情。他提到一个战犯广濑中校的故事。广濑对其他战犯的揭发批判总瞪眼威吓，引起公愤，在批判会后被关进单押监房，还带了一夜铐子。三天后，“所长亲自到他监房说：‘戴手铐是我的错误，我要深刻检讨’。第二年中校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回国，所长特意到天津送行（他是给所有释放者来送行的）。两人共进晚餐，所长还赠送他一双象牙筷子，再次表示歉意。这是我回国后到中校家访问时，他给我讲述的一段

情节，并让我看了这双筷子。不管对方是囚犯还是什么人，战犯管理所的最高领导人孙中校都能直爽地认错并以诚恳态度作自我批评，这种精神使广濑中校深受感动。”

所长的榜样——排除任何个人恩怨情绪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执行周总理的一切指示——无疑地影响着带动着所里全体人员。他们在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周总理指示的深刻意义，从战犯的纷纷转变中看到成效，从而受到鼓舞，工作就越加细致，对战犯越加了解，措施也越加切实有效。

岛村三郎，这个残害过几条性命而不曾手软的人，一想起被俘前在长春失踪的独子就长吁短叹。监中有人一次提到在长春东站附近有个七八岁男孩一看见有卡车开过，便用日本话喊：“有没有我爸爸”，他就认为一定是他的孩子。后来妻子来信告诉他孩子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拿着信到院子角落里失声痛哭。这一切都看在看守员的眼里。“原来他还有点人性啊？看来这人还有救。”他们想起毛泽东主席讲过，反动阶级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这话越想越对。

有个战犯在回忆录中写他们转移到哈尔滨的生活，晚上没事，就讲故事。有一位讲起他的朋友的一段恋爱悲剧，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位为了救活全家人而卖身的“苦命女”。听得大家很入神。故事刚一讲完，管教员在铁栅外出现了，大家正担心要受申斥，不料管教员说了一句：“这个女主人公，很像俄国小说里的卡秋莎啊！”他们不知道，管教员在铁栅外一直注意着每个人听故事时的反应。管教员是从这些变形的灵魂中发现了希望的幼苗。

石渡毅在回忆录中写到有一次收到未婚妻寄来的照片和情诗，“正出神，感到身后有人，原来是班长（战犯称看守员）正微笑着”。这位看守员也从他的神态上看出了他未泯灭的人性。

在战犯的来信和回忆录中，总是感谢中国的战管所让他们恢复了人性。看来，改造罪犯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恢复罪犯尚未泯绝的人性工作。可是在战管所，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两个字。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我，曾经为了抢救垂危的战犯，先后不只一个看守员献过血。

那位温久达大夫，把生病的战犯背上背下三层楼，回来都不敢报告，也是怕说他丧失立场。因为别人发现他领子后边湿了一片，追问起来，才知道被他背上楼的战犯哭了一路，流的眼泪。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没有改造罪犯的政策，没有周恩来，改造政策就很难得到正确贯彻并完成。这个由一系列措施构成的改造人的伟大工程，没有一批具有高度觉悟、忠于革命事业和理想的无名英雄，就不成其为被人念念不忘的“老师”。没有这一切，就没有如此辉煌的中国奇迹。

攻克「白病」有克星

——记「818祛白露」的发明者唐大发先生

张细阳

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医学界还没有根治白癜风的特效药,也未听到国内有能治白癜风病的医生。因此,国内越来越多的“白”病患者,仍用进口的各种药品来治疗,其效果如何呢?除了烧死表皮层细胞外,其后果令人十分担忧。

祖国的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宝库,这个宝库内有取之不尽的宝藏。走进合肥市胜利路80号8幢唐大发的818研究所,里面摆满了数十种珍贵中药材,他正用手炮制着。他的研究所兼诊所内曾来过许多病人,经他治愈的就有我们国家的驻外使节,有海外华侨,有北京某国家机关的首长,但更多的是各行各业普普通通的患者。

当记者第一次采访他,获悉他曾成功地治愈一些患者时,觉得特别惊喜,因为这种病是一种顽固性的皮肤病,而国内外患此种病者呈越来越多之势。记者按一封封患者感谢信中提

供的详细地址,进行问卷调查,每一封复信中,都言不尽对唐先生的感激。

来自武汉的小学教师徐某,使用别人剩下的一点唐先生研制的818纯中药水,仅10天就好了一半。新加坡大巴窑56号何某头上患有大片白癜风,15年来到处求医无效,慕名到合肥,使用唐先生配制的818纯中药水,外擦80天已缩小一半。辽宁锦州建行张某,现年34岁,上半身患大面积的白癜风,求治5年无效,使用唐先生研制的“818祛白露”中草药水剂,外搽5个月痊愈。安徽省煤炭厅孟某,女58岁,高级工程师,患白癜风20多年,四处医治,均无效,用了唐先生研制的药后,一个月之后好一半。安徽医科大学医疗系学生王某,下腹部大面积有“白”病,3个月基本痊愈,为了让更多的患者信服,为了给唐先生提供研究资料,这位学生将各个不同疗程中“白”面积由大缩小的照片摄下来。

唐大发不是名医世家出身,他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的成功道路上有许多坎坷和插曲。他原是合肥市粮食部门的职工,1977年身上患上了白癜风,当时全身只有少量的白斑,1985年妻子病逝,这突然的精神创伤使他身上的白斑急剧发展,他到处医治,毫无效果,后来他根据原先跟老中医学徒时学得的中医知识,自己试着用几种中草药泡水,在患处涂抹,没想到这就是成功的开始!当时,他高兴得无法形容。神奇的疗效使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继而,他主动找患有白癜风的人,用他自己配制的中草药水免费义务为他们治疗,他是一个有心人,他想收集更多的资料。在他的治疗下,多少个患者家庭内有了笑声,多少个父母“千恩万谢”,多少个青年患者原来怕见人,现在经唐先生治愈后,上了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据有关数字表明,唐先生研制的818中药水剂外用药,有通络祛白之特效,有效率达90%,一次未抹擦过进口药的治疗效果可达98%,治愈率达70%。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唐大发收治白癜风患者达千人以上,从内蒙古到海南省,都有他的病人,他的每一位病员都是他最好的宣传员。我们可以这样自豪地宣称:在中国,白癜风再也不是“不治之症”!中国已有了“白”病的克星。

不少知名教授、专家来找他,要求与他“合作”。合肥市也有个别不法分子冒充唐大发,截去千里迢迢专找唐先生来治病的学生。有个别人出于其他目的,利用手中职权,妄图夺去他的验方,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造谣说:“患这种病的有许多是不治自愈的”。

唐大发的发明和研制的“818祛白露”,1991年荣获国家两项科技成果奖,1992年7月8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权(专利号:90100095.7),中央电视台多次介绍了他的坎坷经历。他的事迹,在香港等地出版的书籍上均有介绍,为了解除许许多多“白”病患者的痛苦,最近合肥市为他成立了一个研究所。

目前已是研究所所长唐大发告诉记者,他们已在承德市和内蒙的巴盟市设了专科门诊。目前,他在合肥建立的“中国·合肥唐大发白癜风专科医院”开业在即,这对国内外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打扮，是突出一个 女人的最好手段

江青出身贫苦，小时常穿异母姐姐穿剩的衣服。但从十几岁进入演艺圈开始，她逐渐讲究上穿戴。

30年代初，江青只身闯入大上海，就已经是一个十分注重衣着打扮的姑娘了。

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江青在上海只穿大众化的布质列宁装和一般式样与质料的旗袍。

年轻时的江青，着装喜欢素雅、大方。这也可能出自于山东人那种生来质朴的性格。江青刚刚到上海时，上台演戏，还常常带着满口的山东腔呢。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既使在主演《娜拉》最大红大紫的时候，生活中的江青都从没穿过大花或色彩鲜丽的衣裳，也不戴首饰，透着一种青春的纯自然气息。

这是她的风格，是她在花花世界上海滩上与那些花枝招展、搔首弄姿的女影星们最大的不同。

但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江青不是不爱美，她比任何人都更讲求美。只不过她讲求的美，是一种格调。而且，她善于把服装的格调与她的个性和经济条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巧妙地从一个角度显示了她性格中争强好胜的最大特点——自我突出。

她拍片的报酬很低，再没有其它收入。在讲究的社会场合，江青不愿显得过于寒酸，也常穿质地稍好些的紧身旗袍，从身段中突出自己。一次，购买一件兰色滚边的丝质旗袍，她不得不在饭食上节省，甚至拖欠了房租。

投奔延安以后，一身肥大的土布衣裤，使江青有一种像被装进口袋的感觉，对天生爱美的她，这实在难以忍受。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她做了精心的自我调整，用一条皮带扎在腰间，显出身段；再翻出白衣领衬托白皙的皮肤。在粗犷质朴的黄土高坡，格外引人注目。

解放以后，物质条件好了。江青虽已徐娘半老，但终于有了讲究外包装的条件。她开始为自己设计考究的衣服。冬天用毛料，夏天用丝绸。

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服装式样不能过于新潮，也不能落后于时代，江青无以从式样上翻新，就在质料和做工方面很下功夫。

江青有一特别的嗜好，就是对服装颜色的挑剔，几乎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即使是别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她也会当着人家的面，品头论足一番。

江青有自己一套古怪的服装理论，尤其注重色彩搭配。不知是否一种心理因素，江青为自己选衣、除年轻时喜欢兰色以外，最偏爱黑色和咖啡色。在她的服装中，无论春夏秋冬，这两种颜色的衣服为数最多。

“江青服”

出笼的台

求实篇

总的说来，在60年代初以前，江青做衣、买衣、穿衣与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买给自己，穿给自己看的，最多不过希望别人夸奖、吹捧几句。在提倡“艰苦朴素”的毛泽东时代，江青在穿戴方面，只能是自得其乐。

60年代末就不同了。江青大走了“文革”的红运，在政治上不仅探出头来，还牢牢站稳了脚根，贪图奢华的享受之心也由此终于等到了实现的机会。在天天身着一身象征着斗争性与权力、地位的军制服的同时，已经50多岁的江青感到，要寻回过去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开始把服装当成了一种在政治上、生活中突出自己的最好手段。

当时名噪一时的“江青服”，就是在这种年代、这种心态下的产物。

难产的第一件“国服”

70年代初期，江青从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腾出手来，开始酝酿能够突出自己、抬高自己的服装。她忙里偷闲地翻阅了一些服装资料。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江青把注意力集中在唐、宋、明三个中华历史文明的鼎盛时期。

前与幕后

唐代出了个女皇帝，她对唐代的服饰备加青睐。

1974年5月19日下午，江青以接见为名，把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召到钓鱼台



▲ 身穿紧身旗袍的江青

她的住所，还另外请了三位女京剧演员。

这一天，江青兴致很高。闲扯了一些“样板戏”的排练演出情况之后，江青开门见山地谈出了她想制做服装的意图。她说：“中国男子有了定型的服装叫‘中山服’，可中国的妇女却没有，男女平等嘛，男尊女卑的历史要结束，我要为中国的妇女设计一套独特的、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装。”

话音未落，她收回一片赞誉之声。

江青得意地笑笑，抛出了她的方案：“这种服装嘛，可以借鉴古代盛唐时期妇女的装束。”

她抱来几本早已准备好的唐代壁画集，熟练地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飞天”说“照着这个样子去设计。”

几位在场的京剧女演员，对古装戏衣十分在行，当江青请她们提提看法的时候，她们实事求是地说，古装的披领、圆领太秃，并不好看。

还没等江青说话，浩亮抢着插嘴说：“秃没关系，可以加上护领嘛。”他详细地讲给江青听什么是“护领”。

浩亮当时不仅是江青一手提拔起来的文化部领导，还身兼中国京剧团的副团长。他本是京剧武生行当出身，演了半辈子的戏，对戏衣很熟悉。

江青听完浩亮的介绍，眉开眼笑，说：“好啊！衬个白领又整洁又漂亮。”

江青指出画册中服装其它不如意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地帮着出了一阵主意，改进、完善了江青初期的构想。江青越听越高兴：“对！就是这样的！领子要……，肩膀要……，袖子要……”

江青一口气提了许多要求。对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她没有忘记中国的绣工。江青要求她这身衣裳多处要有绣花，精致的绣花。最后，她拍板定案：

“浩亮啊，你去办。先做两套，越快越好，‘5·23’接见文艺界，我就穿。”

这是一副重担子！因为，只有三天的时间。

当晚，浩亮出了钓鱼台，一点没敢耽搁，就直奔人民剧场。他给在那里正参与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的两位中国京剧团的服装师事先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戏散以后不要走，原地待命，“有重要任务”。

那个年代，中国的服装业早被“横扫四旧”的声浪，扫成了一片灰蓝之色的中山装和国防绿军制服。偌大个中国，竟没有一家民用服装厂能够承做除此之外的服装。江青所要求的这两套衣服，只能靠几个文艺表演团体的剧装师和剧装厂设计制做。而这些部门，也不过是在为“样板戏”做服务工作中勉强维持、苟延残喘的小小服装作坊。

但江青信任它们。做不好可以改，改不好可重做。文艺界是她的嫡系，亲信众多，她好使唤，用着也放心。

当浩亮赶到人民剧场时，中国京剧团赵金生、韩常青两人已在等候。他们见浩亮满面通红、大汗淋漓，不知出了什么事。

“重要任务！”浩亮不得不长话短说：“首长要你们做两套衣服，5月23日有重要活动，就穿。”

“首长”一词，在那时几乎成了文艺界对江青的专称。一听“首长”二字，人人都知道这是指江青。

两位师傅顿感手心冒汗——两套衣服？只有三天呀！江青要求的衣服又绝非一般……

果然，浩亮要师傅们拿来老戏中的女披、褶子、官衣作参考，并把江青要求的式样、花纹、颜色，甚至扣子一一作了交待。

两位服装师连夜设计、画图，彻夜未眠。

根据江青的意思，这种服装上身是和尚领绣花衫，下身连一条百褶绣花长裙，中间由一根同色同质料的绣花腰带连结，与50年代流行的“布拉基”十分相似，唯有“和尚领”是戏曲服装的特色。

江青设计的这种衣裙，吸收了很多戏装风格，因为江青本人很喜欢戏装。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江青最早学过京剧，由梨园跨入影剧界；第二，有人说江青一生都在演戏，所以对戏装也就有了特别的偏好。

江青要求的这种衣裙虽有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洋的味道，但满身中西合璧的绣花和百褶，却能够充分体现服装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

第二天一早，浩亮又匆忙赶来，亲自审查图样，并



▲ 30年代江青身着精心编织的手工毛衣

——她不满意，要求重做。

当天下午，浩亮满头大汗，夹着一包古装衣服纸样又来到钓鱼台。江青要重新选定式样。

她在各式各样古装图的纸样中，选出两种，说：“照这样式，再做两套，驼色一套，黑色一套，要快！”

这一回，江青还特别提出，一定要手工绣花。

四天以后，两套新服装做成了。

江青又打电话请来几位女演员一饱“眼福”；同时，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也被叫到钓鱼台。

江青试过那件黑衣服，脸上露出少有的满意笑容。

“这一条绣这么大的花，我哪能穿啊？”江青用手抖搂着驼色的那一件，大声叫着。其实，那花样是她几天前才自己选的。

“我们给您重做！”部下们表示愿再卖力气。

“哎呀！那就浪费啦！”江青哆声哆气地说。“这样吧，干脆让中央乐团出国演出时报幕穿吧。”

大家离开时，江青只留下了那条黑色的衣裙。这是一条极为高雅庄重的丝绸圆领裙，领边绣着一圈淡色的小花。



▲ 60年代江青军服照

找来剧装厂和绣花厂的老师们当场定稿。然后，浩亮从中选了几个样子送江青审定，“首长”满意后，再连夜赶制。

满身的绣花，可不是能够急就而成的活儿，为赶任务，绣花厂的两位女老师傅整整连续工作了24小时，没下绣花机。

绣好花，已经是期限内最后一天的晚上了，剧装厂再赶制一夜，才终于成衣。

5月23日早晨，浩亮顿感一种完成任务的轻松。他高兴兴把这两套成衣按时送到江青手中。

谁知，江青看了看，试也没试，就弃之一旁。接见文艺界代表时，她根本没有穿。

鲜为人知的“江青鞋”

为配合衣裙成套，江青还要给自己做双特别的鞋。

为了这双“江青鞋”，费尽了多少人的心机，挥霍了多少人的血汗，已实在难以计算了。



▲ 延安时期的江青

一天，浩亮手捧着一本《陕西唐三彩俑》画册，又向中国京剧团的服装师传达江青的指示。

“首长要你们照这些唐俑脚上的鞋样子做一双鞋，特别要参考这一双设计”——他手指的是武则天女皇帝。

“首长还特别提出了具体要求，你们认真听仔细，千万不能出岔子。”

对江青的“要求”，服装师们听过不止一次了，但哪一次也不敢有半点疏忽，无论“要求”是具体还是抽象，他们都要花费百倍、千倍的努力。

果然，这次的“要求”又十分苛刻。

“首长说，穿上这双鞋，既要露出藏在长裙子下鞋子的花纹，又不能妨碍拖到脚面前裙子的活动，听明白吗？”

浩亮见几位师傅表情严肃，越发加重了语气：

“鞋要做成厚底的，底高一寸，穿起来要衬托出首长的高大。”

江青的脚是一双“解放脚”，明显地留着她小时缠足的痕迹。她既要使它们舒服，又要让它们美观。所以，给江青做鞋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保护，二是美化。

江青出于对戏装的厚爱，对这双鞋又提出一种参考依据——传统戏中的“福子履”和“余太君鞋”。它们与唐俑的鞋风格截然不同，要将这两种不同风格集

于一鞋，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

服装师们设计了大量的草图，到了浩亮手中都没有被通过。最后，浩亮独出心裁，要大家用橡皮泥捏制鞋模。大大小小的鞋模捏了一堆，他才选中一个式样。

经过剧装厂的连夜赶制，终于诞生出一双不伦不类的“江青鞋”。

谁知江青穿上，鞋底太厚不能走路了，又嫌做工粗糙，下令重做。

这一回，她改要一双薄底鞋。

“底虽要薄，但必须是千层布底，再加个橡胶后跟，这样我才好走路。”江青向亲信们这样交待。

可是，剧装厂是做不磨不费、花哨而不耐用的舞台戏装的工厂。鞋也只能是舞台上穿穿，不是用来常走路的。上次那双厚底的就算是勉强做了。这次又要薄底、带橡胶后跟，能走路耐穿的高标准生活用鞋，剧装厂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亲信们四处打听，最后终于得知，北京只有一家鞋店可以承做这样的“怪活”，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内联陞”。

于是，一张说明来路的特别介绍信很快开到了“内联陞”，浩亮派人前去联系，在工厂的支持下，总算找到了鞋底、鞋面、鞋旋子，再拿回剧装厂赶制，反反复复，不知修改了多少遍，才算交了差。

伊梅尔达的白裙

1974年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来华访问，对江青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刺激。

社会上曾有一种江青欲与马科斯夫人媲美的传说，其实“媲美”未必真实，那年，伊梅尔达·马科斯45岁，风韵犹存，而江青已是一个整整60岁的老妇，背都有些驼了。

1974年9月20日，江青会见马科斯夫人那天，刻意打扮了自己。特别穿上了那条黑色的绣花长裙。这也算是那个年代一位60岁的妇人最大胆的装束了。

但无论如何，江青都无法盖过伊梅尔达的风采。马科斯夫人身着一件高肩紧身白色长裙，肩头束着几支淡雅的花，雍容华贵，光彩照人。

全国各大报刊均刊登了两位“第一夫人”会见的照片，相比之下，江青逊色多了。特别是在她所穿的那条黑裙子下方，两条因缠足而导致O型的小腿，完全暴露在照相机底下。

三天以后，9月23日，江青请马科斯夫人观看文艺节目，并接见一批文艺界重要人士。

伊梅尔达这天换了装，身着一件同样高肩，但从侧胸部印制了一排素雅的大花，一直拉到下摆的白裙，显得高贵端庄。而江青两次穿了几乎同样的黑裙子。使她

暴露出O型小腿的照片，再次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刊登出来。

从不甘于人后的江青，炉火中烧，马科斯夫人一走，她就下令仿制伊梅尔达的白裙。

国内几家剧装厂所选用的质料与做工都不能使江青满意，这项大工程只好求助于香港。这条裙子整整花费了7000元人民币才仿制出来，当它被送到江青手中时，江青却早已对这件白裙失去了兴趣，不要了。

7000元的仿制费用，悄悄地入了某个文艺团体的财务帐。

这个小小的刺激，再次引出了江青为自己设计“民族服装”的兴致。

江青的所谓“设计”，不过只是在头脑中有个似是而非的轮廓，再向懂行的人大概一讲。她常常把许多互不相干、互不相容的东西掺杂在一起，一股脑儿地倒出来，让别人去归纳、完成。成形以后，满意的，她会说是自己的“亲自设计”，不如意的，她就会责怪别人“歪曲”了她的本意。根据江青的旨意，做出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常有的事。

1974年的秋天，江青把几位长做剧装的老师傅叫到钓鱼台17楼她的住所。这一次，她要亲自向服装师们布置自己的设计意图。

面对着代表着全国戏装行业最高水准的服装师们，江青做出一副和蔼的面孔。她笑咪咪地捧出一个唐三彩俑。

“看见吗？以这个唐俑的服装为基准，参考以前几套服装的式样。”她左右摆弄着那只唐俑。

“嗯——，裙子要肥一点，再加上云肩领……还得要条腰带……”

她提了许多细致的要求，师傅们都一一记住。

临行前，江青又突然大叫起来：“等一等！差点忘了，让舞剧团的化妆师设计一个假辫儿，我要带在头上，连古人都讲究服装、头饰的配套。”

这一回的制做，投入了更多的人力。除了中国京剧团的两位服装师以外，中央芭蕾舞团（那时叫中国舞剧团）和中央歌舞团的服装师也被叫来一同参与设计与制做工作。

浩亮自己也亲自蹲在工厂监督。为保证质量，他拿了一块块的尼龙纱在自己身上左右披试，亲身体验色彩与质感。

经过几天几夜的赶制，服装送到江青手上。江青穿上，十分满意，她高兴地逢人便讲：

“呵，你们看看，这是我的设计，人家外国女人都有自己的服装，看看我们，走到哪里男人女人都是一个样，怎么行啊！要提倡穿裙子，穿我这样的裙子，这才能体现我们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嘛！”

所谓的“服装试验”成功了，江青随意改变着花样，成批定做这种裙服。今天变个领子，明天改改绣花，绸

绸缎的裙子做了一大堆。其中甚至有仿照唐俑所做的一条完全暴露了肩部的齐胸长裙。

江青还在外地大批定做服装。有时，服装做好，她又不不要了。她在天津试制服装时，因不满意，整批地向天津退货，一次就多达80余件。包括派力斯女裤、乔其纱大包袱，绢绸大包袱、女背心等等。另外还有牛皮手提包、绣花手提包、绣花围巾等多种饰物。

“照这式样做，让她们穿！”

为加大这种裙服的影响，广为宣传，江青下了一道命令：

“去，叫剧装厂照我这式样，给×××，×××……××各做一套，让她们穿。”

她一连点了文艺界走红的六七位女演员。把这种古怪的衣裙强加到大家身上，以做全国的楷模，推广、普及她的作品。

以后，江青不仅经常把这种衣服作为礼物送给国内的知名女士，以拉拢人心，还经常作为礼品送给来访的女外宾。甚至亲信们出国访问时，也要带上这种衣服，以“江青同志的礼品”为名，郑重地送给外国首脑的夫人或女儿。

江青高兴地对文化界的亲信们说：“试验搞成了，你们先在舞台上穿，然后我也带头穿，主席说这式样好看哪！”

短短时间，文艺舞台上的报幕员，女歌唱演员，女演奏员都换上了式样相同的“江青服”，在帷幕间进进出出。长长的百褶裙拖在脚面，走起路来飘浮如烟。江青看了高兴极了。

江青也真的在一些重要的活动场合穿上了她的新装，大出了一阵子风头。同时，她要求，凡是文艺界出席国宴的女同志，一律都穿她设计的民族裙子，没有的可以现做。

对出国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江青总要在全国临行前，就服装问题进行指示——

“出国，要有统一的服装。日本穿了我们的唐朝服，朝鲜穿了我们的宋元服装。我们呢，一定要穿有汉族特点的，特别是女服。以后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服装都要有特点。”

江青对她的裙服不仅作硬性规定，还时常逼迫别人穿。

1974年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审查中央乐团的出国演出节目。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已经在剧场久等了，却不见江青。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江青才大模大样地走进剧场。

原来，江青在前来审查节目之前，缠着文化部门的一位女领导，非叫她穿上这种古怪的裙服，那位60岁的女士不愿穿，苦苦哀求，说年纪大了，穿上不合适。

江青竟动起手来，硬要帮她穿，她还是不肯。

王洪文在一边似笑非笑地说：“你不穿，今天大家就都看不成戏了。”

迫于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长时间等待的压力，那位女领导实在不得已，才被迫钻到这种怪衣服里去。

“江青服”还扩展到体育界。江青在体育界的一名宠儿，借一次接见的机会，对江青拍马说：

“首长设计的这种服装式样很好看，很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体委已经作了决定，以后出国的女运动员都要穿这种服装。”

当时，他已为一批出国的女运动员开始制做这种服装了。有些人不愿穿，他把眼一瞪：“不行，一定要穿。”

1975年，江青能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已不多。为得到



▲ “江青鞋”

毛泽东的肯定，她把这种衣服送给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年轻女同志王海容，要她穿。

王海容本来就看不惯江青娇横刁蛮的作风，又见江青要她穿这种裙子，非常气愤。她曾当着江青几个亲信的面说：“搞这套？我才不干呢！主席说我们穿自己的衣服好，她非要强加给我们她创作的裙子……”

王海容就是不肯穿“江青服”，还带动了外交部经常参与外事活动的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几个女同志。

江青气得当众大喊大叫：“王海容这么霸道，穿什么衣服还得她管？外交部归不归政治局领导？归政治局领导就得听我的。让她写检讨！”

不久，王被江青手下干将整了黑材料，挨了整。

这一年，商店里也开始公开出售这种服装，引起举国上下的议论。对它不洋不土，不新不古的怪样式，老百姓难于接受。

“不好看，不好看！”

在这种服装出现的场合，人们私下里总是这样摇头。

江青的服装受到一种民族习惯的自觉抵制。

为抛售几乎要烂在库里的大批裙服，江青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种裙服降价，其价格从20多元一直跌到4元，却依然卖不动。

不久，江青自己收回了继续批量生产这种裙服的计划。她向亲信透露说王海容在主席那里告状了。

当时，这种服装并没有被正式命名。有人称它为江青式的“布拉基”，更多的人叫它“江青服”；还有人直接称其为“汉唐宫装”、“大包袱”。

江青本人，对这种服装也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名称。她当然最喜欢“江青服”这种提法。

“江青集团”覆灭之后，有人谑称这种古怪的衣裙是江青的“国服”，指责它是江青为登基做女皇帝而准备的。但据史料来看，江青设计制做这种服装时，并没有为“登基”而用这层目的。她的本意是借这种裙装突出自己，她希望人们能把她设计的这种裙子当作中国女人定型的服装，永久地穿下去。她自己也能像“中山服”的创始人孙中山一样，流芳千古，美名传世。

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江青通过制做这种怪服装挥霍大量国家资财与人民血汗，以及强加于人、蛮横霸道的作风，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共闻、公认，江青留给历史的，只有一个骂名。



◀ 「江青服」

與歷史同行

●何志云

有一阵我经常在想，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要是没有紧随文化革命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我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常这么想的那一阵，我刚刚过了30岁，正供职于北京一家在全国很有些影响的杂志。在这之前两年，我曾费尽周折从黑龙江调回了杭州，得以和先我回城的妻子团聚。我们在一间简陋却宽敞的木板房里安顿下来，我们有了通常看来不算差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我们和旧朋友恢复了联系，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就是说，我们还了称得上丰富的社交生活——周末一起出去跳舞，一家家轮着聚餐，夏天上钱塘江游泳，秋天绕西湖爬山……我们非常快地进入了杭州青年知识分子惯常的生活氛围。我知道，我们如此之快进入的，其实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生活。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安定感。我们一直不曾安定下来。确切地说，是我们的灵魂始终安定不下来。我们和这样的生活仿佛总是隔着一道不算浅的壕沟。我们白天可以消融在工作、应酬和热闹嘈杂的都市气息里，但到了夜深人静之际，夫妻面对，我们都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般的惶感，一种对面对的生活的陌生感和不真实感。灵魂就在这时开始左冲右突，寻找着安置自己的处所，同时搅得我们不得安生。

我们终于明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已经被不可挽回地重新塑造了。这就是我们回来了却总有一种异乡感的原因。要命的是，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这种异乡感了。这时，我们开始认真地讨论再次离开杭州的可能性。一年以后，我先调到了北京。又过了半年，我把妻子和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也接到了北京。不用说，面对我们的这个举动，在杭州的亲友几乎谁都是瞠目结舌。

在这个新的陌生的环境里，灵魂开始沉静下来了。沉静下来的灵魂才有可能去回顾自身。于是，我便不断地想，要是……

我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要是”。如果说历史中什么都可能发生，那么，惟独不会有“要是”——一般来说，“要是”常常是懦弱的灵魂给自己寻找的镇定剂。但是人们又不能离开“要是”，因为只有“要是”，才会给人们提供可资比较的参照系，这样的比较会使人们进一步看清楚自己。

那么，要是历史凝定在1966年的那个夏天，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呢？

那时我正是初中三年级的毕业生，毕业考试第一学期时就考过了，第二学期几乎全是在复习。因为家境，我绝不可能再升高中了，我的目标只是中等专科学校

校——那里半工半读，毕业后还会有一份过得去的工作。为此，我还断然放弃了初二时让我跳级升入高中的机会。如果有谁也像我那样，父亲去世后靠母亲给人洗床单衣服维持生计，自己一边读书一边逮鱼摸虾卖了补贴家用，谁就会知道我实在别无选择。我考中专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所在的杭州二中是全省著名的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去考中专，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所以干脆很少参加复习，到学校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离开学校就到处干活挣钱。在一个13岁的少年心里，不管还在做着怎样的梦吧，我唯一的选择是接受全部现实。我认了——我的读书生涯到此结束。

好，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往下设想：几个月后，我顺利地进入了中专；我在中专里学了三年，学到了一门技艺；然后我毕业了，分配到了某家工厂，当技工后来是技术员再后来晋升为工程师；我或许会有什么发明创造或许只当好一颗螺丝钉；最后我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在这个永远被称为“天堂”的城市里，忙忙碌碌又心满意足地活着，活得连很久以后某一天，会怎样送往火葬场都可以清晰地预见到。偶尔也会在什么时候，一闪而过少年时失落的那些梦想，迷离而又恍惚，但确实确实它们在日渐一日地黯淡下去，最后终至于无。

十多年后，我和我的妻子回城后重建的，就是这种生活，这种曾经无可逃脱了的生活前景跨时代的延续。当中所隔着的是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巨大时空。对我们来说，则是整个青春时代。

在刚刚踏上“北大荒”那块广袤的黑土地时，谁都不可能想到这一切。我得承认，我那时是半兴奋半是迷惘。兴奋和迷惘都来之前铺展而来的未知的未来。这生活对我是那么严峻却又充满着从未想见的新奇。我从未想过要“扎根边疆”但也不曾恨不得第二天就拔腿而走。夏天，我被清晨铲地时密密匝匝的“小咬”咬得满脸是包一个接一个打寒噤，也为黄昏铺天盖地的艳丽晚霞感动得情不自禁掉下眼泪；冬天，我曾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深夜，坐着拉木头的车从山里出来，冻得宁愿跟着车跑，也常常和仨俩好友，围坐在凌乱堆着书籍的炕上，背靠热腾腾的火墙，争论着马克思、尼采或者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我们曾经用孱弱的肩膀，抬着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木头，摇摇晃晃踏上几米高的跳板，有人因此受伤有人甚至致残，我们也会聚集上百人爬车南下哈尔滨北上佳木斯，在松花江边大声朗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寒冷的飘着细雨的深秋日子里，我们曾抬着棺材走向墓地，那里将永远躺着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我们从这里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迫近；我们也曾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婚礼，而在知青后代陆续出生的时候，我们从草原上采来五颜六色的鲜花，装点着绚烂的生命；在“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我曾经为信念的骤然轰毁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我也曾在蜡烛光下一宿未睡，裹着一件破大衣，写下为《青春之歌》翻案的文章，从此开始长达近二十年的文艺评论生涯……再严峻的环境和物质条件总是可以度过的，何况在我们之前，有的是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而新奇则给年轻的生命注入难得的营养与活力，人生因此便不再如同往昔。初到北大荒时的兴奋和迷惘，就这样渐渐让位给厚重的人生况味和踏踏实实的跋涉，而跋涉反过来进一步充实了这样的过程。

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我怎么还可能拘守着“天堂”，过那种让人心满意足的日子呢？

在离开北大荒差不多十年以后，我第一次有机会重返农场。一路上，我始终在回想那些让我一直牵肠挂肚的岁月，但一切都显得那样扑朔迷离，亦真亦幻，这使我非常沮丧。时间和空间的间隔，那距离，原来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短暂。不过，当我一踏上通往场部的那条黄沙大道，当我置身于我熟悉的色彩和气息里，我发现那一切全都回来了，回来得犹如我并不曾离开过的那般清晰。而这时，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我离开这里后的那些岁月，倒显现出了几分不真实。

我是在两个世界间行走——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意识到——归根结底，我不再属于这里。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这里过，我想，无论如今我是怎样想念这里。

当天傍晚，在越来越浓重的暝色和悄然的晚风里，我来到北山坡东侧的坟地。那里安葬着我的好几个朋友。他（她）们有的死于病，有的死于事故，但更多的死于——自杀。就凭着这些花一般年轻灿烂的生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将永远被钉在中国文明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坐在长满绿草的坟茔边，我也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惋惜。无论生命还是历史，本质上都只有一次性，都是无法重复和回归的，因此也就不容许多次试验和选择，正如昆德拉所说的，是“永远未完成的草图，永不上演的彩排”（《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历史由于种种机缘，走进了一个特定的通道之际，人要是无法改变它，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顽强地与它同行，不屈服也不被它压倒，只要走完它，就不意味着战胜了它，而且也将从中收获一份难得的馈赠。而这时那永远逝去的历史呢？它再也奈何不了人，却不得不听任人的裁断。面对着未来的人，便在这时去创造历史。

在我看来，所有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和历史融汇成了一体。对历史的评价和知青自己的感情，这时便不复重要。

于是，我的上山下乡经历和永不能再回的青春，就成了与历史同行的一段途程。那里连接着两个世界和两个“我”——一个属于过去，一个则面向未来。

〔责任编辑 晓度〕



矗立

在人类生活的剧院中，观众席仅仅是为上帝和天使们预备的。

——弗兰西斯·培根

1

中国人各有各的活法。1992—1993年冬夏这一段时光里，北京同力冷冻设备公司总经理白亚南，注定要在京北郊工地上度过了。在首都北郊立水桥乡三十亩工地上，正在建造一座投资五千万的现代化空调器厂。这是白亚南和全体“同力”人历经十年奋斗的血汗结晶和丰碑。一部诗剧的艰难酷烈的章节，在这里打上了一个粗大的句号。昭示着辉煌与狂飚突进的幕间曲，即在奏起。

白亚南何许人？北京籍人氏。男。44岁。在首都北京这块地面上，他除了拥有户口簿上的那一页单张和同力公司一员的身份，再别无他物。人事局的表册里，没有这个人；劳动局的统计中，也没有这个人。

12年前，挈妇携子，一身兵团黄棉袄，怀抱着一个被命运判定为终身植物人婴儿的白亚南，彻头彻尾是一个赤贫如洗的返城农垦战士，城市无产者。但是他带回了真正的宝物。那渍满大西北风尘的棉絮所包裹着的，是坚实的筋肉，奔流的热血；那一副饱经风霜的额头后面，是丰满成熟的头脑，寻求生力出路的意志。一部求生、创业的交响乐总谱，就要出自他和他的同伴之手。

而此刻，这位地之子城之子，就站立在北方冬季蓝天下的工地上，俯视着厂房地基刚出地表的百根水泥柱和簇簇戟立的钢筋接头。他东侧和身后的组装车间拔地而起了。此刻，白亚南正用一种温存亲子的目光，顾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用沉稳而富于感染力的语调告诉我，建成后的这个厂区，年产值约达到一亿元，当年收回全部投资。同力公司将成为长江以北自动化程度最高，生产能力最强的空调器生产企业。“这是我们同力公司的一个转折点。至此，我们才算有了自己真正的实业。这马上就要成为事实。现在我脑子里，开始想更远的事情。”

也许那些一踏入生活，便进入社会现成组织的职员、干部们，压根就不知道白亚南这号人；也许那些管理千人工厂万人公司，动辄向上要项目要资金的国营厂长、经理、党委书记们，并不把集体所有制的“同力”放在眼里。但是假如你知道了，这么一份子家当，这么一摊子事业，是12年前由七位返城知青，在得不到国家社会一分钱资助的情况下，由自筹的三千四百元垫底，靠一榔头一榔头敲黑白铁起家，而至今番光景的，你难道不会茫然失声，继而击节赞叹吗？

2

白亚南展示了一种人生。“同力”展示了一种集体的人生。

十二年历史瞬间。就在这短短的历史瞬间之中，借

人生

——白亚南和他的世界

●张建木

大中国，变化出举世瞩目的景观。作为这景观细胞之一的北京“同力”，在极其短暂的历史进程中，一下子经历了白手起家、原始积累、开拓、发展、成型、成规模诸阶段，既是浓缩了的资本的历史、生产力的历史，又是人的生活的历史、获得尊严的历史。

现在的“同力”全称为：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下属有三座工厂，一个组装车间，两家合资公司，一个广告公司，一座招待所，一座饭庄，一座现代化展览厅，一座办公楼，一所五金化工商店，一处职工宿舍区，一个汽车队。其资产总额，保守粗估约合九千多万人民币。

三千四——九千万。十二年变迁。这之间是个什么样的比率和反差？其中包蕴着什么样含义？老志愿军战士王巨友用“爬坡”比喻同力公司，比喻白亚南。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坡度和高度？

数字是枯燥的，但它们却是由生动的、活的人创造的。这一创造改革开放时代资本增殖奇迹的人群的首领和策划者是白亚南。

白亚南和他率领的“同力”一群人，一出现在北京城西地面，就被视为一帮社会困难户、不可理喻的怪物。那些习惯于用旧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价值标准看世界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白亚南们的出现正是1949年后共和国三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应召而出的新社会生产力的萌芽。是一些人在确认了自己的生存的权力，劳动的权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力之后，进行的自觉而郑重的人生选择。

“一个雷天下响。有人干的成事有人干不成事。有人认为我们‘同力’是撞大运撞出来的。其实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有目的地做事。我们公司的任何发展，都是我们事先策划出来的。有机遇我们就利用机遇，没有机遇我们就想方设法制造出机遇。尽量把国家给的政策用足。邓小平给了条路，我们就干出了个‘同力’”。

白亚南如是说。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位白亚南？他又是怎样选择的自己人生道路的呢？

3

白亚南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兄妹七人。十一口之家，靠父亲卖力气每月挣七十元工资过活。他家平均每月每人仅六元生活费。对于这一家人来说，生活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吃饭。

亚南小时候，市区范围没有现在这样大，他家所在的八道湾已经是城边。为了填饱辘辘饥肠，他经常放学后，挎个破篮，拎把小铲，领着弟弟，步行到西外黄庄的田里挖野菜。

冬去春到，无菜可挖时，他就爬上树捋新长出的鹅黄色柳树叶。满满一篮挎回家。母亲在开水中焯一下，撒上些粗盐，做全家晚餐的佳肴。

夏天，母亲花几分钱买回的的处理茄子包儿，连皮带肉一起熬，最后茄子柄上的那一层紫黑薄皮，还要剥下来投入锅中。

此外，白家的食谱里还有槐花、榆钱儿、榆树皮、豆饼渣子、酱油渣子……

那年月许多人家都拿点心、面包当好吃的。但在白家，馒头就是最好的。亚南从宁夏兵团回京探家，临行，母亲用白布包两个馒头给儿子装进黄挎包。趁母亲不注意，亚南把馒头又掏出来，放回窝头篮子，用屉布盖严……

成年白亚南身上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性格，相当程度上是从饥饿中锻炼出来的。

然而在已经是小学生的亚南的生活中，上述窘困还不是最使他难受的。最使他难受的时刻是交学费的日子。“人家交得起咱交不起。”而上学念书，这是小亚南生活中最高的要求和幸福了。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同学从铅笔盒中捧出包学费的小纸包，交到老师手上，唯有他垂首书桌，忍受死一般的窘迫痛苦的煎熬。

生活并没有把所有的窗户都堵死。六十年代初异常活跃的少年之家、少年活动站，给了求知欲旺盛的小亚南以极大的抚慰。每天挖完野菜，进家把篮子往妈妈脚前一蹲，他就连跑带颠儿地奔向少年之家。从书架上林林总总的科普读物中，他认识了伽利略、门捷列夫、米丘林……知道了太阳系以外还有银河系还有宇宙……地球和生命是由原素组成……那位为真理死于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布鲁诺，更让他终生不能忘怀……

4

1964年的一天，家庭无力供他读完中学的白亚南，登上了开往宁夏垦区的列车，成为军垦宁夏十三师的一名兵团战士——全师中年龄最小的戴有檐儿黄帽的战士。那年他15岁。——一扎就是十五年。在他的肤色上，永远地染上了宁夏高原的日照和风尘。

谈起那一段岁月，44岁的白亚南一反沉默寡言

一提起兵团插队，人家都说怎么怎么苦。我就从来没有觉得过有什么苦。

那真是块叫人说不出感觉的土地。贫穷、落后，还富饶美丽。种庄稼宁夏最累，但全国数这儿最保险。每年刮两次季风，长年不下雨，只要你舍得下力气，种什么长什么，遍地庄稼绿油油。

我们刚到暖泉农场，——说是农场，连间草棚都没有——就自己动手挖地窖，棚上树枝干草，天不下雨，住进去安然无恙，暖暖和和。以后我们靠自己双手，烧砖，盖房，种树苗，修条田。到我们离开时，建设得够美的。

我们连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让上大学的，这些人天文地理，琴棋歌赋，无所不通。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连队，不少人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子弟。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十天之内消息就到宁夏。

通过对周围上上下下的观察，我得到很大启发。政

治这东西，从字面上说，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但归根到底的基础的东西，是经济，是生产力。政治的时代推到极端，代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的时代生产力的时代。1967年第一次读到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知道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范畴，知道了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

论学历，我不到初中毕业，但我读的书却多得多。说来也是机遇。我们师知识分子成堆，文革初期抄书就抄了一万多册，都封在我宿舍旁边的屋子里。以后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撤了，这些书就都归了我。当时我看的第一部书，谁也猜不到是什么——《满汉全席》第一册。以后就顺着拿来看。什么《拿破仑传》、《华盛顿传》、《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茶花女》、《红与黑》……巴金、鲁迅、柔石、郭沫若……周围的事我全不往心里去了，书成了我最大的寄托和爱好。我就这么每天一下工，点上油灯就扎进书的世界。一看好几年，眼睛还没看坏。

我读书的顺序大致是：先看中国历史，再看外国文学，再看中国小说，再往后看《资本论》，最后学的、最爱看的是《毛选》。

我真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最爱看他的《实践论》、《矛盾论》，领会他的世界观、方法论，主要是辩证法。学通了辩证法，不但事业通，还治百病，使人不会肝火太旺。

文革中我就大彻大悟了。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说他的思维和手段是截然分开的。人是人，思想是思想。邓小平改革开放走了十二年，为什么还不彻底？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的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市民、官吏……毛泽东当年遇到的也是这件事。

扯远了。我们连那帮比我大五六岁七八岁的人里，真是集中了一些精英。有苦练口才的，有会唱歌演戏的，有书说得好、棋下得好、球踢得好的，有文章写得好、画儿画得好、乐器弹得好的。篝火晚会上，一排人拉胡琴，一排人弹吉他。自发搞卫生，每人床头摆个花瓶……有一个给我唱了四年诗的朋友。一天晚上，我俩躺在麦场上，他看着月亮把记忆中所有关于月亮的古诗词背给我听，不带重样。不是通常的背诵，是唱，带曲调的，有点像昆曲。

在宁夏的十五年，这帮人吐出来的东西，都让我给吸收了。他们给我上了十五年课。今天我能领导“同力”跟这些人有很大关系。我只不过沾了个岁数的便宜。

那时我当拖拉机手。冬天挖沟挖不动，男的骂，女的掉眼泪。我就想搞个挖沟机械挂在拖拉机上。没钱没图纸。从农展馆弄到个样本，跑西北大学、西北轴承厂，请教授、厂长、技术员帮助、指导。团长特许我，凡是地里长的，都可以拿去做人情。于是我今天背个布袋上这儿，明儿个扛个麻袋去那儿。找厂长就得斗私批修，到底下车间就得喝酒划拳，论哥们义气。总之是要感动上

帝,减轻团里同志们的劳动强度。最后终于搞成了犁地挖沟两用的机械。就这么着,我学会了机械、制图,懂得了冷热交换。日后我能耍手艺、搞制冷,跟这一段经历有关……

可以说,我后来干“同力”所需要的全部思想准备工作,早在我在宁夏的那十五年里,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5

1979年隆冬,已进而立之年的白亚南,再次得到了一张北京户口卡。但同时杀回来的已不光是白亚南光棍一身,而是一个四口之家了。

巨大的祸事,在暖泉农场至火车站的几十里露天颠簸中就已经酿就。白亚南、张颖晖夫妇怀抱的四月婴——他们的二儿子白云,在寒风破骨的拖拉机上着了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白亚南夫妇,在列车行进到张家口的时候,发现孩子身上热如火炭,一时慌得不知所措。

车进故乡北京,他俩怀抱病婴,率领大儿,冲进医院。医生误诊,当一般感冒发烧注射了一针。眼见不退烧,院方说这孩子需要住院。住院需要钱。当时的白亚南、张颖晖,除了身上穿的棉制服,脚上蹬的大头鞋外,再别无他物。可是不住院孩子命就保不住……

在这钱关命关交关的关口,妻子泣不成声。已是成人的白亚南,强压住怒火和急切,以一种罕见的平稳坦率语调对医生说:“我刚从宁夏回来,身上没有钱,可我这孩子的病非看不可。请你想一想,就因为我没钱,你不给看病,万一这孩子有个好歹,你想我饶得了你饶不了你?反过来,你是我,因为你没钱我不给你孩子看病,把你孩子给耽误了,你说你饶不饶得了我?”

医生语寡。无奈之下他们收留了孩子。平心而论,他们做了工作,但他们绝对没有把一个返城知青的孩子当高干子弟治疗。

孩子永远地不会坐起、站立,永远地不会叫爹唤妈了。他成了植物人。

从天而降的灾祸加予白亚南的打击太大了。从医院把孩子接回十几口人挤住的父母亲的两间小平房,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白家。整整半年之中,白亚南躺在一动不动的孩子身边睡不着觉。如磐的夜色里,他痛苦地感受着儿子微弱生命的搏动……时尔思前想后,时尔脑瓜木钝,悔怨惋痛交集,心如绳拧刀绞……加之三伏燥热,房低人稠,如卧蒸笼,真是苦不堪言。

就在这比夺去亲子全部生命还要残酷的现实面前,就在这辗转反侧的溽暑之夜,白亚南做出了自己成年后的重大人生抉择。

6

若干天后,北礼士路的便道上,冒出了个十五平米

的铁棚子。最初的活计是做铁桶,修铁壶,盘炉灶,清烟卤,通下水道。别人不干的活儿他们干。全部人马加白亚南一共七个,都是八道湾胡同的待业后生。

最初合计这件事时,家里人都不赞成,唯独亚南父亲,这位一辈子老实本份的老工人说出句掷地有声的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照你的想法办去吧。”这是一位受了一辈子苦累,挣了几十年低薪,苦哈哈度日终年的中国老工人发自肺腑的感悟和觉醒。

以后,七人“同力”由敲打黑白铁转入水暖安装。他们接的第一件“大活儿”,是给北京大学装暖气。不料没干多久,介绍这个活计的中间人,将白亚南叫到西山背后的一座小院里,关门反锁起他。他们问白亚南:“你懂不懂规矩?”白亚南被问得莫名其妙。“装糊涂是不是?还是真不懂?钱!介绍费!连点意思都没有?!还不懂?告诉你,今个不掏出钱来,你就别想活着从这地方出去,饿也饿死你!”

白亚南眨眨巴眼,暗忖,今天算开了眼界,闹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北京还有黑社会。他想起上衣袋中正好有一张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介绍信,便不慌不忙地说:“既来之则安之。从打进了这门槛,我压根就没想要出去。不过话我还得说到这儿,钱,没有,信有一封,章是公安局的章。分局知道我不见了,一定会派人找,这会儿说不定把院子包围了。”

对方见信是真的,章也不假,闹不清眼前这位是哪路经的,犹豫再三,把他放了。

一顿打免了,活儿,人家也不让干了。一场白忙活,没有挣到钱。

自这件事发生后,那位要介绍费的中间人,就在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散布“同力”的流言。一时间,从街道领导到周围居民,都将白亚南几个视为一班无赖、流氓,无不指指戳戳,白眼相加而后快。

可以想见,对白亚南等几个社会底层平民来说,在当时的北京地面儿上,靠耍手艺挣碗饭,够多么不易!

7

1984年,白亚南结识了当时展览路办事处城建科科长白溪瀛,交谈中产生了共识。自此,“同力”的发展蓝图逐渐成型。白亚南的分析是:北京与外地不同。偏远地区求发展,首先要抓人才、技术、信息,生存空间问题好解决。而北京是全国人才、技术、信息最密集的地方,这几样都不愁。最大的问题是生存空间。随着今后各项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生存空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像“同力”这样既无上级主管单位,又无国家指标的企业。当务之急是先跑马占地,争夺生存空间。在充分拥有生存空间的基础上走第二步棋——人才积蓄。——第三步再搞高技术投资。稳扎稳打,使“同力”获得一个稳固深厚的基础,才能保持住强劲的发展势头。

白亚南的观点是：一旦拥有了充裕的生存空间，就可以吸引接纳我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而那些在这十年间率先倾力于高技术的企业，无形中为我们“同力”培养了人才。

不难看出，白亚南是位经营方面的战略家，他的思路和判断具有切实和超前的特质。

1984年底，白亚南、白溪瀛利用中央单位的资金、指标和北京市旧城改造政策，携手策划实施小区开发。“同力”从中获得一份营业面积，职工搬进了住宅楼。凡进“同力”的科技人员，优先解决住房问题。

老志愿军战士王巨友动情地对白亚南说：“我给公家干了四十年，没尝到住楼房的滋味儿；跟你干了十年，就住上了三居室。”白亚南回答：“我也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有了‘同力’的今天，你我的今天。”

8

白亚南给经理下定义：经理的职责就是找人，找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为这些人才创造一个最大限度发挥才智的环境。

“同力”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拥有了一支能创造高效益的科技队伍。而发展中的“同力”又在不断地吸收着更高层次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投奔到白亚南麾下的，有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工程师、经济师、国营冷冻厂生产副厂长等。

有人问来自南京的杨健工程师：“你为啥丢下老婆孩子，千里迢迢跳到这里来？”杨工回答：“在一个注定踢不赢的球队里，待遇再好也没劲，要踢就要到‘同力’这样的队里来争冠军。”

程工程师感叹：“公司连我儿子女儿的要求困难都解决了。暖人心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摆弄机器本来就是咱的唯一嗜好，我能不拼老命吗？”

为“同力”设计制造出第一套翅片生产设备的退休老工人，受到白亚南的最高礼遇。每个星期天，总经理都驾车登门看望老人。逢老人生日，公司上下都来向他祝寿。白亚南宣布，公司对老人负责到底，养老送终。

总经理给技术人员布置任务时只有一句话：“缺经费，缺人手，缺设备，只管找我。其他的，就只管放手干吧，不用问我。”

这就是“同力”的环境，白亚南的环境。

9

“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正当白亚南和“同力”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方兴的事业的时候，“惊风”、“密雨”却不断袭来。

招谁惹谁了？谁也没招谁也没惹。就因为旧体制下过惯了的人看你是个怪物，总不顺眼。还有一层，被

白溪瀛主任道破：“没钱的时候，谁也不管你，看你挣了钱了，眼就都红了，都要来管你了。”

这是哪家的道理？产权是“同力”全体职工的，领导人是在“同力”创业、发展过程中自己产生的。多少年来，“同力”没有得到过一张国家的订货单，没在享受过一分钱政府投资和银行优惠贷款，它仅仅和你这个基层政权机构有一层简单的挂靠关系，你就要这么整它那么整它。道理何在？法权何在？

1984年，不知因为何事得罪了何人，某治安部门一夜之间从当时只有七十名职工的“同力”抓走了四十人。其中八人受刑，非要审出个白亚南经济犯罪问题来不可。

1987年，“同力”承接通县引进西德4000吨轻钢龙骨气调冷库设备安装工程。西德专家和通县果品公司技术人员现场监督把关。时值三九，七级大风中，二十几米高的钢框，摆幅达两米多。白亚南指挥“同力”安装队高空作业，艰难异常。测试交工后，西德专家挑指赞叹不已。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这边刮起一股风，说是白亚南用金钱贿赂了外国专家和翻译。此风吹进市纪委。从办事处纪委到北京市纪委，层层派人到通县施工现场调查，直问得西德专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一些外人看来接受不了的事，“同力”接受了；在一些外人看来咽不下的气，白亚南咽下了。随着“同力”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西城区政府决定将“同力”划为区属企业。街道办事处党委负责人不干，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同力”把所属招待所小楼白送办事处，另要将三百名一直由街道负责的退休老人甩给“同力”公司，除由“同力”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外，还要报销他们的全部医疗费用，负责养老送终。第一个条件，“同力”拒绝了。第二个条件，白亚南接受了。自此，逃离了办事处，背上了大包袱。本应由办事处发放给三百老人的退休金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落进办事处的钱柜。而“同力”本公司职工的医药费，也不过只报百分之六十。“同力”成了名符其实的冤大头。而二百多“同力”职工，必须加倍流汗，才能挣出被人无理剥夺的那一份财富。

棒打不倒就招安。1986年冬，街道原党委负责人忽发慈心，送给白亚南一份国家下达的副处级干部指标。白亚南看了看，原封送了回去。他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有能力把‘同力’的人都吸收进国家职工队伍，我就填表。否则，我一个人端上铁饭碗，这些人怎么办？‘同力’的凝聚力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在‘同力’再干下去？我白亚南与‘同力’职工是要患难与共一辈子的。”

1989年末，震惊世界的北京风潮平定不久，那位办事处原党委负责人以为时机可乘，在上级机关党委召开的会议上，要求将“同力”退回办事处。当时的上级机关领导人不愿意为一个下属企业与下级政府发生摩擦，居然同意了这一违背“同力”人利益和意愿的要求。有关文件先后打印了三遍。

回到街道的权力阴影下,意味着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所谓合作基金,数额可观的管理费负担,以及料想不到的各种摊派,重新落到“同力”人头上。“同力”职工得到消息群情哗然:我们不想受二茬罪。工人们一致宣布停工。

整整两个月,“同力”人每天按照上班的时间,自动集聚到公司楼下的展厅和厅前的台阶上静坐。

无声无息的两个月。秩序井然的两个月。无言抗争的两个月。

前上级领导人勃然,急传白亚南向其下最后通牒。“同力”公司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不安地等在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白亚南回来了。他表情沉重地对白溪瀛说:“如果我被抓走,就由你来支撑。”随即拿出支票本一张一张撕,将帐上的资金全部转移到各个部门。当晚公司的重要设备,都一车一车运到了兄弟单位。

白亚南说:“‘同力’的设备财产,属于‘同力’全体劳动职工所有,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任何人都无权侵占我们的血汗。”

事件很快被《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知晓了。仗义的主编、记者们,以了解、采访“同力”为口实,齐集到有关机关办公室。原机关负责人一见不妙,就坡下驴,挥手传令:撤销原决定。

一时烟消云散。“同力”公司的车间,重新响起机器的轰鸣。无论在官方或私人的文字里,都没有关于这次罢工事件的记载。而只有“同力”人自己才清楚沦为沉默羔羊的这两个月份,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和损失。

从这些事,使我不能不想到以下问题:在我国,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来自多方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仍然按照旧模式运行的一些基层政府机构。新中国大地上,上上下下层层叠叠的政府官僚机构,何止千万,改革政治,转变政府职能,真是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白亚南感慨道:“干了十二年,挨了十一年整。年年有事,无心过春节。今年才算过上头一个消停舒服的阴历年。一来,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了我们新的解放;二来西城区党委和展览路办事处都换上了年富力强、思想开明的新领导人。新领导给予“同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包括财力上的支持。至于从前的事,我们不把它们看成个人的行为,而将其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谁对谁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是干事,而不是想证明什么。”

10

来到“同力”就可以听到许多关于白西南的故事。囿于版面限制,我无法都展开叙述。只得利用最后一点地方,用电报式语言向读者交差——

很少坐办公室,每天到第一线,没休过星期天。无

论什么活儿,拿起就干。工人们心思,一坐即知。

爱吃红烧肉,喜肥膘,喜食肉皮冻、辣椒。

工作时间,每天多于别人三四小时;每晚读书两小时,雷打不动。

喜穿布板鞋、中山装。夏天一汗衫,不穿背心,省一件。招待外商,曾有不穿袜光脚踏凳而不自知之事。

家中电话,谁人进门都可用,不需招呼,他亦不睬人家。自家香烟谁吸都行,不会让人。港台朋友逾百,国内客户友人不计其数。

近年学会跳交谊舞,学会唱卡拉OK,于业务大有裨益。

“同力”年轻者称其为“大哥”,年长者呼“老大”。

腿、心脏有病,边干边吃药,不去医院,沾点愚昧。

其人曰:我可以“同力”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今天证明是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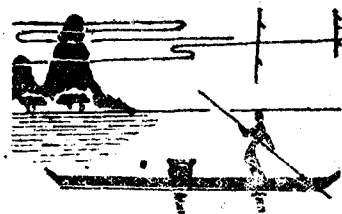
其人曰:我找了一条折磨自己的路,但我的确干得有滋有味儿。

下个结论:是条真正的汉子。

11

对“同力”和白亚南的最后一次采访结束了。车子载我驰向市区。摇下车窗,春三月的风讯,以其富于力度和温情的指掌触抚着我的面颊和心绪。我祝福“同力”,祝福白亚南;祝福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同力”,千千万万个白亚南。

蓦然惊视,驰誉中外的亚运村的庞大建筑群,正扑面而来,那密集挺拔的接天楼群,宛如一排排高桃俏肩、亭亭玉立、款款走来的时装女模,那样自信,高傲,仪态万方。而另外一些更为伟岸的建筑群落,则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巨神。玛勒《“泰坦”交响乐》第一乐章的旋律在我胸间油然回荡。在我内心的视野里,在田野尽头的曦微晨光之中,地母的巨子们纷纷醒来,矗身站立于朝阳之前、天地之间。他们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广袤的地表上,他们沉重有力的足步,给大地以初世的震撼和共鸣,他们将以自己的伟力、勇气和热情,令大地蓬勃而万象昌荣。



公元前207年秦亡（一般史书说前206年秦亡，误。），刘邦与项羽争夺霸权，挥戈相向，逐鹿中原，韩信就是这时涌现出的杰出的军事家。

韩信是淮阴（江苏淮安）人，自幼家贫，“常从人寄食饮”。苦难的生活，砥砺他勤奋好学，尚武知兵，青年时代即显露出军事才能。他曾在项梁和项羽麾下执戈，均不得志。后经萧何举荐，刘邦筑坛拜将，韩信才真正开始了他统帅三军，驰骋沙场的军事生涯。在楚强汉弱的形势下，他奇迹般地败楚兴汉，为刘邦问鼎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封王后他的命运每况愈下，遭贬、受软禁，最后以谋反罪惨遭杀戮。纵观韩信的一生，是可歌、可泣、可悲的，他成为冤魂，是那个时代铸成的大错，而罪魁祸首就是汉高祖刘邦。

一、引发猜忌种下祸根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追击项羽至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原来有约，但韩信、彭越一时忙于处理封地事务，未能会合，结果汉军为楚所败，损失惨重。刘邦收拾残兵败将，顿足大骂韩信失约。后来张良进言，要许给二人更大的封地，刘邦勉强同意了。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有此许诺，韩信、彭越满口答应：“请今进兵”，就是立即进兵固陵，实施对项羽的包围。结果大败项羽，他垓下突围后逃到乌江自杀了。

平心而论，作为秦汉时期的杰出将领韩信、彭越，因屡建战功，萌生论功行赏，讨封地荫护子孙的念头，在当时是十分平常的事情。问题是刘邦气度狭小，认为他们是拆台，从此产生了猜忌之心。

前203年，韩信平齐败楚杀田广等将，遂生封王的念头。不久使人送书给刘邦，陈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齐王。”（《史记·淮阴侯传》）当时齐地的形势十分复杂，韩信之请不无道理。但此时刘邦与项羽正鏖战于荥阳，军队断炊，险况迭生。当韩信的使者送书到刘邦军营后，阅书初怒，继而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史记·淮阴侯传》）从刘邦阅信产生的火药味分析，如韩信在面前，他非拔剑击之不可。面对这种场面，有谋略的张良、陈平趋前“蹶汉王足”，即用足尖踩一下刘邦，意思是让他冷静下来。接着附耳对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韩）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此语十分有份量，刘邦一脸怒气始舒，遂又拍大腿笑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及后遣张良持印，果封韩信为齐王。从《史记》上述记载分析，尽管其中没有“曲笔”，人们还是从刘邦的怒，转为笑骂的感情变化，是迫于形势的决断过程，封异姓王是刘邦本意不愿做的事情。据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信自立为假王》条指出，“韩信自立为假齐王，已种下被杀的祸根。”

二、收留刘邦的宿敌钟离昧

前204年，楚汉争夺关键时期，陈平请刘邦施反间计，使项羽疑其左膀右臂范增、钟离昧等。结果范增被疑，怒而辞官，

古镜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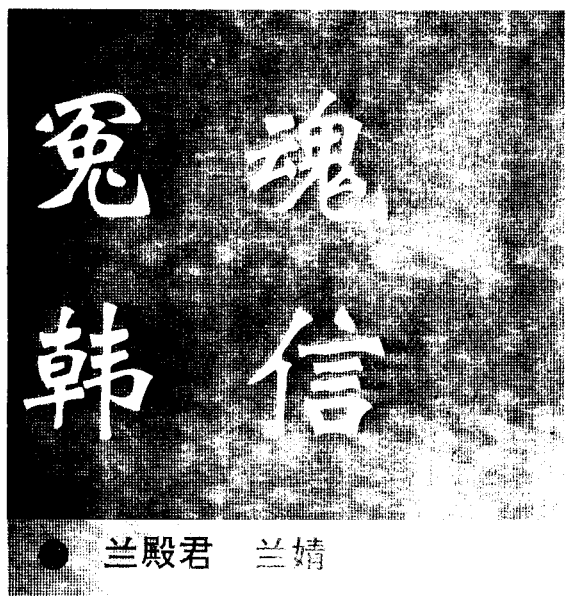
千古说

惟钟离昧指明反间计之破绽，痛陈刘邦劣迹，从此刘邦忌恨此人。

韩信王楚后，作为亡将的钟离昧投靠了韩信，因为早年在项羽的麾下两人有点私交。这事后来被刘邦知道了，他核对消息来源，“闻在楚，诏楚捕之。”看来非要杀了钟氏，才能出口恶气。韩信不知刘、钟有过仇结，从重情谊的考虑，迟迟没有执行逮捕令。这件事可使刘邦动怒了，产生了兴师问罪之念。这时陈平又出主意，请高祖以巡狩会诸侯的方式，在楚境云梦地方聚会。韩信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震惊，预卜吉凶多吉少。这时部下有人怂恿韩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举兵保身。韩信正色斥罢，他“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擒）”。（《史记·淮阴侯传》）从这段记述来看，韩信虽然相信自己清白，没什么罪过。但也担心对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恐惧、矛盾心情溢于言表。当时也有人劝他“斩（钟离）昧谒上，上必喜，无患。”意思是杀了与太祖有仇结的降将钟离昧，定能使对方息怒，有化险为夷之效。那成想钟氏竟拍案陈词：“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刘邦），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接着拔剑自刎了。事态的发展，诚如韩信所料，他虽持钟离昧的首级去迎高祖于陈，高祖竟令武士将韩信捆绑，立即成为阶下囚。到这时，韩信对天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当下已定，我固当烹（烹）”。刘邦则高声宣布：“人告公反！”看来韩信有口难辩，兵权被夺，到洛阳以后又降为淮阴侯。这就是收留了刘邦宿敌的后果。

当时是否立即杀韩信，刘邦多少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开国伊始就杀功臣良将，今后谁还愿出力卖命？暂时不杀韩信（因为秦汉的律制，凡反叛者必处极刑），要有个台阶，所以他说：

韩信是刘邦的亲信将领，于前200年受命守边，赴代为相。与韩信辞别时两人有过接触、晤谈，以后断了联系。到了汉高祖十年（前197年），陈豨反叛，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就在这个时候，韩信的舍人犯法被其囚禁了。舍人的弟弟乐说（一说栾说，或言谢公）“上书变告（韩）信欲反状于吕后。”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诬陷，从时间上看不是巧合。因为此时刘邦刚带兵去平叛，朝中有人即告韩信谋反。退一步讲，告发者竟是韩信禁囚的舍人之弟（可能受人指使），其挟嫌报复的可能性极大。即使他确曾与陈豨有密谋，也不能让此辈知道。他此时处软禁厄运，既无兵权，又无武装，拿什么资本去与陈豨搞里应外合？再说时间上有破绽，刘邦平定陈豨，事在汉十一年（前197年）十月至十一月，而举报韩信“谋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土崩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再从姚氏《汉功臣表》分析，看出有人作手脚陷害人的蛛丝马迹。是书云：“慎阳侯乐说，淮阴（侯）舍人，告信反。”看来告密者平步青云，谋杀了韩信自然换得侯爵，斯人可谓卑鄙至极。



“（信）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吾甚怜之。”（《汉书·高帝纪下》）因为“未习法令”犯法可以免杀，但要软禁起来，甚至派护兵、幕僚去监视韩信的言行。处境如此险恶，他只好“常称病不朝从”——行动谨慎了，但心里有话总要吐一吐，“日望怨，居常怏怏。”有时不免发发牢骚，说几句不满意的话，这恐怕是常理中的事情。

三、挑动陈豨反叛不可思议

陈豨是刘邦的亲信将领，于前200年受命守边，赴代为相。与韩信辞别时两人有过接触、晤谈，以后断了联系。到了汉高祖十年（前197年），陈豨反叛，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就在这个时候，韩信的舍人犯法被其囚禁了。舍人的弟弟乐说（一说栾说，或言谢公）“上书变告（韩）信欲反状于吕后。”看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诬陷，从时间上看不是巧合。因为此时刘邦刚带兵去平叛，朝中有人即告韩信谋反。退一步讲，告发者竟是韩信禁囚的舍人之弟（可能受人指使），其挟嫌报复的可能性极大。即使他确曾与陈豨有密谋，也不能让此辈知道。他此时处软禁厄运，既无兵权，又无武装，拿什么资本去与陈豨搞里应外合？再说时间上有破绽，刘邦平定陈豨，事在汉十一年（前197年）十月至十一月，而举报韩信“谋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土崩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再从姚氏《汉功臣表》分析，看出有人作手脚陷害人的蛛丝马迹。是书云：“慎阳侯乐说，淮阴（侯）舍人，告信反。”看来告密者平步青云，谋杀了韩信自然换得侯爵，斯人可谓卑鄙至极。

后世许多史家还有共识：在公元前203年，韩信平齐败楚

兵势正盛时，项羽曾派策士武涉去游说，恭维韩信，分析时局，诱其叛汉，并以“三分天下而王”为条件，韩信没有动心，大谈刘邦对己的知遇之恩，表示虽“死不易”。如果说在敌国派来的说客面前，韩信有所保留，不肯讲真话，那么，他手下的相士蒯通进言时，他应该吐真言了。当蒯通看透刘邦刻薄少恩，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时，劝说韩信脱离刘邦自立可“大贵”时，他又拒绝了。并以教训的口吻对蒯通说：“食人之食，死人之事，岂可以乡（向）利而背义乎！”此话说在他助汉，汉兴，助楚，楚胜的年月里，而且拥有雄兵，可谓肺腑之言，其忠汉之心昭然若揭！

四、刘邦是杀害韩信等人的元凶

司马迁有“良史”之誉，他在《史记》里述刘邦之丑不用曲笔，写其勇武，善纳谏，言之有物。言刘邦在乡里当亭长时，因贪酒好色，犯过人命案而畏罪潜逃。他脾气躁，喜欢骂人，能当众抓起儒冠来撒尿以表示对知识分子的轻蔑。项羽抓了他的父亲，威吓他如不投降就要煮而食之。刘邦回话：“我爹即你父，煮了请分我一碗汤喝！”有一次，项羽追着他，他为了逃得快，居然能把亲生的女儿和儿子从飞奔的车上推下去，只顾自己逃命。从这些记述中，暴露了刘邦暴躁、不尊重人才、自私等人品上劣根性的一面。这怕是他当上皇帝，容不得异己，杀戮开国功臣的思想原因。

韩信被诱捕之后，吕后等不责成有司审讯，不公布反状，匆忙地将韩信处死于长乐宫钟室。宫中悬钟之室，岂是刑场？这无异于暗杀。韩信冤死后，民间有句成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确，萧何对韩信有举荐之恩，他也参与吕后的阴谋活动。是他将韩信骗入长乐宫的，但此时萧何也受到刘邦的怀疑，处境不妙。如果他的态度犹豫，就有受株连的危险（事实上萧何也得冤狱，是刘邦赦免了他）。结果萧何后来从丞相升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

当刘邦平陈豨回朝后，“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汉书》作“且喜且哀之”，这段文字，表达了刘邦的心理变化，所“喜”者，心头最怕篡权、谋反的大将除掉也；所“哀”，所“怜”者，盖开国功臣无大过受戮也！因为他本人并不认为韩信真的要谋反，否则早下决心除之了。

吕后平时吹过“枕边风”，她知道刘邦欲置韩信于死地，但还下不了手的矛盾心理。因此刘邦外出用兵，她又接到了告密信，当然要对韩信下毒手了，并夷其三族。

刘邦是杀害韩信的主指人，从汉初异姓王的悲剧亦可看出线索。汉初所封的异姓王除赵王张耳军功一般外，其余人都是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结果，以“谋反”为借口杀掉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刘邦的女婿，因其部下有人反高祖）；被刘邦无端猜忌，逼迫致反的有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只有势力微弱、胆小如鼠的长沙王吴芮得以善终。这就使人理出个眉目，大凡功高震主的将领，如韩信辈，统军可“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这类人杰，不管你反叛也好，不反叛也要把你挤到绝路去，然后捕之，杀之，以除掉争夺皇位的隐患。所以汉初开国功臣的命运都是以悲剧告终的。

我所认识的 驻外记者

●石英

每当我出国访问,在外短期逗留期间总有一种矛盾心情:一方面希望多看看,多感受一些,另一方面又希望早回归,巴望着时间快点过去。前者是出于开阔眼界、积累创作素材的需要,后者是由于饮食上的不习惯和心理上的不适应。

与之同时,我也接触到一些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他们中许多人则与我不同,虽也人生地不熟,却工作生活得很踏实,不焦不躁,随遇而安,适应性很强;对照我自己,我不能不佩服他们,而且也因自身的心理弱点而由衷愧疚。

1986年深秋,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参加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会中结识了新华社驻首席记者孙大姐。她自年轻时同爱人长驻苏联莫斯科。她爱人在“文革”中去世后,她又往返于前苏联与东欧之间。至今她年过半百,精神状态仍不逊于青年,工作起来极为干练。还没等我们代表团回到国内,她所报道大会的文稿已在《参考消息》上刊载出来。

她们的工作室兼卧室就在我驻保大使馆的后身,一座近百年的旧楼,使我们踏着木质楼梯上去时摇摇晃晃颇有几分心颤。她们一“家”三口——就像母亲和儿子儿媳一般亲密。两位年轻的男女记者对她非常尊重,她每每抬起戴着花镜的眼睛慈祥地望着她的同事。这时刻,年轻的男记者因为开车不小心碰伤了手,孙大姐悉心地为她敷药包扎。与此同时,男记者的爱人正在缝纫机前,为“家长”缝合一件开了线的衣服。这个和谐温馨的“家庭”,使我们在场的人无不受到深深的感染。我问大姐什么时候回去?她笑说:“恐怕要干到退休了”。临别时,她托我给她在国内的女儿带去一个包裹。说实在话,我走路连自己也不爱多带东西的,但对这位大姐,对这个特殊的“家庭”,我极乐于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虽然,我不能够也没有资格做这个“家庭”的成员。

1991年,又是深秋,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结识了在这里工作的章君。他离开北京已经三年了,开始是他一个人“创业”,随后他老伴也去和他在一起。五十多岁的年纪,堪称是相依为命。两个孩子都在北京,而他俩身边只有电脑打字机、传真机和两部用途不同的电话,还有隔着短墙听那邻居的一群吉普赛孩子的打逗和笑语。偶而他也用罗语和他们戏谑几句,掐几朵偏偏开在他这一边的牵牛花掷过墙去。吉普赛孩子们高兴回一声“伯伯!”是不大清晰的汉语。

“是你教给他们的?”我问。

“我和我老伴。”

“你真可以。”我赞赏地说。

“怎么办呢?只能如此。”老章耸耸肩儿,“也有摆弄不了的,譬如说这辆汽车。”他手抚着停放在小院里新买的“奔驰”250。

我知道,这种车在此地购买价钱远较国内便宜,才5000美元。但利用率很低。尽管他夫妻俩都学着开车,却至今不太敢在闹市大街上驰驱,只能慢腾腾地“磨蹭”。有一次,我和同行者小王要去驻罗使馆办事,老章似开玩笑又似认真地说:“如果不惜命的话,我就开车送你们去”。小王半信半疑:“有那么严重吗?……”老章的夫人倒比较果断:“试试看吧”。结果由老章驾车,夫人观察指挥,车子开至大街,一溜歪斜,有些乱了方寸,不时受到交通警察的干预,而且前前后后的车辆也向它发出警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万幸的是,竟没有出事儿,使馆里同志诙谐地说:“算你们命大”。

虽然有这次冒险,但仍不妨碍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当我流露出在这里饮食不习惯时,章夫人热情主动地专为我们做了“庄户”家常饭:小米粥、蒸白薯和炸酱面,使我吃了几天来最饱最可口的一顿饭。饭后,还专门安排我们午休,而不管我们能否睡着。这时,老章却抓紧时间开始工作。他回到工作室,打开传真机,将昨晚写好的一份新闻稿传回国内。他的夫人烧好了茶,端着茶盘送至丈夫面前。因为屋里铺着高级地毯,她脱下

皮鞋，换上拖鞋，轻手轻脚地，唯恐打扰了丈夫的工作和客人休息……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一种特殊的生活。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富裕而又清贫之家，一种颇有意义而又单调的生活。我在赞赏之余，又潜声问我自己：假如是你，会怎么样呢？……

带着这个未了的问号，92年深秋我又去英国访问——又是深秋，难得如此巧合！

在伦敦，我们作家访问团与我驻使馆文化处有较多的接触。这里的十几个同志组成了一个“家”，自居独院，清静而稍感幽闭。我注意到，他们这里凡国内有的电视剧录像带或流行歌曲磁带几乎俱全。除了工作，这可能就是他们主要的文化生活了。我感觉得到，对于来自国内文化代表团的接待，他们不仅不视为一种负担，反而好像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机遇。

我因有双重身份（既是作家代表团成员又是报社工作人员），所以在这里自然又结识了本报驻伦敦的记者秦君。他原先在这里也是两口之家，后来因为要照料孩子考大学，夫人先行回国工作，现时他在这里是一口之家。我当头又问了他一句极不得体的话：

“适应吗？”

“时间一长，也只好适应了”。

但我也感觉得到：他见到从祖国来的访问者，尤其是同行，也如同见到了亲人，执意要我到他的家里“坐坐”。尽管我在这儿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但主人那种热诚劲儿，使你实在无法推却。

秦君却不似前述的章君夫妇，他的车开得很好。据说在英国，能拿到本子的条件是较高的，但他来这里三个月后就考试合格。他的英语，在我听起来也是够

水平的。原来他在大学里就是个高材生，毕业后曾随两任国家领导人访问过欧陆多国，是经受锻炼的。

他把车锁上，就放在公寓楼下的街道一侧。我问：“安全吗？”他哂笑说：“反正是都放在这里，谁的被偷，那就凭运气了。”

他租了这幢公寓楼第四层的一个单元，有三道门：院门、楼门和房门，都有锁。单元房很宽敞：一间会客室、一间卧室、一间工作室，还有厨房、卫生间和厕所，可说是设备齐全。但在我这个“不适应者”觉得：仍然冷清得很。

他为了招待我，显然预作了准备，端上花生米、腰果还有类似我国白兰瓜那样的半个瓜。这一半瓜，就花了六英镑（相当于五十多元人民币）。他说他还要为我“烧几个菜”。一会儿，厨房里便响起爆炒声。

我走进他的工作间，显得比较乱，只有过期的《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和不过期的英文《泰晤士报》等，不规则地摆在地上。我想这就是他对话的伙伴了。他的工作室，比起前述的章君就不那么整齐了，我想，这还是因为缺少一个内助的缘故吧？

饭后，他与我走出这个一口之家，依次锁上三道门，驱车行进在深秋空旷的伦敦大街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呢？”“看来，又得明年了。”

从他的声情中，我似觉得此刻他眼前浮现出的远在国内的妻儿的影象。不知怎么，我的心底又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至此，我那个问号大体可以勾销了。对比他们，大家庭还是小家庭，以及这些不同的“家”的成员，我都自愧弗如。这是一种意志力和适应力的差距，我承认。

〔责任编辑：穆图〕

炎黄文化简讯

崇敬始祖 奉献爱心

海内外炎黄子孙为整修黄帝陵捐资

经国家批准，整修黄帝陵工程自1992年秋开工以来，海内外炎黄子孙关心工程进展，踊跃为黄帝陵捐资。

陕西省15个单位，发出《为整修黄帝陵捐资倡议书》，号召3400万三秦儿女行动起来：崇敬始祖，修吾黄陵，捐钱捐物，奉献爱心。曾积极参与整修黄帝陵规划设计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师生，万人签名，表达他们敬祖兴邦的拳拳爱国之心。在捐资中，陕西省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走在前面。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资50万元；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捐资25万元；捐资20万的有宝鸡卷烟厂、西凤酒厂、西安仪表厂、陕西耀县水泥厂；捐资10万元的有西安止园饭店、延安卷烟厂、兴平化肥厂、延安地区煤炭出口经销公司、省散装水泥办公室、延安炼油厂、陕西龙门钢铁总厂、略阳钢厂、西安钢厂、铜川铝厂等。

来自外省市的捐助，也不断寄往黄帝陵基金会。其中有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小学学生、四川省平武县水晶中学学生李昌林、李晓玉，捐出的零花钱，也有福建省惠安石雕厂等单位数十万元的大宗捐款。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积极支持整修黄帝陵的更不乏其人。香港必丽洋行董事长叶嘉星、周绮云夫妇，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陈廷华先生、香港嘉里贸易有限公司郭鹤韬先生，捐资额均在人民币十万元以上。

依稀别梦几经年

长风丽日，碧海蓝天。

厦门鼓浪屿凌空峻立日光岩上，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伫立于峰巅，凭栏远眺着烟波浩渺的东海……

他，就是我国台籍著名画家、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黄正襄先生。

蓝色的大海唤起黄老不尽的乡思——这乡思是恬淡的，却又像海水一样带着苦涩的味道。

乡思，乡情，他的故乡就在海的那边。

大海是深情的，黄老一生对大海亦倾注了无限的感情。然而，46年前当他离别台湾到大陆来求学时，怎会想到这蓝色的大海竟把他与故乡隔断了近乎半个世纪呢？！

46年，人生漫长的旅程。在这漫漫的且又坎坷的旅程中，黄老时时忆起故乡淡水港那秀美的山山水水——三面环水，四季渔歌，椰林丛中掩映着蝴蝶漫舞，海燕飞翔，晨时一片汪洋中渔船出海，白帆点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日月潭湖水蜿蜒，形如日月，蕉林椰树衬着文武庙的红墙黄瓦，构成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

故乡的山水如诗如画，全然是一片充盈着艺术氛围、编织着五彩梦幻的世界。在这片美丽迷人的世界里，黄老一出世似乎就已决定了他将要献身于绘画艺术了。他父亲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祖父黄玉柱更是名载《中国画家大辞典》的清末著名画家。生活在这样一个难得的艺术世家中，自然使黄老一开始便潜移默化地受到独特的艺术熏陶。他凭着一股敏锐的好奇心和灼热的求知欲，从少年时代起，就拼命吮吸着民族绘画艺术的乳汁。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吮笔挥毫，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在几尺素宣上生起一片腕底的烟云，描绘出故乡瑰丽秀美的山山水水……

十年浩劫人未老

黄老于40年代随父亲到大陆来求学。到北京后，他经国画大师齐白石介绍，先在著名山水画家胡佩衡大师门下磕头拜师，由《芥子园画传》和老师自编的《山水入门》开始练习临摹，从逸笔草草的写意到一丝不苟的工笔，他都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偶得老师范作，更是视为至宝，珍存至今。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次，黄老与大侄黄均（现为著名画家）到中南海流水音画家刘凌沧家中去玩。他看到刘先生的写生画透视准确，景物逼真，心里顿受触动，想起老师曾讲过“外师造化，中发心源”的教诲，于是遂决心到当时的北平艺专重新学起。

“天道酬勤，不负苦心”。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黄老的绘画技艺日有所进，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作品不仅在大型报刊上连续发表，并出版了多册画作，还被应聘到师范大学、军政大学任教，当时真可谓前程似锦，功成名就。

可是“文革”开始不久，一幅《娄山关》给黄老突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画中的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屹立在山顶上，背景是落日衔山，一片红霞，题字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此画竟被认为是诬蔑“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被评为黑画，纳入批判展览。黄老也因此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旋即下放农村接受监督改造。

台籍画家黄正襄素描

蔡志翔

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面对着使人压抑、困惑的不测风云，黄老并未消沉，更没有失却希望。他于危难中想起了齐白石大师当年的教导，“夫画之道，乃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作画……”于是他决然振作起精神，把下放劳动当作体验农村生活的难得机会。他不仅在看瓜楼上画画，在看场院的山屋里画画，即使地震时躲在床底下依然坚持画画。田间打歌时，他便静心研究和揣摩周围景物的透视与阴晴色彩的变化规律，试图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领悟大自然隐秀的神韵，力求达到为任何一个艺术家毕生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境界。

就这样，黄老在农村沉寂了十几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领悟、耕耘了十几年，不仅在国画艺术上有了颇深的造诣，且在“界画”创作上兼蓄仇英、二袁古法，并融汇自己的水彩画技加以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对于黄老来说，在那段容易使人彷徨、荒废、沉沦的岁月里，也算是大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犹希梦笔再生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老迎来了艺术的春天。他曾欣然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喜悦之情：

昔年西渡爱京华，文彩丹青枉自夸；
浩劫十年人未老，犹希梦笔再生花。

半个世纪来，黄老遍溯古今，潜心研习，所作山水画力求立意新奇，追寻神韵。他认为，作为一个画家，必须具有再现物象生命的能力。所谓“意在笔先”即是笔墨之下不仅是自然造化的画面反映，而是要使客观事物成为艺术家情绪驾驭的符号，“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当然，要达到一种极高的境界，则必须得益于画家对外物精神的深刻体悟，才能打通物、我之分，做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春。”这样画家以笔墨抒写的，便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内在生机，也是他胸中所蕴蓄的情感；观画者通过画面形象领悟到的则是事物的精韵，也是艺术家的情怀。

黄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始终蕴藉着浓烈的审美情感，不仅以求将自然万物中深藏的奥秘揭示于画面，而且饱含激情地把心底流淌的情感融入笔端。

这些年来，黄老怀着浓烈的乡土之爱，骨肉之情，把对故乡的如海深情寄意丹青，创作了大量以台湾风光为主题的山水画。无论是在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瞭望山》、毛主席纪念堂展出的《半屏山》，还是在台盟总部悬挂的《日月潭》、中南海收藏的《姊妹亭》等大幅山水画，都以其姿肆又雅逸的技法，浓丽又淡素色彩，使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这些画卷气派宏大，云山耸峙，烟雨迷濛，画面变化奇诡，笔墨酣畅淋漓，给人神思，撩人遐想，把画家思故乡、盼统一的思想情感充分表达了出来。

在创作风格上，黄老既继承了民族绘画的特色，又积极吸收西画方法，使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明暗色调和线描力度相融汇，使其画风既有古典画法的浓淡干湿、抑扬顿挫，又有透视虚实、色彩斑斓的效果。如中南海收藏的一幅《姊妹亭》，黄老即采用了传统的俯视章法，近景处又以浓墨染水，不仅衬出两亭的明色，还反衬着赭石染成的清澈潭水及洒着光斑的苔藓，似伦勃朗在《载钢盔的人》一画中用阴影营造出的那种明暗对比互相衬托的艺术氛围。此外，黄老的绘画作品始终坚持“诗、书、画、印”的统一。他性格豪爽、治学严谨，古诗词造诣颇深，每逢用笔作画之先，祖国瑰丽无比的山河便顿然化作一片诗情，随之在黄老心中舒展成一幅色彩迥异的画卷，然后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忘我境界中欣然洒墨，淋漓尽致，一气呵成。

台湾国画大师黄君璧先生生前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黄老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传统风格，又有和谐的西方油画色彩，诗、书、画、印俱佳，代表着未来中国画发展的方向。”香港《文汇报》亦称：“黄正襄先生是继黄宾虹、李可染之后，又一山水画大师。”

可以预见，黄老独树一帜的画风必将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唤来游子叙乡情

作为一位台籍著名画家，黄老对故乡自然有着不尽的眷恋之情。“苍头发华，故山归计何时决？”黄老只能挥毫泼墨，以山造势，以水行韵，注入自己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1988年3月3日，在周总理诞辰90周年之际，黄老应中央办公厅之邀，与吴作人、启功、赵朴初、董寿平等29位著名书画家在人大大会堂作画。黄老即兴作丈二巨幅台湾名胜半屏山，并赋诗一首。当时政协主席邓颖超看后十分赞赏，知道他是台籍画家，握着他的手说道：“特别欢迎你。”

黄老事后感到自己作为炎黄子孙，身为台胞一员，更应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于是，在那年6月份，黄老同台属书画家王遐举、黄均，及著名书画家溥杰、胡絮青、孙菊生等聚会一堂。在这次聚会上，黄老谈到近来台湾书画家不断有人来大陆探亲访友，交流技艺。海峡两岸书画同源，何不发起成立一个书画艺术群众团体，以接待来大陆的台湾书画界同仁，与他们同书笔墨，共著丹青，共同为弘扬中华传统艺术，融合两岸文化尽一分心力。黄老的提议，受到其他书画家们一致赞同。著名书画家启功、董寿平、潘絮滋、任率英等闻讯，即欣然相允，远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侯北人、唐向明先生听到消息后，也专门来函要求入会。

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成立后，黄老虽然已担任了中国书画研究会顾问、齐白石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等职，仍然为联谊会的工作四处奔走。他认为，联谊会会是海峡两岸书画家交流技艺、慰藉亲情的一条重要渠道，自己是名台胞，既结识一批台湾书画家，又熟悉大陆书画家，因此，理应多做些事情。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会在沟通两岸艺术界的交流，融合两岸民众的亲情，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是大有作用的。

是的，中华民族是个喜好艺术的民族。中国的绘画与书法源远流长。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风俗，在两岸书画家的作品里，处处可见民族文化的根。两岸的书画家有着共同的审美旨趣，共同的精神。丹青结连理，笔墨慰亲情。心灵的感应，艺术的共识，是时空不能隔断的，两岸书画界的情谊如黄老倡导的联谊会之初衷一样必将会日趋炽烈。

但是，尽管黄老的绘画作品早已越过海峡进入台湾绘画市场，纷纷被海外人士收藏，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如最近我国政府赠送给金日成主席的黄老的山水画《梦笔生花》），黄老却至今未能回到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故乡。他多么想重返台湾，以慰相思，亲眼目睹日月潭、阿里山的秀姿，描绘故乡的山水水啊！

为此，黄老是感触不已的。他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台湾画家江明贤所作的一幅《淡水港》山水画前伫立良久，百感交集。

江先生叹了口气对黄老说道：“我多年来到过许多国家，可惜作为中国人却没能画到天安门的雄姿。”

黄老则愈发伤感地说道：“我是台北淡水人，却一直不能回淡水故乡作画！”

交谈之余，黄老怅然赋诗一首：

久伫江君绢素前，依稀别梦几经年；
何当共取辋川笔，绘我海天月正圆！

黄老是多么盼望着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呀！

外国监

狱里的中国女犯



从驻外使馆回国之后，有一次同一位好友聊天儿，她说她非常羡慕我们做领事官员的那种风光：享受着外交特权，衣冠楚楚，驾驶着高级轿车，频频出入于外国的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交场合……，并问我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我说，最不开心的事就是去探监，去拘留所或监狱探视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被外国警方或移民部门拘禁起来的我们的同胞。

我的朋友似有不解，于是我找出日记本，给她读了两篇我当时的探监手记……

手记之一

她因出卖肉体而被投进监狱，
我抗议警方对她的虐待

一大早，警察局治安行动处的西蒙森探长就打电话过来，说是有一位被人们称为“蝴蝶”的中国姑娘，因从事有伤风化的活动而被他们拘留，现关押在中央

警察局第一训化所，特向中国大使馆通报。

在进一步确认了这位姑娘确实是中国国籍之后，我决定前往训化所探望她。

我驱车驶出首都K市市区，沿着海边的曼德姆高速公路向东南方向疾驶。这是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道路。路面宽阔而整洁，道路两旁那一排排棕榈树高大挺拔，宽实的叶子在热带海风中轻轻摇曳。举目望去，前方天海一色，涌动的海水伴着微微颤抖的空气，清澈之中透着晶莹的湛蓝。以往的时候，每当我驶上这条公路，心中都不由得要唤起一阵如入诗画般的醉意和陶然。而今天却不同，我毫无兴致来欣赏这片风光景色。那牢牢地抓住我的视线的，是公路之下弧形海岸线尽头那个象剑一样插入大海的半岛，它迷迷朦朦，显得挺神秘的。

那里就是第一训化所的所在地，当地人称它为“大蓬车”，因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在同西班牙人争夺这块殖民地的战争中，曾用土著人的大蓬车在这个半岛上囚禁过俘获的西班牙军官而得名，后来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监狱，70年代以后又改成了专门关押吸毒者、妓女、和未成年的罪犯的训化所。

十几分钟后，我驶下高速公路，眼前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在它们中间，一条两三米宽的柏油小路蜿蜒前

伸，一直通至一道在这个花园般的国度里难得见到的高墙。墙是灰色的，上面有几道铁丝网，旁边有一扇黑色的铁门。一个头戴钢盔的哨兵走上来，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进入岗亭打了个电话，然后走出来，吃力地推开那道沉重的铁门，指着里面一幢红砖小楼对我说：“请吧，先生，西蒙森探长正在等您。”

在小楼门口，一位面无表情的狱警为我拉开门，并引着我顺着昏昏暗暗的楼梯爬上二楼。在楼梯口摆着一张桌子，一位同样表情严肃的女狱警懒洋洋地坐在那里。她看过我的外交官证，然后按下桌上的对讲机，通知西蒙森探长我来了。

西蒙森，这个家伙！使团里面都习惯于称他为“Black Bear”（黑熊），是个高高壮壮的黑人大汉，挺胖，圆圆的脸油黑闪亮，就象钢浇铁铸出来的，带着明显的黑非血统的特征；一双鼓鼓的眼睛象鹰隼似的，永远都蒙着一层极具职业特征的机敏、深沉和骄矜。

记不清我们打过多少次交道了，不过在这个训化所里见面，这还是第一次。

“噢，我的朋友，很高兴见到您。我知道，您又会说并不希望见到我，……”他伸过那只黑黑胖胖的手。

我们寒暄几句之后，在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坐下，他取出一个卷宗递到我的面前，里面有一本中国护照和一些其他证件。我翻开护照查验了里面的内容：

姓名：李玉芬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68年4月7日

籍贯：广东

护照号码：……

发照机关：广东省公安厅

发照日期：1989年1月10日

罗湖边防出境章：1989年10月23日

……

我又翻到她的照片，并仔细地端详了一下。

这是一张很秀气的脸，甜甜的微笑之中，隐含着几分略显稚气的得意和自信，眼睛很大，亮晶晶的透着一股灵气，让人感受到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温雅和清纯。从她的整个神情当中，我感受到一种春天般的勃勃生机在那里涌动，那是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女子对这个世界和未来生活的美妙幻想和理解，无忧无虑，除了那与现实生活不甚和谐的臆想和梦幻，没有丝毫的阴郁和斑痕。对这种神情我太熟悉了，几年来我从那些新移民出来的同胞的脸上看到了太多太多。因为出了国，所以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每一颗怦然而动的心中，都洋溢着难以自制和摒弃的骄矜与自得，大家像是涌进了伊甸园，生活的地平线上永远浮动着迷人的曙光……

我保持着神情的凝重，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这样。但我的心中却很沉闷，一种痛楚的情感在那里骚

动、翻滚。

西蒙森探长开始向我介绍情况。他语句缓慢，声音像带有一个共鸣箱似的，浑厚而低沉：

“这位小姐叫李玉芬，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个发音是否正确，当然这无关紧要。别人都叫她‘蝴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她很漂亮，并且记这个单词比记她的名字要容易的多。我们是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注意她的。那时候她整日泡在 Makao 酒吧里，并从事出卖她身体的活动。先生您是知道的，我们国家是严令禁止此类活动的，我们是个小国，只有几百万人口，我们的政府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公民被爱滋病或梅毒之类的东西毁掉。我们曾向她发出过警告，遗憾的是她并没有介意，所以，我们只好对她采取行动。在我们将她收入‘大蓬车’之后，由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非常不幸的是她确实染有性方面的疾病，很危险。”

他说着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翻开来瞥一眼，然后递到我的面前。

这里面是一份医生的体检报告，我细细地看了看，浑身掠过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他说罢，将身体向上挺了挺，然后仰靠到转椅背上，圆鼓鼓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

“按照你们的作法，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呢？”我问道，尽管心头已相当沉重，但我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和神态保持着平静自若。

西蒙森探长微微耸了一下宽厚的双肩，说：“这要看她在同那些男子们交往之前，是否清楚自己已患有这种可以致人于死地的传染性疾病。如果她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那么她很有可能会以故意伤害罪而受到起诉。是的，这看上去似乎不太公平，因为那些好色的男人是自己找上门儿来的。但法律，您知道的，法律有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有什么办法，除非你敬而远之，不要去触犯它。”

我稍稍思索了一下，希望西蒙森探长能向我提供一份有关此案的文字材料，他同意了。然后我提出要会见李玉芬。

从小楼里出来，西蒙森带着我拐了一个弯儿，绕到小楼背后，面前有一栋四层大楼，穿过铁门进到楼里，迎面是一股阴森森的凉气。我们沿着走廊往前走，时不时要停下来等着狱警打开那一扇扇把走廊隔成了几段的铁栅栏门。走廊的两旁是一间间牢房，每间有十几平米，当我们从牢门前经过时，犯人们便扒着栏杆冲我们乱喊乱叫，还有的直呼西蒙森的名字。西蒙森说这些人都是跟吸毒有关的案犯。

女囚都关在二楼。一走到这里就感到气氛与别处不同，各种肤色的女人，有哭的，有唱的，乱乱哄哄。看到我们之后，她们显得特别兴奋，有的做着媚态向我们飞吻，还有的声嘶力竭地呼喊一些污言秽语。西蒙

森似乎仍在绷着脸，但却使人能够感到在那黑黑的皮肤下面，隐含着一种得意和微笑。

会见室在楼道的最北端，是个二十来平米大小的房间。屋子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左边放着三把带靠背的椅子，是供来会见的人坐的，右边是一张小方凳。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拷着手铐、警棍的黑人女狱警叉着双腿，木头人一样直挺挺地跪在铁门旁边。整个房间里笼罩着一层阴森森的压抑气氛。

我在桌前坐下，西蒙森派人去带人。

李玉芬是一步一步地挪着进来的，她很瘦，穿着一身又肥又大的灰色囚衣，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一双迷迷瞪瞪的眼睛里含着泪花，象受惊的小鸟一样左右顾盼着。这同她护照上的那张照片判若两人。

作为一名领事官员，每当我在此种场景下见到自己的同胞时，心中都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那是一种痛楚，一阵激情，一股酸涩涩的潜流在心灵深处的交织和涌动。我常常是在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无声的呐喊：同胞，我们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样的所在相逢呢？！

我请她在对面坐下，告诉她我是中国大使馆的，是来了解有关她被拘留的情况，并给她以必要的帮助。

她愣愣地盯了我几秒钟，像是猛然从一个迷梦中醒来似的，突然隔着桌子拽住我的手，呜咽着说：

我想请李玉芬谈一谈她被拘捕的原因和经过，以便同西蒙森所讲的情况相核实。而她却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似的，只顾呜咽着向我诉说她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

“犯人她们打我，握我，不让我去厕所，我一说想撒尿，她们就把我按到地上，用脚踩我的肚子，看我尿裤子，她们笑……看守们每天好几次逼我脱了裤子，说是检查我有没有往身子里面藏毒品，还……还用警棍使劲儿往我下身戳……”

在我以往的经历中，也曾遇到过被拘押的同胞在狱中遭受虐待的情况，但却没有这么残忍。我感到怒火在心中升腾，我几乎是用了自己全部的理智，才使自己保持住了冷静。我把她所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我要向西蒙森提出强烈抗议，我不能容忍对我同胞的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即使她触犯了法律。

在我的一再安慰下，她终于停止了呜咽，苦苦地望着我，开始向我讲述在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厄运从此开始了……

象 80 年代大多数的青年人一样，李玉芬也有一个出国梦。

那时候，她在一家饭店里做餐厅服务员，虽说每月



同西蒙森探长在一起

“您救救我吧，我受不了，我要死了……”

跪在门边的那个女狱警像机器人似的冲过来，一把将她拉回到木凳上。女狱警这个粗鲁的动作使我非常恼火，我强按着心头的激动，用平稳而严肃的口气向一旁的西蒙森探长提出抗议，并告诉他我需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同李小姐单独谈谈。

西蒙森显得有些尴尬，耸了耸肩，同那个女狱警一前一后走了出去。

能拿六七百元的工资，同其他职业的同龄人相比已是相当不错了，但她却并不满足。每天上班，看着那些大吃大喝的老外、华侨，她心理上难以平衡，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如果就这样活一辈子实在太冤。她梦想着出国，去过一过那天堂般的生活。

后来她通过一个朋友搭线，花钱买了“经济担保”及 Y 国的入境许可证，并以此申领了护照，独自一人来到了 Y 国。

当她面对这个曾让她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那个玫瑰色的梦幻同现实生活的距离是太遥远了。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只好到一家中国餐馆里打工为生。

餐馆的工人到晚上关店门之后就都回家了，只有三个大厨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做早茶，只好就住在餐馆里。李玉芬没有家，老板照顾，便同意她也住在餐馆。

三个大厨有两个是香港的，另一个来自大陆。开始的时候，李玉芬一下班就跑回宿舍，一是同大家还不太熟，没多少话好说，二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想抓紧时间休息。后来大家混熟了，每天晚上上下工之后，厨师们便拉她一起打麻将，或者弄几个好菜，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侃侃山。

有一天晚上，一个厨师弄来瓶好酒，又备了些小菜，大家坐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聊。李玉芬本来是不沾酒的，不过这天晚上大家各自谈起家乡和亲人，李玉芬也动了思念之情，想想自己孤零零跑到异国他乡吃苦受罪，阵阵忧愁顿时涌上心头。于是便也斟了满满一杯，借酒消愁。酒一进肚，她就感到头晕目眩，不觉之中就沉沉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等她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竟是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而那三位厨师也同样光着身子，正歪歪斜斜地挤在桌子那里互相灌酒……

她猛然醒悟刚刚发生了什么，爬起来飞奔回宿舍。她痛哭了一夜。

对于那许许多多的新移民来说（尤其是在中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小国家里），婚姻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性饥渴现象，常常使他们感到困扰、忧郁和痛苦。我曾从不少朋友嘴里听到过对这一问题的抱怨和感叹。虽然现在的情况是女孩子在新移民中占多数，并且已有过剩的趋势，但对于那些两手空空的打工仔来说，要想找一个女朋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几乎每一个女子都打定主意出国之后要嫁一个有钱的老板，用



▲同牙买加警察合影

大家的话说就是“钩个金龟婿”，没有谁愿意找一个“穷光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年纪很大的老板娶了如花似玉的小媳妇，而另外呢，许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却连女朋友也找不到。由此而来，因性饥渴而引发的犯罪以及心理变态就越来越多……

发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李玉芬痛苦中这样宽慰着自己，在厨师们那恶狠狠饱含恐吓的目光中，吞下了那颗苦果。而在厨师们看来，她的沉默无异于是种软弱，甚至是对他们行为的默许。

他们开始向她频频进攻，一次、二次、三次……。当此事最终让老板知道了以后，她被解雇了。

后来她就到了 Makao 酒吧当女招待。酒吧的老板是个阿根廷人，他诱使她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她是在一个深夜被逮捕的。那天晚上她陪一个黑人小伙子喝酒，过了半夜的时候，她邀他到房间里过夜，她没想到这小伙子是便衣警察，并且是专门来此监视她的。进到房间之后，她脱去外衣，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就在这时候，他亮出了自己的证件，而与此同时又有两个西服革履的警察走进来，待她穿好衣服之后，把她带上了警车。

……

▲牙买加大兵

听完她的叙述，尽管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并在内心里同情她最初的遭遇，但我还是语气严厉地教训了她。做为一名领事官员，我的职



责不仅仅是要保护我国公民的安全，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教育他们，遵守侨居国的法律、法规，做一个安分守法的人。

她默默地听着，时时点点头，那已被泪水淹肿了的眼睛里，流露着阵阵悲哀。

“您说他们会判我刑吗？”她声音沙哑着，微微有点打颤。

我告诉她，我会尽力去同有关当局交涉，争取从轻处罚，如果上法庭，我可以代她找律师。

不知是对上法庭的恐惧，还是感激我刚才的一番话，她又低低地抽泣起来。

从训化所出来，我沐浴在赤热的阳光里，浑身上下暖烘烘的。而当我回首那黑色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的时候，却怎么也排遣不掉那笼罩在心头的重重寒意……

**正要开庭的时候，一个电话
打来，说法庭里安了炸弹，
人们慌忙逃窜了**

今天是李玉芬的案子开庭审理的日子。

早上我分别同华人律师 Peter Lee 和西蒙森探长通了电话，问一问他们有没有没什么新的情况，俩人都回答一切按常规进行。

我驱车来到法院，法庭设在一座像哥特式教堂似的古老建筑里，据说这里曾是该地区第一位黑人百万富翁的庄园，当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巡幸大英帝国的这块飞地时，曾在此下榻；那红色的砖墙虽然已布满岁月蛀噬的斑痕，但却一直被当地人视为正义和权力的象征。

按计划应当是 10 点整开庭，但因为里面正在审理的交通违章案子没有结束，我只好坐在大厅外面的走廊里等候。这里的法官们永远是这么忙，似乎是连狗咬架之类的事情也要拿到他们面前来裁决。

这时候西蒙森探长来了，他今天没有穿西装，换了一身笔挺的制服。他告诉我李玉芬已经带来了，在院里的囚车里。离开庭恐怕还早，我想去看看她，便同西蒙森一起来到院子里。

囚车停在靠院墙的地方，有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四周，一些当地人好奇地围在一旁指指点点。西蒙森让一位警察打开车门，李玉芬低着头坐在那里。当她抬头看见我时，赶紧走到车门跟前，眼里噙着泪花。我告诉她不用过于紧张，律师会努力为她辩护的。

10 点半的时候，前面的案子终于审完了。我走进大厅，在旁听席上坐下。大厅内的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饱和着一股浊臭。旁听的人挺多，大厅里乱哄哄的。

又过了十几分钟，法官们入座，每人裹着件老大的黑袍，使别人都替他们感到热得慌。主审官是一位年迈

的黑人老头，干干瘦瘦的。他低头看着什么，右手举起木槌在台案上击了几下，大厅里顿然肃静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正要宣布开庭的时候，突然有一位警察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他径直跑到主审官跟前，贴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只见主审官的脸上也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抬起来，声音沙哑地对大家说：

“各位，警方刚刚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人在我们的法庭里安放了定时炸弹，马上……”

话还没说完，大厅里已轰的一下乱了，人们惊恐万状地向外逃窜，男人的喊声和妇女的尖叫混成一团，像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

我被人们裹卷着跑到院子里，只见那囚车已嗷嗷叫着驶出了大门，另有两辆载有防暴警察的警车开了进来。开庭吹了。

下午再同西蒙森联系，得知那枚安放在法官席上的炸弹已经被排除。我问他何时重新开庭，他说目前还很难说。

补记：两个月之后，法庭以危害社会罪判处李玉芬七个月监禁，并在中央警察局第一训化所内服刑。

手记之二

她说要到国际法院控告巴哈马政府，我吓了一跳；晚上的电话里却传来她痛苦的呜咽……

上午，一位小姐和一个小伙子走进我们大使馆的门厅，那小姐穿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一脸的高雅和骄矜。

“你们这儿是中国大使馆吗？”她问，语气中充满了高傲。

我心想你不是废话吗，都进到我们屋里了还问这个，但我还是很客气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并问她有什么事。

“我是华侨，来向你们咨询一个问题，看你们知道不知道。”她那口气，就像是一位贵夫人在吩咐自己的仆人做什么。

我在使馆工作几年了，大大小小的华侨见过不计其数，还是头一次遇到用这种口吻同我们外交官讲话的，我感觉很不舒服。把他们请到会客室，问小姐贵姓，她说姓金，我问金小姐要咨询什么问题。

“我们要到国际法院控告巴哈马政府，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手续。”

我闻听，还真吓了一跳，巴哈马与我国尚无邦交，而我这里是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她来此咨询这样的

问题，看来里面还真有点儿名堂，我忙向她请教。

“他们无理地将我们拘留了三个多月。我们七个人，都有入境签证，却一到机场就被他们的移民局给扣了……”

她忿忿地述说着。

原来她和另外六个男同胞都是上海人，五个多月之前才从国内出来，先到了玻利维亚，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搞到了居留证件之后，听说巴哈马那里不错，便奔赴那里闯天下，谁知到了首都拿骚，连机场都没出，直接被移民局用闷罐车拉到了拘留所……

好一个“华侨”，原来是一帮“国际盲流”。

近几年来，出国的浪潮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卷出国门，抛洒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除了一些投亲靠友、留学的等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像寻找栖息之地的候鸟一样，闻听哪里容易落脚，容易居留，或是有希望成为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去的跳板，便会迫不急待地飞向哪里，他们被有关国家所关注，被抓、被拘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位小姐可能是刚刚开始这种“盲流”生涯的缘故，所以才如此大惊小怪。

“那你们怎么到牙买加来了呢？”我问。

“巴哈马把我们放了，我们要经过这里到古巴，从古巴飞玻利维亚，我们到巴哈马去的时候就是这么走的。我们有牙买加的过境签证，昨天晚上到的时候给边检的塞了几个钱，就让我们进来了。他们让我们今天上午9点钟到机场乘去古巴的飞机。”

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11点了。

“那你们怎么没去机场呢？”

金小姐笑了笑，似乎有几分得意，她说：“我们既然已进来了，想在这里参观游览一下，顺便向大使馆咨询一下告状的事。”

听了她的话，我心中不免有些气愤，他们这些人根本无视有关国家的法律，随心所欲地到处乱跑，不仅损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

“你们这样做不对。这是非法入境，是违法的。”我语气严肃起来。

小姐歪了歪脖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管她是否爱听，我还是给她讲了一大通诸如在国外要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之类的话。最后我又对她俩说，不要想什么到国际法院控告之类的事了，最好是尽快离开牙买加，回到他们有合法居留权的地方去。然后我便起身送客。

俩人悻悻地走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真有点儿搞不懂，他们这样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究竟图个什么。

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案头的电话突然响起，是移民局的泰勒处长打来的，他说：

“徐先生吗？有一位您的同胞想同您讲话。”

接着，听筒里传来那位金小姐颤抖的声音：

“徐先生，我、我们都被警察抓起来了……”

随即是一阵痛苦的呜咽……

她苦苦哀求要去住旅馆，两条腿儿的人我可不忍担保；送去的饭也让看守们给抢光了

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市警察局位于Downtown闹市区，是一个很大的院落。进了大门一溜排着几座建筑，有刑事侦察部、特别行动部和国家安全部等。在大院的最里面，有一扇挺大的铁门，把一座看上去破烂不堪的二层灰砖楼房同前院隔开，这里面就是市警局的临时拘留所。以前曾发生过多起中国人非法入境的案子，被扣押的人都是关在这个拘留所里，而每次又都是由我前来探监和办理交涉，所以对拘留所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同正式监狱不同，这里的条件很差。一进大门就可以嗅到迎面而来的一股臭气。一条污水沟顺着墙根儿横过，几条浑身是癣并且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懒洋洋没精打采地在沟里觅食。犯人们都关押在二楼上，一层有一半儿是警车库，另一半儿是审讯室和看守们的办公室。审讯室里阴暗潮湿，有一股难闻的怪味。每次来探监的时候，我都宁愿在走廊里会见，也不想到审讯室去。

走廊里有一张桌子，黑糊糊的满是油腻，我在桌前坐下，看守长便命令一个看守去带人。没有一分钟，金小姐和她的六个伙伴儿便排着队从楼上走下来。

一见到我，金小姐还有昨天同她一起到大使馆去过的那个小伙子，便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来，一左一右托住我的胳膊，做出一副久别重逢般的亲热劲儿，带着令人心酸的哭腔说：

“徐先生，可把您盼来了，快想办法救救我们……”

其他几个人开始时只是站在旁边发愣，见金小姐他们这一说，好像才明白了我的身份，也围上来诉苦。而话最多，其状最可怜的当然还是金小姐。

她说牢房里连床都没有，就睡在地下，老鼠、蜘蛛、蟑螂在身上爬来爬去，蚊子小咬一抓一大把；还有那些黑人男囚们，就隔着铁栅栏门儿冲她这边儿撒尿，流得满地都是，臊臭难忍；饭也没得吃，只丢给一块木薯和一杯凉水……。说着说着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先是擦开衣服，露出那被蚊叮虫咬得发红发紫的玉肤给我看，然后便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苦苦哀求说让我保她出去，她要去住旅馆。

一般来说，只要大使馆出面担保，让他们出去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不敢。因为过去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大使馆把被拘留的人保出来了，他却一转脸儿就溜之大吉，移民局找使馆要人，弄得我们很被动。从此得出教训，像这种“国际盲流”是保不得的，而是努力同移民局等有关部门办交涉，促使问题早点儿解决。

我向他们了解了情况，并好言安慰他们先不要着急，大使馆会同移民局交涉的，也可以要求警方改善生活条件，但问题的解决是要有个过程，需要时间，让他们先忍耐一下。

经过我的一番安慰，他们平静了许多。

下午，我同移民局的泰勒处长约好在移民局会见。想到我那几位同胞已一天多没怎么吃东西，便请使馆的厨师煮了一锅鸡蛋面，装到一个平时用来装冰块儿用的保温桶里，又拿了些香肠之类的东西，一同带到拘留所。

等看守把他们带下来之后，我让他们饱饱地吃一顿，因为要赶着去移民局，就不陪他们了。

第二天我再见到他们时，问他们昨天吃饱没有，金小姐苦楚着脸说：

“昨天你一走，饭就让看守们抢光了，我们一口也没吃到……”

我去找看守长交涉，他陪着笑脸直道歉，但我心里清楚，道歉也没用，明天他们还会这样干，没办法，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

移民局说要把他们遣送回国，全都吓得大哭起来，说他们宁愿坐牢

泰勒处长是一个很不好打交道的人，他总是板着一副煞有介事的面孔，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阴不阳的。

谈到对这七位非法入境者的处理，他坚持要遣送回中国，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持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

我到拘留所去的时候，把移民局的态度告诉了金小姐他们，并问他们的意愿如何。

一听说要被遣送回国，七个人竟都吓得哭起来，呜呜咽咽地哀求我，说他们宁愿在这里坐牢，也不要回国。

对于他们此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国内亲朋好友、街坊四邻、领导同事们眼里，他们是一群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出国了。他们留给人们一个色彩斑斓的美梦，他们宁愿坐牢，因为即使把牢底坐穿，那个梦仍然是绮丽的，仍然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保留住那个值得羡慕的虚幻……

我准备同移民局做最顽强的交涉，而金小姐他们在玻利维亚的长期居留证帮了我的忙（尽管我猜到它们肯定是花钱买来的）。

我向泰勒提出，应当允许他们前往其目的地玻利维亚，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他们虽然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有在玻利维亚长期居留的证件；第二，他们入境牙买加是经边防人员允许的，尽管是因为他们贿赂了边防人员才获准入境的，但造成他们非法入境这一事实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们。

泰勒似乎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来反驳我，他用了一句外交辞令使自己下了台阶：

“我们将对您的建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两周之后，泰勒通知我，移民局已决定，允许这七位中国公民离开牙买加，前往他们预定的目的地。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金小姐他们时，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

在前方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不知道。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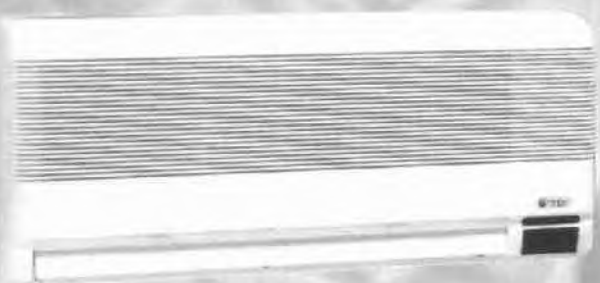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R

TONGLI

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



简介:

本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专业生产冷冻、空调设备的企业,具有丰富的生产、经营冷冻空调产品的经验。如今已发展为拥有1200平方米展销厅、四个生产厂及分公司,是具有产品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安装和维修等综合的强有力的经济实体。

同力公司注重发挥国内外科技优势,不断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与国内二十几家设计院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陆续开发生产出多种节能节材型产品,其中风冷冷凝器是北京节水办推荐产品,并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吊顶式冷风机荣获1991年国家级新产品奖。公司主要产品有风冷、水冷半封闭和全封闭冷凝压缩机组、吊顶式冷风机、大型水冷式冷水机组;小型风冷冷水机组、分体壁挂式空调器、风机盘管式空调器;组合式空调器;新风空调器等。

同力公司以其自身经济实力和信誉与国外数十家厂商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公司展销厅常年展示、销售世界名牌制冷空调设备和厨房设备。

同力公司上乘的产品和优良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厂商的信赖,公司将以更多的更好的“同力”产品奉献给各界用户。



总经理: 白亚南



呀，好热
同力制冷
向人间播洒清凉与爱意



好凉好爽

